

麻城文史

麻城孝感乡
鼓楼专辑

文史资料 内部交流

2009 第一期
(总第4期)

MACHENG WENSHI



主办：政协麻城市委员会
麻城市文化研究中心

承办：麻城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麻城市“湖广填川孝感乡现象”研究会

目 录

· 卷 首 语 ·

让“孝感乡都”换新颜

· 孝感乡研究 ·

003 移民传说是怎样形成的

——以“麻城孝感乡”现象为例

陈世松

015 邹知新孝感乡《都碑记》考释

凌礼潮

027 麻城孝感乡移民发源地的历史地位

——明清两季的移民发源地双倍的历史效应

孙晓芬

035 民间族谱与“麻城孝感乡”历史记忆

苏东来

044 明清时期四川麻城籍移民后裔数量估算

罗卫华

· 根在麻城 ·

049 清代名人张鹏翮张问陶家族之根在麻城

胡传淮

· 麻城史话 ·

056 麻城史话(连载三)

凌礼潮

· 家谱研究 ·

060 从麻城各姓氏族谱看湖广麻城孝感乡移民现象

李 敏

066 熊殷、熊受一迁川资料汇编

刘明西

· 争 鸣 ·

069 《“孝感乡都”考辨》之考辨

——三答邓经武先生

凌礼潮

附:邓经武《“孝感乡都”考辨》

· 简 讯 ·

078 纪念“湖广填四川”340 周年

——“移民文化与当代社会”学术研讨会在蓉召开

079 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区域文化整合与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研究”

开题论证会召开

[封面《鼓楼》照片摄影 冯克西]

麻城文史
Ma Cheng Wen Shi

编辑部地址 湖北省麻城市金桥大道特 1 号
电 话 0713-2950903
传 真 0713-2950903
邮 箱 zxb0903@sohu.com
邮 编 438300
准 印 证 号 鄂黄麻图内字 2008(028)号
制 版 印 刷 麻城市育才印刷厂
出 刊 日 期 2009 年 3 月 28 日



市委、市政府领导邓新生、李开寿、徐圣贤出席小河头工业园开工仪式

鼓楼办事处党委坚持科学发展观，狠抓招商引资，大力发展工业经济，实现了在麻城率先崛起，全处综合经济实力连续三年雄居麻城市第一名。该处工业经济运行表现出三大特点：一是原有规模企业运行稳健，二是新增规模企业较多，三是新签约开工企业多。2008年全处社会总产值达到18.7亿元，国地税收入超过5000万元。



兴业公司生产现场



来安制动器公司生产现场



正东科技公司厂区



忠诚机械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高山咀精饲料加工厂车间



博林机械有限公司厂区



冠邦机械有限公司生产厂房



瑞丰矿业公司生产车间



福海矿业有限公司厂区

沈家庄（古孝感乡都）文物遗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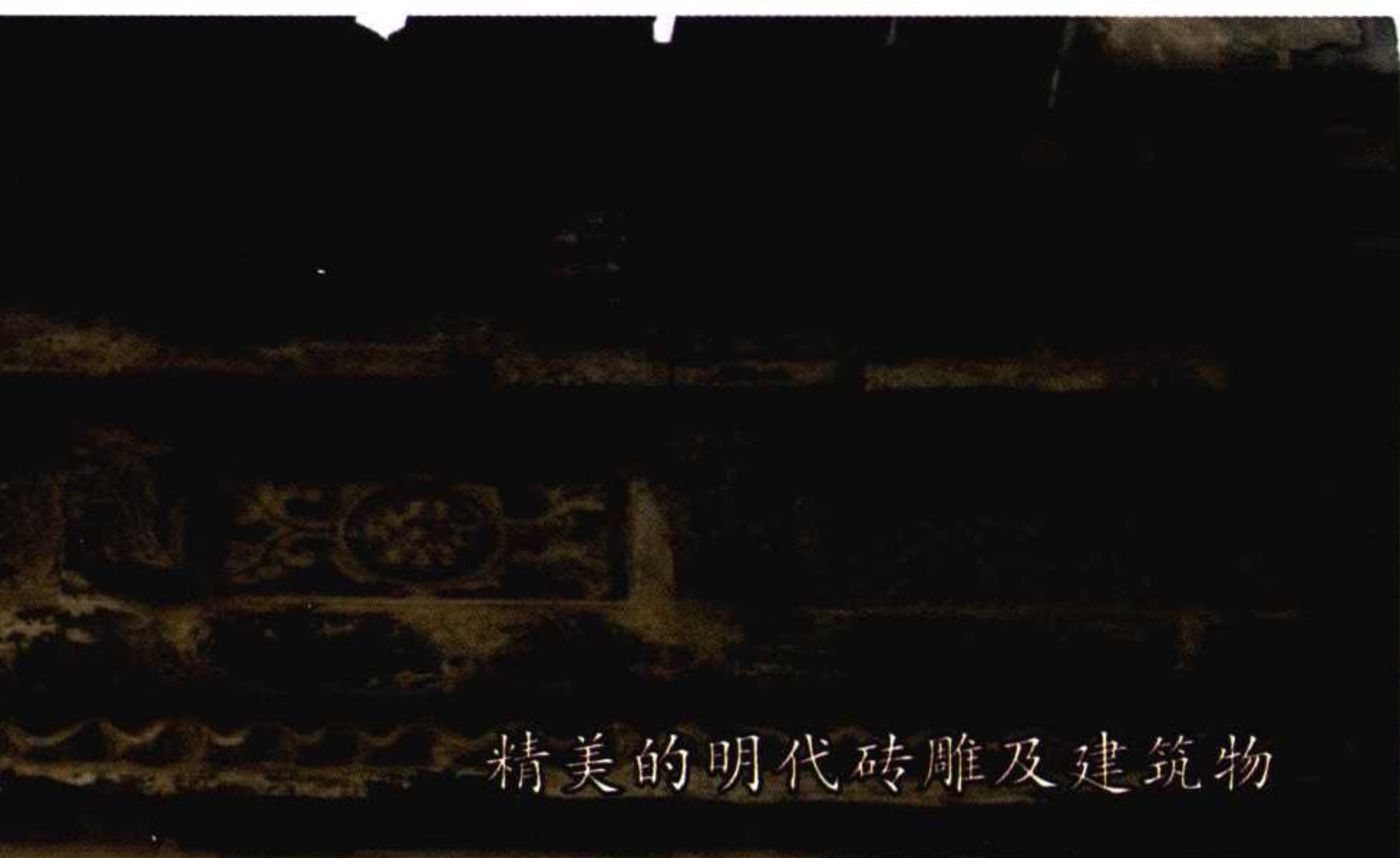
明代石雕福寿窗棂



清代磨子场磨盘



曾收藏过“陈侯都碑”的刘家岗祖屋



精美的明代砖雕及建筑物



清代石碾（乾隆16年制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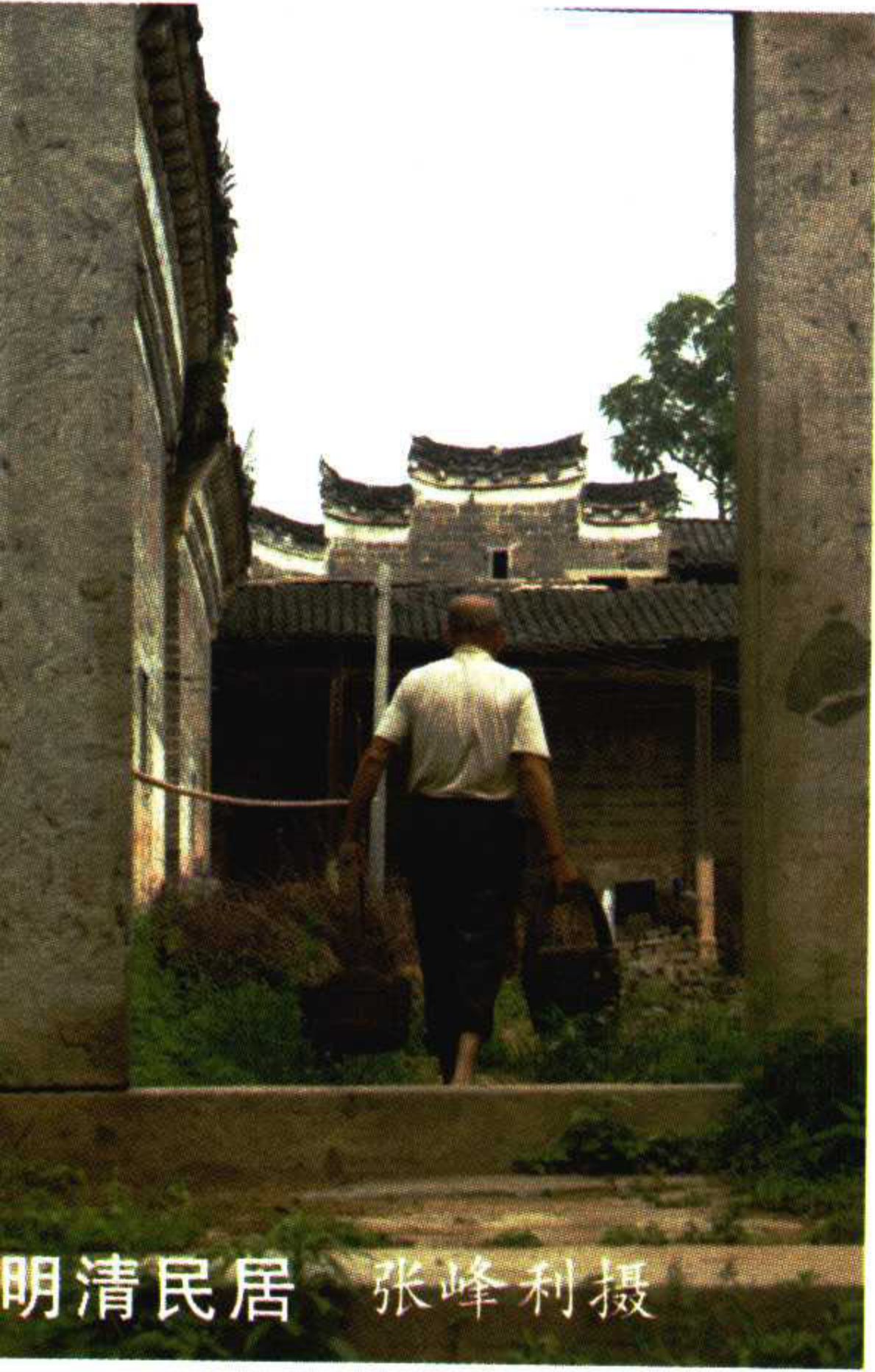


沈家庄位于鼓楼办事处东南部，因明初富商沈万三嫁女于熊氏并置别业而得名，为古孝感乡都所在地。明末为都御史梅之焕（熊氏外孙）庄园。明初曾设为散州，专管移民事务。明成化8年随孝感乡建置一起被裁撤。明亡，被张献忠所据，并复置孝感乡都。目前该村保留的明清遗迹众多，移民史料和传说丰富。



鼓楼风光

举水晨曦 杨金洲摄



明清民居 张峰利摄



四望山元代兵寨 夏季阳摄



举水大桥 杨金洲摄



辉煌山庄 冯克西摄

新农村建设日新月异

鼓楼办事处居于城乡结合部，凭依举水，背负龟峰，京九铁路、沪蓉快速铁路贯穿全境。山川秀美，交通便利，经济活跃，文化繁荣，是红土地上新崛起的明星乡镇。2008年被麻城市委、市政府表彰为综合经济实力第一名、财政增收先进乡镇、招商引资先进单位、科技工作先进单位、教育工作先进乡镇、党风廉政建设先进单位、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单位，并涌现了一批全市经济十佳村（区）、十大纳税户、十佳厂长（经理）、十佳创业标兵。



农民夕阳红健身武术队英姿飒爽



村级道路“村村通”工程全部竣工



农业综合开发及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



村级组织及活动场所建设规范达标



禽蛋养殖产业兴旺发达



牲猪产业保持旺盛的发展态势

目 录

· 卷 首 语 ·

让“孝感乡都”换新颜

· 孝感乡研究 ·

003 移民传说是怎样形成的

——以“麻城孝感乡”现象为例

陈世松

015 邹知新孝感乡《都碑记》考释

凌礼潮

027 麻城孝感乡移民发源地的历史地位

——明清两季的移民发源地双倍的历史效应

孙晓芬

035 民间族谱与“麻城孝感乡”历史记忆

苏东来

044 明清时期四川麻城籍移民后裔数量估算

罗卫华

· 根在麻城 ·

049 清代名人张鹏翮张问陶家族之根在麻城

胡传淮

· 麻城史话 ·

056 麻城史话(连载三)

凌礼潮

· 家谱研究 ·

060 从麻城各姓氏族谱看湖广麻城孝感乡移民现象

李 敏

066 熊殷、熊受一迁川资料汇编

刘明西

· 争 鸣 ·

069 《“孝感乡都”考辨》之考辨

——三答邓经武先生

凌礼潮

附:邓经武《“孝感乡都”考辨》

· 简 讯 ·

078 纪念“湖广填四川”340 周年

——“移民文化与当代社会”学术研讨会在蓉召开

079 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区域文化整合与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研究”

开题论证会召开

[封面《鼓楼》照片摄影 冯克西]

麻城文史
Ma Cheng Wen Shi

编辑部地址	湖北省麻城市金桥大道特 1 号
电 话	0713-2950903
传 真	0713-2950903
邮 箱	zxb0903@sohu.com
邮 编	438300
准 印 证 号	鄂黄麻图内字 2008(028)号
制 版 印 刷	麻城市育才印刷厂
出 刊 日 期	2009 年 3 月 28 日

让“孝感乡都”换新颜

去年麻城首届“杜鹃文化旅游节”前夕,本刊隆重推出创刊号“孝感乡专辑”,引起市内外文史研究者及其爱好者的广泛关注。时隔一年,“麻城孝感乡现象”的研究又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特别是明末清初邹知新《都碑记》一文的再度面世,使鼓楼办事处的沈家庄即古代之“孝感乡都”、孝感是明清两朝重要的移民中转站等问题成为无可争辩的事实。

鼓楼办事处党委以“存古创新”的远见卓识致力于孝感乡都——沈家庄的开发,正在上演一出文化与经济联手的大戏。

鼓楼办事处地处麻城市城郊结合部,背负龟峰,襟带举水,凭依京九、紧靠沪蓉,区位优势,交通便捷,经济活跃,文化繁荣,是红土地上新崛起的明星乡镇。2008年,全处共实现社会总产值29.2亿元,财税收入1.38亿元,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48亿元。2006年至2008年,连续三年被麻城市委、市政府表彰为综合经济实力第一名、财政增收第一名和招商引资第一名,并在2008年首届黄冈市乡镇综合经济实力评比中荣居“黄冈市十强”。

近年来,鼓楼办事处抢抓发展机遇,充分整合优势资源,大力招商引资,突破园区建设,强势推进经济腾飞。2008年全处新引进投资项目10个,协议投资3.73亿元,规模以上企业发展到11家,产业集群效应日益显现。为搭建产业发展的新平台,鼓楼办事处正在加紧实施小河头工业集中区和七里岗石英工业集中区建设及古孝感乡移民文化旅游产业开发。古孝感乡移民文化旅游开发项目位于沈家庄村,规划占地2600亩,计划总投资9800万元,该项目已获批准立项,并得到湖北省优势文化产业专项支持,项目主要包括建设古乡都文化系列展厅和移民祭祖大殿,建设休闲旅游别墅群等等。

邹知新在《都碑记》中引用旧《志稿》中的话说:“治东南七里许,即磨子场及孝故都,陈侯碑、驰辙、万松亭、赤亭古城,与沈秀者马头湾诸名胜,如联珠然。”这是一笔多么丰厚的文化遗产啊!鼓楼办事处党委一班人慧眼识珠,融保护、恢复、开发于一体,着力再现孝感乡都旧貌,以历史的记忆激发今人的情感,以文化的复制带动旅游产业的发展,他们的努力令人感动!

为此,本刊再次推出“孝感乡专辑”。

目 录

· 卷 首 语 ·

让“孝感乡都”换新颜

· 孝感乡研究 ·

003 移民传说是怎样形成的

——以“麻城孝感乡”现象为例

陈世松

015 邹知新孝感乡《都碑记》考释

凌礼潮

027 麻城孝感乡移民发源地的历史地位

——明清两季的移民发源地双倍的历史效应

孙晓芬

035 民间族谱与“麻城孝感乡”历史记忆

苏东来

044 明清时期四川麻城籍移民后裔数量估算

罗卫华

· 根在麻城 ·

049 清代名人张鹏翮张问陶家族之根在麻城

胡传淮

· 麻城史话 ·

056 麻城史话(连载三)

凌礼潮

· 家谱研究 ·

060 从麻城各姓氏族谱看湖广麻城孝感乡移民现象

李 敏

066 熊殷、熊受一迁川资料汇编

刘明西

· 争 鸣 ·

069 《“孝感乡都”考辨》之考辨

——三答邓经武先生

凌礼潮

附:邓经武《“孝感乡都”考辨》

· 简 讯 ·

078 纪念“湖广填四川”340 周年

——“移民文化与当代社会”学术研讨会在蓉召开

079 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区域文化整合与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研究”

开题论证会召开

[封面《鼓楼》照片摄影 冯克西]

麻城文史
Ma Cheng Wen Shi

编辑部地址	湖北省麻城市金桥大道特 1 号
电 话	0713-2950903
传 真	0713-2950903
邮 箱	zxb0903@sohu.com
邮 编	438300
准 印 证 号	鄂黄麻图内字 2008(028)号
制 版 印 刷	麻城市育才印刷厂
出 刊 日 期	2009 年 3 月 28 日

移民传说

是怎样形成的

——以“麻城孝感乡”现象为例*

陈世松



移民传说,是指“在广泛的地方居民之中,其祖先原本是从同一个地方迁移过来的传说”,又称之为“祖先同乡传说”^①。在今川、渝地区居民中,也广泛地流传着祖先来自于湖广麻城孝感乡的传说。对于这一现象,以往的成果较多偏重于从建置沿革和移民历史作探讨^②,而从移民传说出发,在思想史意义上进行解读则较为少见。

20世纪末,伴随着后现代史学对科学实证研究的挑战,传说与历史二元对立的关系遭到质疑。一种把传说视为与历史同等意义的“历史记忆”,并强调在思想史意义上进行解读的方法风靡一时。正是在这一研究思路的推动下,历史学界不断出现一些从传说出发研究历史的成功个案。比如顾颉刚对孟姜女传说的研究,发现了层累地制造古史,顾诚对沈万三故事的研究以及陈学霖对北京建城传说和“八月十五杀鞑子”传说的研究等^③。至于在移民传说的研究方面,也

有许多佳作问世,其中如罗香林关于宁化石壁村、陈乐素关于南雄珠玑巷、赵世瑜关于山西洪洞大槐树的研究^④,葛剑雄、曹树基关于孝感乡问题的探讨^⑤,刘志伟关于珠江三角洲移民传说的解读^⑥,以及日本学者牧野巽、濑川昌久、井上彻关于移民传说的著述^⑦等等。

按照“知识考古学”等后现代主义历史思潮的观点,对传统意义上的客观历史的终极追求只是一个梦想,历史客观性只是话语建构而成的。因此,对传承下来的各种形态的记忆或记录进行真伪考辨,已不是最重要的了,最重要的是“如何”真伪和“为何”真伪^⑧。据此,本文以“麻城孝感乡”现象作为个案,探讨移民传说的形成过程,主旨不在于对传说的真伪进行评说,而在于厘清不同时期、不同来源的祖先记忆在其中的地位与作用。

一、官方历史记忆

今天川、渝地区许多民众宣称自己的根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区域文化整合与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研究——‘麻城孝感乡’现象的历史解读与认同建构”(批准号:08BZS040)的阶段成果。

在麻城孝感乡,其所依据的大多是来自祖传的口述史料或者家谱。毫无疑问,这些也是记忆过去的一种方式,它和历史没有本质的区别。不过,孝感乡之与四川挂钩,则是见诸于官修史书的。

据《元史·兵志》载:“国初,用兵征讨,遇坚城大敌,则必屯田以守之。海内既一,于是内而各卫,外而行省,皆立屯田,以资军饷……大抵……和林、陕西、四川等地,则因地之宜而肇为之,亦未尝遗其利焉。”在《元史》备列的四川行省所辖29处“军民屯田”中,有两处提到“孝感乡”。其一为“五路万户府军屯:置立于成都路崇庆州之大栅镇孝感乡及灌州青城县之怀仁乡,为户1161名,为田203顷17亩”;其二为“兴元金州等处万户府军屯:置立于崇庆州晋(源)[原]孝感乡,为户344名,为田56顷”。^⑨

这两条关于孝感乡的文字,均来源于元朝中期所修之《经世大典》,二者文字基本相同^⑩。史料所提及的“孝感乡”,坐落于“崇庆州之大栅镇”及晋原县。此处之“晋原”,即成都府崇庆州所辖之晋原县(今崇州市崇阳镇)。此处之“大栅镇”,隶晋原县,明称三郎镇(原崇庆县和平乡驻地,今崇州市三郎镇)。另据新编《崇庆县志》载,今崇州市西北有街子镇,明属孝感乡、清泉乡^⑪。由此推知,经《元史》《经世大典》载录的这个“孝感乡”,其辖境范围大致是:从今崇州市境南部一直延伸至县境西北的街子镇与三郎镇之间,相当于今崇州市西河及其支流味江河与五里河的一带地方。

一般意义上讲,一个地方凡有以“孝”命名的地名,往往与本地出了感天动地的“孝行”故事有关。例如四川德阳西北四十里有一个镇,在东汉时出了个大孝子姜诗,所以到了北宋,“镇遂号孝泉”。^⑫崇庆境内的“孝感乡”是否与此类似呢?今查崇庆古今历史,完全找不出这样的故事;而且,“孝感乡”的建

置,始现于元代,在明代还存在了一段时间,但到清朝以后从此消失了。因此,我们大胆推测,孝感乡的得名,可能不是源自于本土的孝行故事,而是与外来的屯田民有关。

经过长达半个世纪的宋元战争之后,到了元初,四川人口大量锐减,致使全川各地“古户”、“旧族”、“土著”几乎灭绝,“土著之姓十亡七八”^⑬。鉴于四川地广人稀、生产亟待恢复,至元十一年(1274年),元世祖遂命“西蜀四川经略使起立屯田”^⑭。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夔路万户府从四川行省议,“除沿边重地,分军镇守,余军一万人,命于成都诸处择膏腴地,立屯开耕”^⑮。可见,这些军屯设立的时间,大致在至元十三年(1279年)元朝灭宋、统一全国前后。据统计,元朝这一时期在四川共设置了29处军民屯田,其中有民屯9处,军屯20处。当时的民屯分散到四川各地,而军屯则主要集中在元代的崇庆州、灌州以及成都府温江县。在20处军屯中,崇庆一州就集中了9处,由此可见其在元代四川军屯中的重要地位。

从事军屯的士卒,多由各万户府在本管军人中抽调。这20处军屯分别由镇戍四川的军队——13个万户府,以及两个专门从省外征调而来的军事机构措置。由于13万户府均是镇戍四川的军队,因此,屯田军大多来自于本省驻地。只有兴元金州万户府和五路万户府,不属于四川镇戍系统。上文提到的有孝感乡建置的屯田,就由这两个军事机构措置的。这两个军事机构之被调遣到崇庆州屯田,决非偶然。

兴元(今陕西汉中)金州(今陕西安康)万户府驻军于陕南。忽必烈即位前,曾大力在陕西境内提倡发展农业,陕南一带军民屯田事业因此得以开展,从而取得“汉中之田,辟已十八”的成效^⑯。当地的种田户多隶军籍,因此而成为屯田专业户。忽必烈即位后,曾诏命陕西“凤翔府种田户隶平阳军籍”,命

其“毋令出征,务耕屯以给军饷”^⑦。由此推知,驻军陕南的兴元金州万户府也同样招有种田户隶从军籍。它之被征调到成都平原来从事屯田,可能与它在陕南招募屯田户卓有成效有关。

五路万户府长期在河南、两淮一带屯田,其前身是蒙古灭金过程中的“汉军三万户”之一,统帅是河北真定土豪史天泽。忽必烈即位后,史天泽担任河南路宣抚使兼江淮诸翼军马经略使,“屯田唐、邓、中、裕、嵩、汝、蔡、息、亳、颍诸州”^⑧。五路万户府屯田的淮河流域,自曹魏以来,一直是封建政府重要的屯田区域。到了元代,两淮屯田规模之大、组织之严密,超过以前任何一个时期,成效尤为突出。故《元史》称,“国家经费,粮储为急,今屯田之利,无过江淮”。^⑨元朝设立的屯田提举司,大多集中在两淮地区。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就有一个蕲(今湖北蕲春)、黄(今湖北黄冈)提举司^⑩。在元代,麻城县不仅与蕲州路相邻,而且正属于河南江北行中书省黄州路管辖。由此可以推测,麻城县也是属于元代屯田事业发达、屯田人户集中的地区之一。

据宋代《元丰九域志》记载,麻城县下设四乡、六镇,到了元代,这样的建置应该是不会变易的,在“四乡”中,有“孝感乡”,其名字最早见诸康熙《麻城县志》。该志称,麻城县“初分四乡:曰太平、曰仙居、曰亭川、曰孝感。统130里。各有图。成化八年以户口消耗,并为94里,复并孝感一乡入仙居”。孝感乡虽然在成化八年(1472年)被撤并了,但它在宋、元两代的存在应该是毋庸置疑的。因为,这从明代以后人的追述中,也可以得到证实。如明人程源撰写的《程大猷墓志铭》提到,程大猷“其先河南人。宋南渡,家徽州,复自徽迁楚之麻城孝感乡。”^⑪杨应玘在宣统《石柱厅乡土志》中引述《陈氏家谱》说:陈氏于“宋高宗时由楚北麻城孝感乡同马氏同

来”。民国《简阳县续志》卷10《氏族表》也说:元仁宗延祐七年(1320年),来自湖广麻城县孝感乡的赵民忠,迁入简州大垭口枷檐湾。凡此皆证明,“麻城的四乡划分和孝感乡的存大,历宋元而明并无变化。”^⑫既然麻城县是元初重点屯田地区,孝感乡作为麻城的一个乡,当然属于屯田发达、屯田人口集中的地区。因此,当兴元金州万户府、五路万户府奉命到成都平原设立屯田时,它们都很容易从邻近的孝感乡调集到军户;或者招募到种田户,由民籍转入军籍。

从事屯田的在营士卒,按照军事编制,如以千户、百户等组织加以管理。根据《元史·兵志》提供的资料,由这两个万户府抽调来到崇庆州的屯田军士,人数众多,共有1505人,占成都平原军屯人数7524人的20%;所开垦田地共259顷17亩,占总开垦田地1593顷17亩的16.26%。如果这些军户都是来自孝感乡籍,如果每一户以二至三丁计算,则迁移至崇庆的军人及跟随而来的余丁家眷,军民人等总数共有五六千人之多。在当时崇庆州别无土著存在的条件下,一下子聚居了如此众多的来自同一外省籍的军民,为了安置他们的生活,不致发生变故,很有必要设立一个特别行政单位加以管理。这种情形,在元朝统治的晚期就曾经出现过。如元顺帝至元四年(1338),根据监察御史报告:在宋末荣州(今属自贡市)废弃80多年之后,“近年雍、梁、淮甸人民,见彼中田畴广阔,开垦成业者,凡二十余万户”。来此地聚居的“襄、汉流民”,“至数千户,私开井盐,自相部署,往往劫徒,杀巡卒”。为了适应“流户日增”的形势,元顺帝同意“设官府以抚定之”,诏即其地置绍熙军民宣抚司^⑬。以此反推,在崇庆州屯田聚居点上设立一个行政机构,用以管理来自于麻城孝感乡的众多的军士和余丁家眷,并将其命名为“孝感乡”,实属顺理成章的事了。

创立于元初的屯田制度,由于管理不善,逐渐衰败,及至元末,人不敷出,加上持续战乱,基本上处于难以为继的局面。随着屯田军户的大量逃亡,聚居在崇庆州的孝感乡籍的民户也有可能四方流散了。不过,孝感乡这个行政机构,还继续存在了一段时间。据民国《崇庆县志·宗教》所载庙宇铸钟,可见元明两代的乡镇名称有孝感乡、大栅镇。“至于元、明两代崇庆究竟有多少乡镇,分别属于何乡镇,已无从确述。”^②

近年来,在成都出土的碑刻中,有许多反映元代楚地家族迁居成都周边县区的事例^③,从中也可以寻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例如,在都江堰市青城山真坪乐村,近年来出土了两方嘉靖年间的买地券,券文上明确记载:“买地亡人”僧宗顺、相贵,均系“崇庆州孝感乡火烧坡”人^④。这表明,这个因元代军屯而设置的孝感乡至明代后期还依然保存着。2001年,在成都崇州市崇阳镇石羊村6组出土了一通明代嘉靖年间的《万本墓志铭》,该墓志铭文载:万本的曾祖讳元亮。“世为湖广麻城县孝感乡人,本刘姓,在元为屯田户。□(患)兵乱。移家蜀之永川。寻徙大邑,复迁崇庆,垦田勠屋家焉。”^⑤碑文证实,麻城县孝感乡确曾是出屯田世家的地方。根据碑文记载,家住麻城县孝感乡的刘氏家族,其祖先就是一个“屯田万户”,或许有附会之嫌,但专事屯田则较合常理。碑文称元末其祖先因兵乱从湖广麻城县孝感乡逃往四川,最终落户崇庆州,此时距元初在崇庆州设立军屯的时间,不过60年,事隔3代人左右。按理说,当时崇庆州孝感乡的建置依然存在。不知这个屯田世家的后裔,是有意到孝感乡投亲靠友,还是冥冥中循着当年先辈的足迹,又来到故地从事垦殖活动^⑥。

总之,不管怎样,官方史料终究为我们追溯孝感乡在四川的起源提供了依据。可以说,元代官方史料中无意保存下来的屯田

记录,为四川地区与孝感乡有关的起源提供了依据,为四川地区与孝感乡有关的起源最早的历史记忆,它不失为“麻城孝感乡”移民传说的雏形。

二、社会名流记忆

如果说透过元初崇庆州孝感乡的建置,揭示的仅仅是军屯人口的迁移活动现象,那么,经过元末明初以来一系列大规模的迁移活动之后,麻城孝感乡人就正式以定居者的身份在四川登场亮相了。

根据移民史的研究,元末明初以来湖广人的迁川活动,不仅次数频繁,而且规模大、人数多。据权威的《中国移民史》记述,元末天下大乱,湖广之人“往往相携入川,为避兵计。”除此之外,另有一批移民就是跟随明玉珍入川的湖北籍军人;随之入蜀的还包括对老百姓的招抚。元末追随明氏进入四川的移民人口超过40万,已经接近和超过四川土著。明初以来,朱元璋多次征集明氏旧卒入伍。除军事移民之外,又下诏民籍移民入川,其主要来源地也是湖北地区^⑦。正是在这种移民背景之下,到了明代,四川地区开始出现了许多麻城孝感乡的后裔。

由于洪武年间湖广地区迁川的主体,大多是下层民众,他们的移民活动不被官方所重视,因此官方文献缺载,以至长期以来,在四川失落了一个明初洪武大移民时代。而明代文人所撰写的墓志铭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它有助于窥知明代人是如何来追忆祖先这段历史的。

在清嘉庆《四川通志》之中,收录了明代文化人为麻城孝感乡后裔的墓主撰写的、埋葬于四川各地的墓志铭七例^⑧,兹摘录如下:

(一)程大猷墓,在江津县治青龙山。明人程源撰写的墓志铭曰:“猷,字允轩,其先河南人。宋南渡,家徽州,复自徽迁楚之麻城孝感乡。徐寿辉兵起,始祖程、辛二府君,避乱入蜀,寓渝之巴县双溪蛮洞口,又自巴

迁津邑。”卒于万历壬子(四十年,1613)。

(二)张佳(允)[胤]墓,在铜梁县县西凤凰山。明人王世贞撰写的墓志铭曰:“公张姓,楚之孝感人。其先有天性者,璧元季兵乱,窜于蜀,深入泸之铜梁系籍焉。”卒于万历丁亥(十五年,1587年)。

(三)侯文才墓,在营山县东十里观音桥。明人吴羽英撰写的墓志铭曰:“公讳文才,其先宝三公,楚孝感人也。元末宦于蜀,遂家营焉。”葬于崇祯丁丑(十年,1637年)。

(四)吴方泉墓,在荣县治天池山麓东南潼滩西岸。明人熊过撰写的墓志铭曰:“吴初自孝感来者,曰判官必秀,故元时判泸州,卒,遂葬焉。子海蟾,沂江自泸徙宜宾。子潮鉴籍为盐官,丁口煮盐贡井,因往来家焉。贡井隶荣,而畛于富顺,于是吴氏占三籍矣。”葬于嘉靖庚申(三十九年,1560年)。

(五)杨大荣墓,在丰都县龙亭山。明人王鏊撰写的墓记曰:“杨世家孝感,有讳德言者,仕元为万户统军,莅蜀,家忠州之丰都,至于君五世矣。”葬于弘治八年(1495年)。

(六)杨朝墓,在垫江县南十里杨家庄。明人卞邦谟撰写的墓志铭曰:“先生讳朝,字国宾,莲石别号也。其先湖广孝感人。谱逸无考。”葬于嘉靖庚申(三十九年,1560年)。

(七)杨宗震墓,在垫江县金安山。明人曹汴撰写的墓志铭曰:“公讳宗震,字仲起,崑州是其别号也。其世籍传自楚孝感,来居垫邑。”卒于隆庆己巳(三年,1569年)。

除收录于地方志上的墓志外,近年来,在成都市还出土了两通墓碑,墓主的祖籍均来自麻城孝感乡^⑧:

(八)万本墓,在崇州市崇阳镇石羊村六组。明人陈嵩撰写的墓志铭曰:“公讳本,字宗道,号南峨山人。曾祖讳元亮,世为湖广麻城县孝感乡人。本刘姓,在元为屯田万户。□(患)兵乱。移家蜀之永川,寻徙大邑,复迁崇庆,垦田棚屋家焉。”葬于弘治十七年

(1504年)。

(九)张佐墓,在金堂县万安乡。赵贞吉墓志铭曰:“公讳佐,字文衡,姓张氏,其藉先系湖广麻城县孝感乡,后属于西川成都金堂县万安乡里人。”葬于隆庆五年(1571年)。

此外,明人撰写的有关麻城孝感乡的墓志,有些还保存在作者的文集中。例如吴伟业撰写的《监察御史王君慕吉墓志铭》载:“内江王君慕吉……讳范,字君鑑,一字心矩,慕吉其自号也。先世楚麻城孝感乡人。明初,始祖兴秀公避红巾乱入蜀,占籍成都之内江。”^⑨熊遇撰写的《江君文博墓志铭》载:“文博名溥,姓阮氏。其先湖广麻城孝感乡人。元末避南锁红巾乱入蜀,家太平坝,遂为富顺县人。”^⑩为分析方便,对于这些墓志铭,暂不纳入本文的统计分析口径。

上述九例墓志中,流露出一些与孝感乡记忆相关的信息及其意义,值得引起注意。

首先,麻城孝感乡在明代四川社会具有较高的认同度。

先将以上九例墓志铭简化为下表:

例序	墓主	所在县	卒葬时间	上距成化八年时间	祖籍认同的表达方式
1	程大猷	江津	1613年	141年	其先迁自孝感乡
2	张佳胤	铜梁	1587年	115年	其先孝感乡人
3	侯文才	营山	1637年	165年	其先孝感乡
4	吴方泉	荣县	1560年	88年	自孝感乡来
5	杨大荣	丰都	1495年	23年	世家孝感
6	杨朝	垫江	1560年	88年	其先孝感乡人
7	杨宗震	垫江	1569年	97年	世籍传自孝感
8	万本	崇庆	1504年	32年	世为孝感乡人
9	张佐	新都	1571年	99年	其先系麻城孝感乡

通过对墓主卒年和下葬年代推知,上述墓志铭写作的时代,最早在弘治年间(例五、八),最迟在崇祯十年(例三)。撰写于嘉靖

以后的共七例(除五、八两例外),约占墓志总数的77.7%。从立碑最早的弘治年间看,上距成化八年(1472年)撤并麻城孝感乡,在二三十年之间,不过一代人的事情,因此,其对孝感乡祖籍的记忆应该是准确无误的,怀疑孝感乡在历史上的存在是毫无历史依据的。在撤并孝感乡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人们仍称自己祖先来自孝感乡,或许源自惯性,是可以理解的。但到最晚下葬的为崇祯十年(1637年),上距成化八年(1472年)已有165年,早就超过六七代人了。这时人们仍还称自己祖籍为孝感乡,除了传承世代习惯称呼外,可能还含有后代子孙对于孝感乡的心理认同。由于到了明代晚期,单凭记忆已难说清家世,于是,在人们认同的方式上,除了继续使用“其先”、“世为”孝感乡人这样的表达方式外,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墓志铭开始使用“其世籍传自楚孝感”(例七);还有使用“谱逸无考”(例六)的字句。这表明到了明代晚期,有的家族在宣称麻城孝感乡为祖籍时,已经开始依靠传闻追述家族历史了。

其次,麻城孝感乡在明代后期已成为四川社会一个值得炫耀的文化象征符号。

上述墓志的作者,多为明代社会中名望较高的政要或文化人,如:赵贞吉为赐进士第翰林检讨、文渊阁大学士、宰相、“蜀中四大家”之一;熊过为进士、官至礼部祠祭司郎中、为“嘉靖八才子”、“西蜀四大家”之一;王世贞为著名文学家、史学家;程源为徽派著名篆刻家,王鏊为文渊阁大学士、著名书法家;曹汴为翰林庶吉士、云南巡抚、江西巡抚;陈嵩为进士、中宪大夫、进亚中大夫、云南提刑按察司副使等等。这些作者皆名重一时,素为当朝所仰慕。由于受托于“公私之谊”,他们应允撰写墓志。这一举动一方面反映出作者对墓主的尊重与追悼,同时,另一方面也说明,身为麻城孝感乡后裔的墓主,生前在社会上的地位不低。

再从墓主家族的显望身份看,上述九例墓志在追述祖先的身世如何为官为宦时,或许会有附会之嫌,但在叙述他们的后裔,即墓主生前的履历、官职、地位时,却是不会掺假的。在九个例子中,这些来自麻城孝感乡的家族,属于平庸无能、默默无闻、“隐德弗耀”的只是个别。他们中绝大多数都居于社会的显要地位,如江津程大猷,举明经,授顺天府通州,所著甚多。其家族“世居五岔,代有显者”。程氏家族至明末为“江州望族,其支庶繁衍,万人有奇。”^④铜梁张佳胤,嘉靖进士,有文武才,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墓主去世时,有五子、十孙男、十孙女。其长子叔琦官锦衣指挥僉事,二子叔佩官南京左军都督府经历^⑤。丰都杨大荣,天顺丁丑进士。“丰都故无举进士者,君始自出一家”;“子孙多,且有立”^⑥。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表明,早在明代中后期,在四川的麻城孝感乡后裔家族,早已经是人才辈出,人文荟萃,颇多世家望族,他们无形中提高了麻城孝感乡在四川的地望和声誉,使之成为四川社会一个值得炫耀和获得社会认同的文化象征符号。

最后,麻城孝感乡已经得到四川社会的普遍认同,麻城孝感乡移民传说到了明代后期已经成立。

上述坟墓分布于川东、川中和川西地区,遍及四川各地。这表明经过元明以来的移民活动,来自麻城孝感乡的人口,不仅在社会声望上,已经在地理空间分布上占据优势地位。正因为如此,所以到了明代后期,麻城孝感乡已经成为官方记忆和民间记忆的聚焦点。例如,据四川总督朱燮元记述,天启六年(1626年),当成都被来自永宁(今四川叙永一带)的奢崇明叛军围困102天时,成都市的居民告诉他说:“成都自古不守,不见元人(即原住居民)”,“今生齿皆黄陂孝感人”^⑦。这里的“黄陂”疑为“黄州”之误,明代黄陂县隶属于黄州府(今湖北黄冈)。按理

说,在元末明初的移民活动中,由于明玉珍占据重庆建立政权,麻城孝感乡人主要移民范围,主要集中在川东、川南一带,川西地区数量应该是十分有限的。但是到了明末,居然连成都城的居民都称自己是孝感乡人,由此可以证明孝感乡民在四川移民活动中的地位与贡献。最典型的例子是,崇祯年间泸州分巡佥事吴登启在《招民榜示文》中,公开称:“各郡流寓泸民知悉……迨我国初,亦移麻城孝感之民,以实富、荣二邑。今固不能移外籍之民于江阳,亦安得空江阳而游尔民于外籍?”^③来自于官方、民间和社会的记忆都一致认同麻城孝感乡,这标志着到了明代后期,有关麻城孝感乡的移民传说已经基本成立,并且在全川范围内得到初步的传播。

三、民间传承记忆

明清更替之际,四川遭受兵火战乱与自然灾害交相夹击,整个社会又经历了一场空前的大浩劫。正如明末清初人程源所说:“甲申燕京失守,蜀旋破,三川鞠为茂草,人物殚绝,其间贤士大夫懿德嘉行,无与称述者。”^④及至清初,四川一片废墟,百废待兴。在这种背景下,一场持续百年的“湖北填四川”移民运动发生了。据《中国移民史》推算,在一个世纪内,四川合计接纳移民共达623万人,占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四川总人口的62%。其中,来自于湖广的移民即占49.5%,而来自于湖北的移民又占24%^⑤。这就意味着,到了清代前期,在四川全省居民中,湖广人又在人数上占据优势。

在明末战火中,承载民间社会记忆的族谱散佚,宗族世系混乱。这点,在清代以来四川一些族谱序文中得到充分的反映与证实。如说:“国初(按指清初)……惟是鼎革之际,天下大乱,蜀地尤甚。土著遗黎,以兵燹余生,仅延一线,至问其家谱,则大都灰烬矣!”^⑥以至到了清初,新老湖广人都面临着一个如何重构社会记忆的问题。

根据笔者接触到的族谱,清代至民国年间,四川民间大体采用以下三种方式来解释祖先迁川来历、建构自己祖先记忆:

第一种是“避祸入川”说。

“避祸”外迁,是移民传说的共同主题之一。在同时代全国其他地方流传的祖先传说中,如山西洪洞大槐树、广东南雄珠玑巷、福建宁化石壁村等传说中,也经常可见躲战乱或朝廷迫害而外逃的故事。而四川移民传说的故事,大多数“避祸”事件都发生在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背景下。

例如“江律《程氏族谱》说:“我先祖(程)、辛二公,原籍河南后迁楚之麻城孝感乡,后因避徐寿辉乱迁居四川,初寓巴县双溪洞,后迁江津。”新津《胡氏族谱》说:“我先祖胡受公,系湖广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元末避乱入川,迁四川犍为,后裔分迁荣县、新津。”资中《罗氏族谱》说:“我始祖罗恕公,原籍麻城孝感乡,元末避红巾军之乱迁蜀,卜居资中。”仁寿《王氏族谱》说:“我王子宗公,系湖广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梧桐村黄桷树坎人氏,‘麻城第一家’。因避陈友谅乱,明洪武元年与其子觉高、觉兴、觉奚,挽舟逆水而上入蜀。落业于嘉定、仁寿、资中、资阳。”涪陵《吴氏族谱》载:“李渡吴氏,原籍湖北麻城孝感乡,曾‘附陈逆友谅’。后太祖定鼎,惧逮,远徙四川涪州。”内江《张氏族谱》说:“张氏‘湖广黄州府麻城孝感乡,元末因避红巾军之乱,迁四川成都府内江县西乡黄河镇两河口’”等等。至于因避明末清初而外逃的例子太多,不再一一列举。

第二种是“随军入蜀”说。

例如康熙《孝感县志》卷六载:“玉珍率兵袭重庆,称夏主,孝感人多随之入蜀。”仁寿《李氏族谱》说:“元末吾祖世居麻城孝感青山,陈逆之乱,乡人明玉珍据成都,招抚乡里,吾祖兄弟七人迁蜀,因与祖一公载籍寿。”巴中《陈氏族谱》说:“我先祖陈氏,原籍

湖北黄州麻城孝感乡，随明玉珍部队入川，后大军整编安业，遂落业巴邑官庄。”隆昌《黄氏族谱》说：“我先黄氏肇自山东，元代迁于江南，传五代，复迁湖广黄州麻城县孝感乡。高祖洪武击周克郑，元主北遁，遂将麻城土著之民召令入川。吾祖于洪武元年入川卜居重庆府荣昌县隆桥驿住上嘴大坟坝”等等。

第三种是“奉旨填川”说。

例如泸州《王氏族谱》说：“予思我父讳九，母雷氏亦历风尘跋涉之苦，先由河南地随祖讳久禄于洪武元年戊申十月内至湖广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复阳村居住，新旧未滿三年，奉旨入蜀，填籍四川，有凭可据。”（泸州《王氏族谱·序》说：“祖王公讳久禄……携家至湖广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喜其风土。不二载，奉旨填籍四川，孝感乡人尽搬入四川。”咸丰《云阳县志》卷2《风俗》说：“邑分南北两岸，南岸民皆明洪武时由湖广麻城孝感奉敕徙来者”等等。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临近现当代，在口碑资料和新编修的家谱中，被挖掘出来的“老谱”资料也就越来越多，有关祖先来历的传说故事内容因此大大地丰满起来。这样，民间传承在历史记忆的过程中，便不可避免地会粘合许多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进去。常见有以下三种手法：

其一是通过细节刻画，渲染迁移过程，增加故事的感染力。

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围绕祖先迁川过程中有关盐蛋的故事细节来展开。四川著名作家艾芜 1947 年在追述自己的家族历史时说：“我自己的祖先，前七八代人，就是由湖北麻城县迁去的。而且，不只我一家，几乎附近好些县分的人，都是来自湖北麻城县。这都是有族谱可考，并非由于传闻”。1948 年，艾芜又在《我的幼年时代》中重申道，自己“第一个到四川的祖先，原是生长在湖北省麻城县

孝感乡的”。而事实上是，艾芜的汤氏家族入川（1698 年）之前，“世居湖南宝庆府武冈州高沙柿杨家桥（今属洞口县）”。1980 年代《汤氏族谱》发现后，艾芜承认先祖来自湘西洞口，不是麻城^②。尽管如此，艾芜于 1948 年在重庆凭记忆撰写自传性小说《我的幼年时代》，用十分细腻的笔墨，描写其祖先上川经历的文字，依然十分感人：“（汤姓）这位第一个到四川的祖先，原是生长在湖北麻城孝感乡的。读过书，却以种田为主要职业。但他失掉了土地，不能生活了，便强抑着悲哀，怀抱着雄图，带着妻子儿女，远离了自己家长和族人，来到战乱之后人烟绝迹的四川西部。路程自然是经过襄汉流域，沿着大江，穿过三峡，再到成都；一路上听过巫峡的猿啼，淋过巴山的夜雨，迷过嘉陵江的大雾，跋涉在岷沱流域，破庙的屋檐下躲过许多风霜，大树底下度过不少凄凉的夜晚。沿途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同时也缺乏盐，一块泡得很久业已黄白不分的盐蛋，每顿饭取出来，拿筷子尖沾点咸味尝尝，就这么样一块盐蛋在路上吃了一个多月。”从这个盐蛋的传说可以看出这家姓汤的移民，路上是遭着怎样的艰辛和痛苦。^③

其二是通过典型聚焦，深化避祸主题，增加故事的传奇色彩。

以往的祖先记忆也讲避乱逃难，但多源自平民百姓躲兵燹的潮流，因而结局大同小异，平淡无奇，不足称道。而民国以来根据老谱挖掘的内容，则大大突破了这一时空局限，许多家族在追忆祖先的避祸经历时，开始在事件、人物的个性化典型化上下功夫，努力通过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与人物悲欢离合的命运，来增加故事传奇色彩和感人效果。以下两个家族的祖先记忆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都是因躲避明朝迫害，埋名隐姓外逃至川东，最后受到朝廷封赠的故事。

长寿县狮子滩（袁家滩）《袁氏族谱》记

载了其祖先为明玉珍的部将,在明夏政权覆灭后,如何从重庆掘地道出逃,改易姓名,躲避明朝政府镇压,在明初被朝廷招安的故事。族谱说:“我祖本姓杨氏,号安珠,原为宋都统元帅”。1357年“同姨兄明玉珍由楚入川”。1371年,夏亡。“我祖安珠次妻所生子杨宗、次子杨剑战死。安珠正妻徐氏及子杨荣、杨昭困在城内,外无援兵,内无粮草,只得宰牛马为食,设计在九门(朝天门、东水门、储奇门、金紫门、南纪门、千厮门、临江门、通元门)以羊蹄击鼓、饿马摇铃御敌,仍无济于事。于是掘浮图关地道而逃”。朝廷“乃绘图严缉”,杨荣遂更名甘玉珍落业邻水,杨昭易姓名为袁自伦,落业于铁江河西岸石版坵。接着,族谱还记述了杨昭“招兵买马,积草屯粮,以图恢复大夏”的故事。根据族谱记述,为了剿灭杨昭领导的这支明夏余部,朱元璋曾遣“健将殷国公”以兵相拒,经过“往复数十战”,“互有胜负”。最后。明朝不得不派人招安,“传谕:敕赐安珠之孙袁景祥为子孙世袭万户侯。圣上亲笔书写中堂三十四字为凭。”至今袁氏宗祠中堂还保存有“圣上”书写的这34字对联:“侯爵烈先朝创西蜀镇东渝培植千年国脉;熏猷答当宁捷秋围?春榜流传百代书香”云云。^④

丰都包鸾区《周氏族谱》追述了籍贯湖广麻城孝感乡的先祖,在永乐袭位后,因躲避朝廷迫害,改名换姓,隐居四川的传奇经历。该族谱记叙说:“明初靖难兵起,志士死亡相继,其子孙易姓名逃匿远窜者,不可胜数”。“(我祖)是修公官礼部侍郎,坐方孝儒之党,尽节”。其子侄三人“入蜀省涪陵,隐姓伏”。其中,伏一郎居白里鹤游坪,伏二郎居小江白志,伏三郎居云里相公堡,后迁麻堆坝。“三祖隐姓二十余年,洪熙元年(1425年),大赦建文事,诏赠死节诸臣,恩荫指挥。”^⑤

其三是通过场景置换,模糊事件的时代感,增强民间文学的口头传诵效果。

在四川各地进行田野调查的过程中,许多民众在追忆自己祖先来源时,往往以如下模式叙事:听老人说,当初,张献忠(或称八大王)“剿四川”,杀得鸡犬不留。“湖广填四川”时,我祖从麻城孝感乡出发,被捆绑上路,途中拉屎拉尿,都要请求松绑,于是这才有了“解手”一词的起源。又称到了四川后,遍地荒无人烟,我祖因此地插占为业,在这里繁衍后代。这种叙事方式,在社区网络上经常可以见到。例如,有一位网友写道:“我老家是四川富顺县的。我们家的家谱上也记载是‘湖广填四川’的时候从湖北孝感搬过来的,并且那个关于捆绑痕迹的传说我还是今年春节才听我妈说起,他还特地看了看我的胳膊,还真有。想不到在这儿还遇到两个老乡。”^⑥

上述叙事中的张献忠“剿四川”、“湖广填四川”、“解手”、“插占”,都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发生的事件,其历史场景需要认真区分,不可一概而论。既说是张献忠“剿四川”后迁移入川的,故事场景就该在清代前期。那时距麻城孝感乡撤并已经300年,移民始迁地何以还是孝感乡?另从移民方式看,强制移民、捆绑入川集中发生在明初洪武大移民中,全国各地普遍流传“解手”的传说;而清初则没有和不可能发生捆绑押送入川的事情^⑦。再说“插占”土地,也仅仅存在于明初和清初的个别时期和某些地区,不可能任何家族都是通过插占土地在川落业的。而民间记忆则管不了这么多,为了增加故事的叙事效果,往往把不同历史场景下的事件通通粘合到一起,集中于一个又一个家族的迁移故事之中。于是,这就出现了时代特征被模糊,活动场景被颠倒置换的现象。^⑧

通过上述分析可见,清代以来直至民国年间,民间有关麻城孝感乡的祖先回忆,较之于明代,不仅显得内容更加丰富,而且表现形式更加多样。这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

后代关于移民祖先传说所迭加的成分也就越多。顾颉刚先生有关古史是经后人层累造成的精辟论断,在麻城孝感乡移民传说形成过程中也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四、结语

通过对“麻城教感乡”移民传说形成过程的剖析,可以看出,广泛流传于川渝地区的这一传说,虽然出自民间,但来源却是多种渠道的,他们在传说形成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也是各不相同的。

首先,官方历史的记忆,为传说的形成提供了一定的历史依据。

按照传统的传说的观点,任何传说都是有一定历史依据的。来自于官方的历史记忆,正好为民间的祖先记忆的构建提供了依据。本文在官方历史记忆中,虽然仅仅从源头上追溯到元代的屯田迁移,但是,在其后的元末、明夏以及明初这三个时期中,也有类似的官方史料保留。只不过官方史家对于民间的迁移素来冷漠,很少将其置于视野之中。而事实上,就是一些离奇传说的构成,也往往可以发现根据官方的历史记忆的影子。上文提到《袁氏族谱》记载,明玉珍部将在大夏政权覆灭后,从重庆城外逃继续从事“恢复大夏”、最后被招安收编的故事,这段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不见于《明史》,也不见私家野史《明氏实录》,更为其他地方文献所罕闻。但在官方档案性质的史书《明实录》中,却保留了多条关于明朝遣将“收集明氏故将”的史料。如洪武五年(1372年)十二月辛巳,“兵部主事彭恭,泸州守备[御]彭万里,收集四川明氏旧校卒二千六百六十人为军。”^⑧洪武十年(1377年)八月丁卯,“遣神策卫镇抚余忠往四川招集明氏故将丁氏校卒。”^⑨洪武十一年(1379年)二月甲子,“命四川都指挥使司收集明氏故将校为兵,凡六千五百余人。”^⑩显然,在如此确

凿的历史事实面前,再去对《袁氏族谱》传承的记忆进行真伪考辨,已不是最重要的了。重要的是,它使我们看到了来自官方的记忆,为民间记忆提供了构建的历史依据和自由发挥的空间。

其次,社会名流的记忆,为传说的定型和保存奠定了基础。

在民间记忆的传承过程中,历史犹如一支“无形的手”,在对各种各样的传说进行“选择”。史学大师钱穆曾经指出,古史既经后人层累地造成,也经后人层累地遗失而淘汰^⑪。在元、明湖广大移民的过程中,从楚地迁川的人户以数十万计,究其原籍地,何止千百个。为什么最后只有一个麻城孝感乡成为“幸运儿”,得以被当作“集体记忆”被传承下来,而其他原籍地则难以保留呢?这显然是经过历史筛选淘汰的结果。而谁有这个能力来操弄这一选择?首先当然是享有崇高社会地位的文化名人。而谁又能请动他们出来选择操弄?首先当然是在地方社会经济中占居优势地位的望族。民间记忆的重要来源和载体是族谱,以及编修族谱的重要依据墓志。上述墓志铭大量撰写于嘉靖以后,这与明世宗嘉靖朝发生的“大礼议”改革密切相关。嘉靖朝皇室宗庙制度改革后,放宽了对官民祭祖的规定,由此开了民间建立家庙、祠堂进行常祭的先河,这也就为民间修谱之风的普及与丧葬志墓风气的盛行提供了契机。正是这种背景下,崛起于四川社会的麻城孝感乡望族,凭借其在地方上的实力地位,得以率先延请社会名流,并通过他们的如花妙笔,来建构自己的祖先记忆。而在明代社会中拥有话语优势的一批文化名流,欣然为之命笔撰写墓志,不仅使这些家族更有了炫耀于人前的资本,而且也为麻城孝感乡记忆的定型和保存奠定了基础。试想一下,

如果不是他们这么卖力地鼓吹,其后麻城孝感乡传说能够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同吗?

最后,民间记忆的传承,为传说的普及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

经由官方历史和社会名流的记忆的保存选择,麻城孝感乡文化符号代代相传,深深地烙在了四川湖广人的历史记忆之中。但仅有文化符号,传说是记不住、传不下去的。这是因为,传说是形象思维的东西,它不是历史,它之能够传承下去,就在于它有血有肉、有声有色、形象生动。而为了做到这一切,它必须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从事再创作。由于明代后期许多姓氏对于始迁祖入川原因、经过早就开始模糊不清,因此,在经过明末清初的社会浩劫之后,当四川社会经济在面临重新建设的同时,如何传承这种记忆便成了四川社会精神生活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清代是家谱编修的兴盛阶段,修谱几乎成了中华民族一项全民性的文化活动。到了民国时期,民间修谱活动持续高涨。得此契机,不管是明代湖广土著居民的后裔,还是清代湖广移民的后裔,无不在这种形势下努力发掘新的史料。而编修者也根据史识的增长以及所处时代取材的需要,不断对始祖的迁川来历进行新的诠释和建构。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将一些新的内容增添进去。于是,一些充满虚幻传奇的故事情节,乃至一些场景颠倒的附会,都可能派生出来。与此同时,保存记忆的书写方式,也由过去的语言温和、文字简约的墓志文体,扩展为一种带有更多自我渲染色彩的故事体裁。

因此,当我们今天再回过头来审视广泛流传于民间的“麻城孝感乡”移民传说内容时可以看到,这一传说正是在官方史料、社会名流与民间传承的共同作用下,早在明代后期即已形成。今天人们所普遍流传的传说文本,大都是在清代至民国以来,不断

被迭加起来的故事内容的基础上演绎和传播的。

(作者为四川省社科院移民与客家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四川客家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注释】

①[日]牧野巽:《中国的移民传说》,载《牧野巽著作集》卷5,东京御茶水书房,1985版。

②参见梁音:《麻城孝感乡现象研究综述》,《四川客家通讯》2008年第1期。

③参见乔新华:《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问题研究的回顾和思考》,《清华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第22卷)。

④参见罗香林:《宁化石壁村考》,《客家史料汇编》,南天书局,1992年版,台北;陈乐素:《珠玑巷史事》,《学术研究》1982年第6期;赵世瑜:《祖先记忆、家园象征与族群历史——山西洪洞大槐树传说解析》,《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

⑤葛剑雄:《麻城孝感乡——中国历史上的移民发源地之一》,《寻根》1997年第5期,《中国移民史》第1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5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⑥刘志伟:《地域社会与文化结构过程——珠江三角洲研究的历史学与人类学对话》,《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

⑦牧野巽:《中国的移民传说》,载《牧野巽著作集》卷5,东京御茶水书房,1985年版;濑川昌久:《族谱:华南汉族的宗教、风水、移民》,钱杭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年版;井上彻:《中国的系谱与传说——以珠玑巷传说为线索》,载上海社科院《传统中国研究集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⑧万建中:《民间传说的虚构与真实》,《文化研究》2005年第3期。

⑨《元史》卷100《兵志三》,中华书局1976年标点本,第2574页。

⑩苏天爵编《元文类》卷41《经世大典序录·屯田》,国学基本丛书本,商务印书馆,第599页。

⑪崇庆县志编纂委员会:《崇庆县志》第33篇《乡镇概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4页。

⑫参见孝泉文化站编《孝泉历史文化》,1993年。

⑬揭傒斯:《揭傒斯全集·文集》卷6《彭州学记》。

⑭《元史》卷100《兵志三》。

⑮《元史》卷100《兵志三》。

⑯姚燧:《兴元行省夹谷公神道碑》,《元文类》卷62。

⑰《元史》卷4《世祖纪》。

⑱《元史》卷146《杨惟中传》。

⑲《元史》卷100《兵志三》。

⑳吴文武:《元代两淮地区屯田考》,《学术月刊》2005年第8期。

㉑嘉庆《四川通志》卷44《舆地·陵墓》。

㉒凌礼潮:《麻城孝感乡考辨》,《麻城文史》2008年第1期。

㉓《元史》卷92《百官志》、卷190《瞻思传》。

㉔崇庆县志编纂委员会:《崇庆县志》第3篇《建置》,第69页。

㉕参见荣远大提供成都市考古研究所编《成都出土历代墓铭券文综释》,待出版。

㉖参见荣远大提供成都市考古研究所编《成都出土历代墓铭券文综释》,待出版。

㉗嘉靖《万本墓志铭》(同上)。

㉘详细论证参见拙文《元代崇庆州“孝感乡”来历考》,待刊稿。

㉙参见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5卷,第148~159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③⑩嘉庆《四川通志》卷44~47《舆地·陵墓》。

③⑪参见荣远大提供成都市考古研究所编《成都出土历代墓铭券文综释》,待出版。

③⑫吴伟业:《吴梅村全集》卷45。

③⑬黄宗羲:《明文海》卷456。以上两条史料转引自凌礼潮《麻城孝感乡移民问题考辨》,《麻城文史》2008年创刊号。

③⑭嘉庆《四川通志》卷44。

③⑮嘉庆《四川通志》卷44。

③⑯嘉庆《四川通志》卷47。

③⑰朱燮元:《蜀事纪略》,明天启刻本影印本。

③⑱民国《泸县志》卷7《艺文志》。

③⑲嘉庆《四川通志》卷44。

③⑳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第1卷,第383~384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

㉑王楷:光绪简州《施氏族谱·序》,民国《简阳县志》卷17《士女篇·氏族》。

㉒转引自邓经武《四川土著哪去了?》,《四川日报》2003年11月14日。

㉓艾芜:《我的幼年时代》,载《艾芜文集》第2卷第7~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㉔长寿县狮子湾(袁家坪)《袁氏族谱》(续修铅印首刊本),1999年。

㉕丰都包鸾区《周氏族谱》,1989年编。

㉖摘自天涯社区论坛,2008年5月。

㉗参见陈世松《“解手”的传说与明清“湖广填四川”》,《中华文化论坛》2003年第3期。

㉘《明太祖实录》卷77。

㉙《明太祖实录》卷114。

㉚《明太祖实录》卷117。

㉛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上册,第8页,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



邹知新孝感乡《都碑记》考释

凌礼潮

清人邹知新《都碑记》^①一文发现后,可以为孝感乡的历史真实性之争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了!然而,该文有关孝感乡的得名、兴废,以及所涉及到的麻城历史的丰富资料,仍然需要我们进一步地去挖掘和探讨。

一

在对《都碑记》一文展开讨论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对其作者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邹知新,字师可,明末清初人。是正統間名臣邹来学第七代孙。明崇禎十五年(1642)举人,清顺治八年(1651)官襄阳宜城县教谕,后升山东莱阳县知县。因押送逃犯违期,遂解任归田,诵读自娱。著有《麻城县纪略》十四卷,惜未付梓。邹知新“幼少慧,苦学不辍,长而能文”。为官后“作士有声,督抚治按五荐。志切亲民,不乐内转国学,升山东莱阳县知县”。^②据《山东通志》载,顺治十八年(1661),邹知新还在莱阳县知县任上“重修敬一亭、泮池、大成门、儒学门”^③。《麻城县志·文征》收有他的文章七篇:

《忠节祠考》(乾隆《麻城县志》下卷一)

考黄州府之忠节祠为祭祀宋代赵令巖而建。

《四贤考》(同上卷)作于顺治九年(1652)。记其读《殿阁词林记》和李氏书而得麻城四贤。四贤中除周鑑、李文祥、鲍楚山外,最可注意者,为第四人杨廷和。“又读李氏书,有杨廷和,字介夫,四川新都人。父春,湖广提学僉事。按公系出湖广之麻城,五世祖避难入蜀居新都。以天顺己卯九月十九日生公,公幼举于乡,登成化戊戌进士,选庶吉士。嘉靖朝为丞相,以议大礼削籍为民。子慎,号升庵。登正德辛未科进士,状元及第。公之祖去麻仅五世,其于吾邑钟灵有自矣,亦奇矣哉!”杨氏虽在明初就移民四川,邹知新仍将其列入麻城四贤之中,并以此为骄傲!

《经正书院记》(同上,卷三)约作于崇禎九年(1636)。记麻城经正书院为县令蒋煜于崇禎五年(1632)创建,未几毁于战火的情况。

《道观矶记》(同上卷)为游记。道观矶,在县西北十里五脑山。据邹知新所记,邱长孺曾在矶旁建亭,亭有联:“石水生茶味,松风减扇声。”

《什子山记》(同上卷)约作于顺治初。记

宋端平间“避狄乱”，迁县治于什子山；崇祯八年(1635)乡人苦流贼，复立为寨；崇祯十六年(1643)春初，“外寇内讧，骚扰日甚”，麻城绅衿“尽移家于其上”。以及什子山之山势、气候等。

《芝佛寺记》(同上卷)。记万历间李贽寓居的芝佛寺，其得名之异、松石之奇、潭水之幽、佛寺之美，以及李贽与周柳塘的交游。

《定惠寺记》(同上卷)苏轼贬黄州，曾作定惠寺海棠诗。本文旨在说明定惠寺不在黄州，而应在麻城。该记对定惠寺的考证，可与梅之焕《重刻金刚经注解序》^④参看。

从以上所引邹知新文章来看，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邹知新于麻城之山川地理、人文历史颇为注意，不少资料十分宝贵，亦因此他才能写出《麻城县纪略》；二是其文非“记”即“考”，“记”中亦有“考”，“疑以存疑，信以传信”，颇注重“历史的真实性”。

有了这个前提，我们才能来讨论他的《都碑记》！

二

《都碑记》的写作时间，从其引用王汝霖《麻城县志稿》看，当在清顺治十七年以后(说见下文第三部分)。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将全文分为五个部分来引录并加考释。

去城东南七里有乡碑、石磨当路，云是古之孝感乡都。昔麻邑存四乡，独孝感乡有遗碑。耆老谓之世宝也。今刘氏后裔珍护之，可谓知所重也。新韶时闻故老言：“孝感乡都在邑城东南，勿远。”都府面坊多逢回禄，惟都碑、米研犹存。甚异！

文章开门见山，指明“孝感乡都”在“(县)城东南七里”，即现在的鼓楼街道办事处沈家庄村，出市区过举水二桥，往东南约三公里就到。孝感乡都的“都碑”，至邹知新

生活的明末清初时仍在，并为其亲眼所见。需要说明的是：孝感乡为什么又叫“孝感乡都”呢？这得从明代的基层组织说起。

明代基层组织的设置，最重要的莫过于里甲制的推行。

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就诏令收集整理有关户口版籍之类的文书。洪武三年(1370)十一月，又命令户部在全国核实户口，每户发给户帖，填写本户乡贯、丁口数目、姓名、年龄等内容。户部留存底籍，民户留其户帖，由地方有司每年登核户口的消长情况，编成册籍上报。

洪武十四年(1381)，朝廷开始在全国通过编制赋役黄册推行里甲制度。

其法以一百一十户为里，一里之中，推丁粮多者十人为长，余百户为十甲，甲凡十人，岁役里长一人，甲首十人，管摄一里之事。城中曰坊，近城曰厢，乡都曰里，凡十年一周，先后则各以丁粮多寡为次，每里编为一册，册之首总为一图，其里中鳏寡孤独不任役者，则带管于百十户之外，而列入图后，名曰畸零。^⑤

实际上，由于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朱元璋就已设立湖广行中书省，明朝对麻城地区的统治，洪武以前就已经开始。因此，麻城里甲制度的实施，应该在洪武初就已经展开。

按照明政府的规定，里长、甲首皆十年轮役一周，黄册也是十年一造。造册之时，地方有司将造册定式颁发给坊、厢、里长，令各人户将丁口、田地山塘、畜产等以实填报，由有司比照上届册籍，有增者新收、有减者开除，涉及税粮过割、里长有消乏者在百户中选补，绝户者于畸零中选凑或于邻图中拨补。

不过，虽然明政府规定以110户为一里，然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一里的户数实际上是远远超过110户的。如：洪武二十四年，麻

城为130里,15809户,平均每里122户;弘治五年,94里,13423户,平均每里达143户。^⑥考虑到上述引文中鳏寡孤独者作为“畸零”带管于110户之外的规定,洪武年间的编里户数应该说是很准确的。

除里、甲以外,明代县以下乡村建制还有乡、都、图、社、区等具有地域区划特征的乡里名称。这些名称,在各地因称谓、内涵和实际功能的不同,显得混乱而复杂。其与里甲制度的关系更是扑朔迷离,学术界对此也争论颇多。^⑦

对这些名称一一进行考释,超出了本文的论述范围。下面,我们只就麻城所处的历史和地域背景,谈谈“都”、“图”、“区”的问题。

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都”这一概念,并非是一级基层组织,而是指介于乡和里之间的一种地域单位。作为一种概念性的界定,我们赞同这一判断。问题是,这种简单的界定,模糊了这一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内涵,以及他发展变化的轨迹。事实上,“都”这一概念,源于北宋熙宁新法。熙宁三年(1070),“诏畿内之民,十家为一保,选主户有干力者一人为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选一人为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选为众所服者为都保正,又以一人之为副”。^⑧熙宁六年,全面实施保甲法,改五户为一保,五小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可见,“都”是作为一级正规基层组织存在的。《都碑记》引孔武仲在麻城所作“乡都好景无人说,只得邑城小市民”句,就证明了乡都制在北宋时已在麻城实行。张哲郎认为,明代的乡村组织具有两种不同的特色:“在北方的乡村,保有金元以来的乡里制及其社制色彩,而南方则深受宋代都保制的影响。”^⑨麻城地区正是这样,其里甲制的推行,就是在都保制的框架下进行的。洪武二十四年颁行的《攒造黄册格式》规定:“凡编排里长,务不出本都,且如一都有六百户,将五百五十户编为五

里,剩下五十户,分派本都,附各里长名下,带管当差。不许将别都人口补凑。”^⑩里甲编排的原则是“务不出本都”,也就是以“都”作为参照单位来编排里甲。在这里,“都”这一宋元时的基层组织,已完全蜕化为一种地域单位。

对于“图”的认识,迄今并无比较一致的看法。我们认为,“图”既非一级基层组织,也不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地域单位。它是明代推行“黄册”制度后,一般民众的身份和户籍资料在官府档案——黄册中的反应。前所引洪武十四年《明太祖实录》称:

每里编为一册,册之首总为一图,其里中鳏寡孤独不任役者,则带管于百十户之外,而列入图后,名曰畸零。

最当注意者,是文中所说的“图”。康熙《麻城县志》亦言:

初分四乡,曰太平、曰仙居、曰亭川、曰孝感。统一百三十里,里各有图。成化八年,以户口消耗并为九十四里。复并孝感一乡入仙居,为三乡。嘉靖四十二年建置黄安县,复析太平、仙居二乡二十里入黄安,止七十四里。(卷1“乡区”)

这就是说,黄册的制作,为每110户(里)编为一册,每册之前有一总图,其余为各分户资料(或数户一页,或一户一页)。这个总图,也即《麻城县志》的所谓“里各有图”的“图”。他的初始意义,应该只是指“图册”这一实物资料。万历《嘉定县志》就直接说:“图即里也,不曰里而曰图者,以每里册籍首列一图,故名曰‘图’。”^⑪此图册作为官方的户籍档案,为便于查找,于是就按都编册,一县编为数十都。也就是明人王世茂所说的:“须于造册之时,究心置立一簿。先县总,次都总,又次图总,三册总算相同,实征必与黄册相对。”^⑫这样,民众身份的查找和认定,以及赋役情况的核查,在官方档案中,就并不涉

及里甲概念,而只能是“第几都第几图”的形式了。到这里,“都”这一概念,就进一步蜕化至与“图”一样,成为“官方赋役户籍档案中对民户所在册籍的一种认定”了。

同时,前面说过,110户为一里只是理论上的划分,实际操作上往往由于村落户数的悬殊,加上人口的自然增长和机械增长,时间一长,势必造成里户人数超过规定额的一倍乃至数倍以上的情况。而按照明朝的规定,里甲又只能十年编制一次。因此,解决的办法,只能将“每里一册”,调整为每里两册(图)、三册(图),甚至多册(图),最后形成一里多图的结果。

王世茂又说:“须于未造(册)之先,预令里甲,各将该图户丁田地,开报在官。取吊数解黄册旧底,并积年书总及见年人役,隔壁查算。先县,次都,次图,各总数目相同,造具草册。”(引同上)殆即对“黄册旧底”和“积年书总”的这种调整情况。其实,仔细玩味王世茂这段话,就可以清楚地理解这一点。所谓造册之先,“预令里甲”。为什么只是“预令里甲”呢?就是因为“里甲”才是正而八经的基层组织,“该图户丁田地,开报在官”的任务,要由他们来完成。如果都、图也是基层组织的话,直接“预令都图”不是更快捷、更省事吗?

因此,关于“都”、“图”,我的结论有两点:

第一,他们既非基层组织的名称,也不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地域单位,而是官方赋役户籍档案中对民户所在册籍的一种分类。

第二,由于这种分类是官方对民户身份认定的唯一档案依据。因此,长期的使用,使之逐渐具有民户籍贯(相当于今天的通讯地址)意义上的演化迹象。这既是长期以来不少学者将其混同于基层组织的原因,也是将其理解为一种完全意义上的地域单位的必然结果。

麻城明代的都、图情况由于资料的缺失,清修县志时已不甚了了。兹举同属于黄州府且邻近麻城的蕲水县(今浠水县)为例来加以分析。光绪《蕲水县志》卷一“疆域”载该县有“乡五:曰南乡、曰北乡、曰上乡、曰下乡、曰永福乡。”其都、图为:

南乡十四里:一都一图一里 一都二图一里 二都一图一里 二都二图一里 三都一图一里 三都二图一里 十一都一图一里 十二都一图一里 十二都三图一里 十六都一图一里 十六都二图一里 十七都一图一里 十七都二图一里 十七都三图一里

北乡十三里:四都一图十里(?) 六都一图十里(?) 七都一图十里(?) 八都一图十里(?) 九都一图十里(?) 十都一图一里 十都二图十里(?) 十五都一图一里 十五都二图一里 十五都三图一里 十八都一图一里 十八都二图一里 十八都三图一里

上乡十二里:三十都一图一里 三十一都一图一里 三十三都二图一里 三十一都一图一里 三十二都一图一里 三十四都一图一里 三十五都一图一里 三十七都一图一里 四十都一图一里 四十六都一图一里 四十六都二图一里 四十七都一图一里

下乡十里:三十七都一图一里 三十九都一图一里 四十一都一图一里 四十二都一图一里 四十二都二图一里 四十三都一图一里 四十四都一图一里 四十五都一图一里 四十八都一图一里 二都二图二里

永福乡九里:十九都一图一里 二十都一图一里 二十一都一图一里 二十三都一图一里 二十五都一图一里 二十六都一图一里 二十七都一图一里 二十八都一图一里 二十九都一图一里

读懂上述内容,必须明确以下几点:

第一,上述计五乡五十八里,为蕲水县县以下之基层组织(当然,里之下还有甲),可证其基层组织为“乡、里、甲”三级。故县志将其作为叙述都、图情况时之区划框架。

第二,北乡里数有误。照原文里数加总为六十七里,而不是“十三里”。实将六处“一里”误为“十里”,已于文中用问号标出。

第三,理解的问题。如南乡的“一都一图一里、一都二图一里”,应理解为第一都共有两里,其中一里一图、一里二图。也就是说,第一都共计三图。余准此类推。

第四,缺“都”现象。全县编为四十八都,然缺第五、十三、十四、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三十六、三十八都。这八个都的缺失,原因只能解释为由于灾害造成的人口死亡或大量迁移,只好将其撤销,剩余人户并入邻近都图的结果。

第五,同一个“都”之图分属不同“乡”。其第二都有三图属南乡、二图属下乡;第三十三都有二图属上乡、一图属永福乡;第三十七都有一图属上乡、一图属永福乡。其原因,或者出于地理因素上的考虑,如河流、道路、山向等,或者出于生活习惯、经济流向、田地等级的考虑。不过,这种跨乡的划分,恰恰反证了“都”、“图”绝非基层组织或地域单位的结论。

第六,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确定,蕲水县都、图数为四十都七十八图。

上述内容,是蕲水县的情况,麻城与其同隶一府,当然也不会例外。

至于“区”这一概念,一般学者认为是明代实行粮长制后的产物,即粮长所管辖的区域。按照全县税赋总额,每一万担税粮设置一名粮长,专管本粮区内的税粮征收和解运,其与行政区划干系不大。^⑭麻城“区”之记载,最早见于前引康熙《麻城县志》卷一“乡区”,但文中实际并没有介绍“区”之设置情

况。不过,《都碑记》所引河东先生《龙池闲话》“久居湖边,孝都里区八百户丁,音声皆悉”的话,证明明代的麻城,确有“区”的设置。乾隆《麻城县志》倒是有设“区”的记载:

太平乡在县东北,辖二十五里,分四十五区;

仙居乡在县西南,辖二十五里,分五十四区;

亭川乡在县东南,辖二十四里,分二十四区。^⑮

但这已是清代的区划情况,且分区之细,绝非按税粮划定。

综上所述,尽管我们现在已无从得知,明初的“孝感乡都”到底属于第几都,但可以肯定的是,因为这个“都”正好在孝感乡这一基层组织机构的所在地,于是,人们就称其为“孝感乡都”!

三

余读旧《志稿》云:“治东南七里许即磨子场及故都,陈侯碑、驰轍、万松亭、赤亭古城,与沈秀者马头湾诸名胜,如联珠然。宋孔常父诗云:‘磨子场边堪寓目,赤亭城下更关情。乡都好景无人说,只得邑城小市民。’”华美骚逸,理或可想。又读《志略》称:“孝乡犹尚小,是以户丁为制,不以里数为限。”河东先生《龙池闲话》亦曰:“久居湖边,孝都里区八百户丁,音声皆悉。”观数典而综之,地狭而鸣世也。惜新幼时未知,不知究辨,今徒古乡,见其山川明润,风泽清旷。遥闻豫章人鸠集,悦余,乐而忘归。自赵宋胡元以来丁旺,常为乡之患害。明圣初云,传蜀地土广,川道虽险,乡之迁人皆居之。今民散久矣,百遗二三,莫一能奉。日不见□簫渔歌,夜无柝击双六,烛火孤点。新叹曰:“名乡

耳!岂可独忘此乡乎?”

此段文字涉及两部有关麻城的文献,即《志稿》和《志略》,下面分别考释之。

查乾隆《麻城县志》上卷十“艺文考”,著录有“王汝霖《麻城县志稿》(见府志,卷未详)”,知所谓旧《志稿》即此。再查上卷十九,得其小传:“王汝霖,字用肃,县诸生。少有文名,为文援笔立就,督学王发祥叹为当世史才。知县王潞尝以县志属之纂修,会迁去,不克授梓。稿藏于家,庚戌《志》成,多所采取。”

王潞,字又韩,余杭人。由恩贡任麻城知县在顺治九年一十七年(1652—1660)^⑤。王汝霖的《麻城县志稿》因其“迁去”而“不克授梓”,当即撰成于顺治十七年。十年后(康熙九年庚戌)再修县志时,其稿仍在。虽多所采取,但有关孝感乡的史料,只保留了前引“乡区”一条,实在遗憾。

关于《志略》,即明人熊吉所著的《麻城志略》九卷,约刊刻于明嘉靖十五年(1536),^⑥有毛凤韶序。熊吉,字柏举。“进士(熊)经之孙,举人(熊)夔之子。以贡为南陵训导,课士有声。督修城池,收瘞暴骨,县人德之。升壁山教谕,不赴,解组归。与毛凤起、刘承烈讲习理学,年八十八卒。子应渭,官四川峨嵋知县。”^⑦

据麻城《熊氏族谱》中刘师召所撰《柏举公行状》,知熊吉生于明弘治五年(1492),离撤销孝感乡的成化八年(1472),只有二十年。想必他的《麻城志略》中,有关孝感乡的资料相当丰富。王汝霖和邹知新都读过此书,故能言孝感乡之详,惜今已不传。

在邹知新写作《都碑记》时,上述《麻城县志稿》、《麻城志略》两书仍在,想来也并非难觅之孤本。因此,邹知新的论述和引用,其可信度当不会存在任何问题。

其次,王汝霖《麻城县志稿》中提到了北宋诗人孔武仲和他在孝感乡都写的一首诗。

孔武仲,字常父,临江新喻(今江西新余市)人,嘉祐八年(1062)进士,官至礼部侍郎。与其兄经父、弟毅父皆著文名,时称“三孔”。黄庭坚曾有“二苏联璧,三孔分鼎”之语。“二苏”即苏轼和苏辙,“三孔”与“二苏”不仅生同一时,且以文章名一世。孔武仲曾多次到过麻城,并在麻城写下不少诗篇。《清江三孔集》中,已可肯定写于麻城的诗有:《故县作》(卷四)、《白砂驿作》(卷四)、《故县遇风二首》(卷七)、《关山路三首》(卷七)、《关山五首》(卷七)、《万松亭》(卷七)、《听蝉》(卷七)。然遍检《清江三孔集》,却不见王汝霖所引的这首诗。个中原因,我们从“四库提要”里可以找到答案:

(《清江三孔集》),庆元中临江守王莲所编也……南渡后遗文散佚,莲始访求而刻之。前有庆元五年周必大序。^⑧

孔武仲卒于元祐间,到庆元五年,已相隔100余年。加之战争和流徙,其散佚之作,无论怎样“访求”,是无法锱铢无遗的。

除孔常父以外,上述文字还提到一位“河东先生”和他的《龙池闲话》。这位河东先生名叫万祥,《麻城县志》有他的小传:

万祥,号河东。成化辛卯举于乡,授苏州推官。举卓异,士民保留,升本府同知。丁艰服阙,门人董朴劝其补任,祥引“毛义捧檄”为言。授徒西塾,学者称为河东先生。县城址濒河,春夏患冲击。祥请于县令,捐资疏上流为新河,以杀水势,至今赖之。(乾隆《麻城县志》上卷十五“列传”)

2004年,鼓楼办事处村民建房,在旧基下挖出万祥父母墓碑两块,其母蒋氏碑铭为杨循吉所撰。据铭文所记,其父万鑑死于成化二十年(1484),万祥丁忧服阙即升苏州府同知,但他辞任未赴,事在弘治元年。

万祥的《龙池闲话》,县志未见著录,当于清初即已亡佚。他考中举人的时间是成

化辛卯(1471),正是“孝感乡”撤并的前一年。到弘治元年以后他家居时,孝感乡都已是今非昔比,“八百户丁,音声皆悉”。寥寥数语,饱含沧桑之叹。

王汝霖的《志稿》和孔武仲诗中,都提到一个“磨子场”的地名。这个磨子场,就在进入沈家庄的路边。至今,那里还残留着一盘巨大的石磨。据村民们反应,此石磨年代很久,连村中老人都是小时候听大人讲述,说是原先共有九盘,现在只能找到三盘,而且都残缺不全。石磨,《都碑记》中又称“米研”,是专门用作加工大米和面粉的石制工具。一个小小的“乡都”,竟然有规模如此巨大的米面加工场,其人口集聚的密度和数量,实在是令人难以想象的!

“遥闻豫章人鸠集”一段,是非常重要的文字。说他重要,是因为他已经接触到了“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这个移民史上的重大主题!“豫章”为江西省别称,江西人往麻城地区的大批移民,从宋代即已开始,至元末而络绎不绝。移民的大量涌入,大大地挤压了麻城土著的生存空间,以至“常为乡之患害”。当移民的数量超过了土著以后,土著们另觅新土,恐怕已是唯一的选择。即使是江西移民,虽然早已融入了麻城当地社会生活之中,但由于生存空间的日益狭窄,也只好继续随众迁移。于是,“传蜀地土广,川道虽险,乡之迁人皆居之”,便成为解决这一社会矛盾的历史必然。

需要指出的是,第一,这一时期的移民四川,虽然属于民众自发性的移民,并不具备任何的官方色彩。但元末随明玉珍部的入川将士及家属,亦应包括在这一时期的移民范畴当中。只不过由于麻城属于红巾军起义发起地,明代的麻城士人有所忌讳避而不谈而已。第二,这一时期的移民入川运动,当以洪武四年朱元璋统一四川为其下限。此后的移民,即带有政府组织和官方政策鼓励

的性质。

四

都门之阳有碑碣,额镌“邑东南七里磨子场 大明湖广布政使司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都旧址 皇明成化二十三年丁未秋邑侯陈兴谨识”。背阴有字,铭文漫辨。《志稿》云:“陈侯有才能,常乞其旧。而朝廷无旨,乃泐于石,自以怀怨。夫谓旧舍故,以继乡都,起废重兴之。以是亦存复之意,以复全盛,尚义崇孝也。彼其近周,破垣环故井,荒草冠遗坛。往牒曰:“当洪武初,太祖定迁民之策,迁诏至公署,县堂徙治磨子场。十年,遂升其都为散州,统属七县。未几罢之。永乐中复旧治。弘治时,都崩基圯,故今不知有其乡云。”非虚语也。

关于县令陈兴,乾隆《麻城县志》上卷十一“职官表”载其为“许州进士”,是成化年间麻城最后一任县令。然查朱保炯、谢沛霖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成化年八科进士名录中均无此人。又查清修《河南通志》选举志和人物志,亦无此人。看来,陈兴并非进士,最多是位举人或者岁贡。不过,无论如何,这位陈县令是很有远见的,其“存复之意”,不就是担心代远年湮之后,人们再也知道这里曾经有过一个闻名遐迩的古孝感乡吗?

然而,这部分文字中,最重要的莫过于邹知新引用的“往牒”里的一段话了。

首先,邹知新在引用时,不称“志”、“纪”之类,而曰“牒”。一般来说,“牒”当指官方的文书档案资料。起码可以说明,邹知新所看到的“往牒”,决不是什么野史笔记之类,很可能是官方的正式文件。在“湖广填四川”移民问题的研究上,学者们对朱元璋到底是否颁布过移民诏书而屡有质疑。信之者苦

无实证,疑之者仅据猜测,至今莫衷一是。邹知新所引“往牒”,虽然不能作为我们今天证明朱元璋所下诏书的直接证据,但明人的亲眼所见,正可作为对这一判断的有力支持!

其次,麻城作为“湖广填川”移民基地的地位,至此殆无疑义。“迁诏至公署,县堂徙治磨子场”。县府迁到孝感乡都,不就是由于县城内无法容纳成千上万的待迁民众,只好移署办公吗?值得注意的是,到洪武十年,麻城县所办理的移民手续,并非限于本县,而是作为政府临时设置的移民机构,升为散州,“统属七县”移民事务。所谓“散州”,是相对于“直隶州”而言,指隶于府之下,而无下辖县的一级行政机构。其长官级别低于知府,但高于知县。作为七县移民办理手续的机构所在地,移民的食宿当然是必须考虑的重大事务,这就是孝感乡都为什么要设置庞大的米面加工场的原因。那么,麻城所统属的七县,又是哪七县呢?据《明史》卷44《地理志五》记载,“(黄州府,洪武)九年属湖广布政司,寻改属河南。二十四年六月还属湖广。”其时,黄州府领州一(蕲州)、县七(黄冈、麻城、黄陂、蕲水、罗田、广济、黄梅)。其间虽然在洪武九年曾有德安、随州和应城、孝感划归黄州府管辖,但时间均没超过一年。那么,麻城所统属的七县移民事务,就是这七个县吗?对此,我表示谨慎的怀疑。理由有二,一是广济和黄梅两县隶属蕲州,且离麻城百里之遥;二是麻城即隶属河南,或许就近办理光山、固始两县移民事务更为合理。谭红先生主编的《巴蜀移民史》,对四川洪武时期196个家族的统计,麻城有117族,占60.6%。^⑨其中孝感乡51族,占全部移民家族的26.4%。这里面,应有相当部分实际属于其他六县移民,由于年远代湮,在祖先的记忆中,只剩下麻城孝感乡这个地名了。这种情况,在我的《麻城孝感乡移民考》^⑩一文中,应归入“误籍”之一种。

再次,孝感乡都作为麻城县府所在地,又作为州府驻地,到“永乐中复旧治”,时间至少三十多年。此一新的发现,可补《麻城县志》“建置沿革”之空白。

五

绕碑偕刘氏多居焉。访问之,曰:“孝都离邑七里,究之乃知兹坊集始自汉。传闻同里赵氏至孝,奏之,册为四乡之宗正。”弘治五年正月丁酉燹之。然崇祯间值献祸,邑名更“长顺”。八大王广置乡闾,招合流旧,计丁授田。时于富人沈万三秀雕彩之古宅,依议复置(献力置孝感厅,耀恩风相传)。析其故地添置信义、□□、□和、清平。一时避地逊名者,多有附焉。梅宗长者亦默如忘言。又云:“盖先人有完稿实著,吾邑言忠仁礼义之俗,推河东者。河东者,惟吾卯金氏者也。”词虽出自流语,吾又谓何哉?继曰:“掌乡州之粮,磨研头之职,何其重也!余(于)山林湖堰之积,司仓之责,点造之任者,何其大也!造厨煮调,白卷饱头之事者,何其苦也!剉切莖菜,抱注金泉,米茶头之勤劳者,何其累也!羹汤适口,熟淡相宜。如‘奏刀不嫌其细,倾尽而为,不以贫富易视来者’之言,兹足以传信,邑人咸仰焉。”并曰:“故时人仍谓之孝乡云。”

吾世力小任重,太平之功,岂不半赖先祖哉?嗟乎!新幼所闻之,今访其墟,观其金石亦相合,然益信乎!恐其古胜久淹,予谨述其事,存其传者耳,以示不朽矣!

本段文字可分三层意思。

第一层:孝感乡的得名;

第二层:孝感乡都的天灾和人祸;

第三层:盛赞河东刘氏对孝感乡都的贡

献。

关于孝感乡的得名问题,近年来,少数同志以孝感县是因董永的故事得名,而质疑于麻城孝感乡得名原委。其实,这也是一个长期困扰我们的问题。邹知新的《都碑记》发现之前,我们只能以董永并非孝感县人来自证明孝感县的得名与董永无关,而无法彻底弄清孝感乡得名的真实情况和具体的得名时间。现在,《都碑记》告诉我们:“兹坊集始自汉,传闻同里赵氏至孝,奏之,册为四乡之宗正。”让我们知道:孝感乡得名于汉代,且由皇帝亲自命名;孝悌的故事发生在赵氏家族!

可是,赵氏孝子到底姓甚名谁,其事迹到底为什么足以名乡?等等,仍然让人难免有太嫌简略之叹!不过,四川江安县《赵氏族谱》的记载,为我们弥补了这个遗憾!该谱续修于2000年,第46—47页保留了乾隆年间杨卓写的一篇《谱叙》,首言:

昔宜(楚)黄麻城赵公文楚,以母老病,故拜盗,恐惊其母。于是,盗感其孝,舍之去。后世遂以孝感名乡,今则易乡为县矣,而明初孝感仍隶麻城。麻城赵氏以孝显于汉,后为巨族,世居麻城。其自麻城而迁蜀,则有明太祖混一区宇,徙楚填蜀,麻城较多,虽吾先公亦与焉。则赵氏之归来,固麻城孝感乡人也。

续谱者文化水平不高,对这篇《谱叙》既无法断句,誊录又错漏百出。然查《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乾隆三十四年己丑科(1769)三甲第九十三名进士,果然是四川江安人杨卓。

杨卓在《谱叙》中对麻城和麻城赵氏的了解,并非如一般由请托者自己先拟好序文,然后再由受请托者润色的作法,而是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麻城移民后裔的缘故。《谱叙》说:“明太祖混一区宇,徙麻填蜀,麻城较多,虽吾先公亦与焉。”或者杨氏与赵氏

本来就是同时入蜀,作为麻城老乡,相互之间的了解,自然毫无疑义。

上述分析,我们不仅互证了两地资料的可靠,还进一步地了解到:1、孝感乡得名于汉;2、赵氏孝子名叫赵文楚;3、与董永的“以孝感天”不同,赵文楚是“以孝感盗”!4、以素质和祖籍如乾隆进士的麻城后裔杨卓,也因迁蜀太久而无法弄清孝感乡与孝感县的关系,竟得出“易乡为县”的结论来。

孝感乡的天灾,当然就是“弘治五年正月丁酉燹之”之灾,也就是文章第三部分所说的“弘治时,都崩基圯”的情景。回顾文章开头“都府面坊多逢回禄”的话,我们知道,孝感乡都多次遭遇火灾。

孝感乡的人祸,是借用邹知新的话来说的。也就是张献忠的农民起义。据康熙《麻城县志》记载:

崇祯十六年癸未,闯贼至麻城,旋即西去。里民明承祖及仆辈洪楼先等,结聚里仁、直道二会,活埋、杀所仇倡乱。各乡寨纠众围城讨乱。会众使汤九至潜山县地方,迎八贼张献忠于四月初六日入城,会众奉以为主。遂改邑为常顺州。遂渡江攻陷省城,安立伪官,独朱山寨不降。时周文江被陷,暗通风阳总督马士英,内应反正,爰受武銜。甲申乙酉间,文江复于黄蘗山共拥张旧枢,旋败。邑复有五脑山之公会,时知县陆晋锡拱听而已,侨居朱山,邑内大乱。^①

张献忠又号“八大王”,故上引文字中称其为“八贼”。清徐鼐《小腆纪年附考》亦记其事:

(崇祯十六年)四月,献忠连陷麻城。楚士大夫仆隶之盛甲天下,而麻城又甲于全楚,梅、刘、田、李诸右姓,家僮不下三四千人,雄张里闾间。寇之将作也,思齐以尺伍为捍蔽,听其纠率同党,

坎牲为盟，曰里仁会，诸家竞饰衣冠以夸耀之。其人遂炮烙衣冠，推刃故主，城中大乱。城外义兵围之，里仁会之人大惧，其渠汤志杀诸生六十人，而推其与己合者曰周文江为主，缒城求救于献忠。献忠自残败后，步卒多降于自成麾下，惟骑士七千人，闻麻城使至，大喜，进兵城外，义兵解围走，献忠遂入麻城。城中降者五万七千人，献忠别立一军，名曰新营，改麻城为州，以文江知州事。^②

麻城改为“长顺州”以后，孝感乡“依议复置”。但复置的是一个什么级别的政权？后有双行小字注曰：“献力置孝感厅，耀恩风相传”。这里的“厅”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官府办公的地方，二是府（州）下辖的一级行政组织。如果是第一种解释，则前面所说的“依议复置”四个字就落了空。所以，应该采用第二种解释。也就是说，复置的“孝感厅”，属于长顺州下辖的一个县级单位。于是，再将原孝感乡故地析为四乡，由“孝感厅”统辖。如果这个分析不错的话，那么，清制之“厅”，其滥觞是否就在这里？

最后，我们再来谈谈河东刘氏。麻城刘氏主要有两支，其最著者锁口河刘氏，即刘天和一支。其次就是河东刘氏，皆麻城望族。

河东刘氏功名始自刘汉（字天章，号坦庵），先后任商水、建德县令，至其子刘采极盛。刘采，字汝质，嘉靖八年（1529）进士。历官副都御史，巡抚山东。累迁南户部侍郎，自劾免。穆宗立，起南京工部尚书，改兵部尚书。乞休归，卒年74岁。谕祭葬，赠太子少保，谥端简。父子二人于乾隆《麻城县志》（上卷十五）皆有传。其后还有曾任松江通判的刘师召，兵部右侍郎、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宣大山西三镇总督梅国桢出其门；隆庆五年进士，李贽赞赏不已的“聪明之士”刘谐；^③万历四十一年进士，官至吏部侍郎的刘钟英，等等。

邹知新对河东刘氏的赞赏，并不仅仅因其为簪缨望族。更重要的是，刘氏居地正在孝感乡都（所谓“绕碑偕刘氏”），对“都碑”的珍惜和保护功不可没。何况还有刘氏家族的“忠仁礼义”之风，特别是在磨子场掌乡州之粮，司仓研米、造厨调羹。其职掌之重、责任之大、劳作之苦、繁琐之累，正是赢得孝感乡人崇敬之所在。

六

最后，我们想提到的是，此文还留下了一个难解的谜团，让我们感到十分困惑。以我的学识和能力，要解开其中的奥秘，实在难以胜任。因此，想就此得到方家的指教。

这个谜团，就是文中两次提到的“沈万三”。

旧《志稿》云：“治东南七里许即磨子场及故都，陈侯碑、驰轍、万松亭、赤亭古城，与沈秀者马头湾诸名胜，如联珠然。”

八大王广置乡闾，招合流旧，计丁授田。时于富人沈万三秀雕彩之古宅，依议复置（献力置孝感厅，耀恩风相传）。析其故地添置信义、□□、□和、清平。

上引文字可以看出，沈家庄与明初的江南首富沈万三有关，不仅有沈家“雕彩之故宅”，还有“马头湾”之名胜。真让人有匪夷所思之感！

沈家庄现为一个1000多人的大村，刚进入村头，路边就是古磨子场。往前经过村部后，才进入沈家庄的中心地区。明末梅之焕修筑的护庄濠至今仍在，濠宽约二十余米，濠水清澈平岸。濠岸边密密匝匝的树林，似乎有意掩藏着这个古老庄园的沧桑和神秘。依依垂柳轻拂着濠水粼粼的波面，显得恬静而又安详。只是濠外如今也是住户连

片、楼房鳞次栉比,充满现代气息。北濠外有一大片平坦的台地,面积约有二十余亩。村民说,这是当年梅之焕训练兵丁的跑马射箭场。沈家庄园内多为熊、梅两大姓,笔者多次寻访沈家庄,问起年老的村民,都说从来没有一户是姓沈的。名字叫沈家庄,却从来没有姓沈的人家,这种情况不能不让人纳闷!今年四月,在沈家庄熊姓老人家里看到了《熊氏宗谱》,才让我对这个问题有了合理的解释。《熊氏宗谱》创修于民国七年,续修于民国三十四年。2006年,族人又发起再次续修,于2007年初印制成书。我看到的,就是这部新修的《熊氏宗谱》。宗谱“卷首”有一篇《始祖世源序》,序曰:

鼻祖(熊)胜可,始祖朝用、朝武兄弟二公,于元至正年间自江右(江西兴国州)来麻邑。卜居沈家庄南街白果园的庄屋内。当时的沈家庄属江南巨富沈万三所有。世传沈家的小姐相中了朝武公。兄弟两在此安居,朝用务农经商,朝武闭门习读。兄弟逐年富裕,终功名利禄雄于东乡。

这段文字很显然是修谱人从文言翻译过来的,因而文白夹杂,留有古文痕迹。但稍后还有一篇原文保留的《沈庄塆老二房分谱序》,署名为“署理湖北崇阳县县长调充陆军第十三师武汉警备部军法官邑人沈汝乔拜撰”。说它是“原文保留”,是因为在这篇《序》后,附有原文的影印件,字迹清晰可辨,经核对无误。特引全文如下:

尝考熊族渊源,始自鬻祖。公之八十五代孙有朝用者。世传公继胜父,与弟朝武公卜居沈塆,乃始祖也。朝用公生四子:长以信,次以诚,三以谅,四以聪。信公生奇公,奇公生三子:长有宇公,次有受公,季有爱公。而宇公号洪正,公生青云;受公字润初,号受一,迁应山,为应邑始祖;爱公字失考,后裔仍

居于邑城之东南。有散居各处者,人丁蕃盛,其门者不下千百计,迄今族大丁繁而立于邑之东乡。而同乡中,有远迁蜀地者,应数朝武公下。公妣沈氏,生五子:长子以勤,携子殷与弟以能远徙四川,后只身而悠然又居麻邑。殷公后嗣,因年湮代远,散居四方,互失联络居里不能辨。渊源难修,惜哉也!尝闻殷公生二子,祖、禕,均有后。惟人丁繁衍,各居一方,亦难细数。后裔孙曾至总祠祭祖,时适献乱,干戈扰攘,民不聊生。劫后尽将谱牒遗失,以至宗支紊乱、同宗星散。稽无可稽,考无可考,诚可惜也!幸我师霖雨公,寻其残卷以录之。究不完善,所以有考,以便参详,永垂不朽云尔!

《序》中亦称熊朝武之妣为沈氏。这些记载,解决了沈家庄没有沈氏后裔的问题。但是,这个沈氏,果真就是江南首富沈万三之女,或者是沈氏家族的某一位女性吗?

经查阅有关史料,我们知道,沈万三有三女,一赘顾学文,一嫁余十舍,一嫁嘉兴陶安生。好像还有说一女为张士诚妃的。他的两个儿子:长子沈茂,有二子四女,长女德淑,嫁何氏;次女德美,嫁张氏;三女德仪,嫁周氏;四女德谊,嫁钱氏。次子沈旺,有子二,沈至、沈庄。没有生女的记载。

再来看看沈万三的弟弟沈万四,他有二子而不知是否有女。次子沈汉杰有二女,长女德宁,嫁吴江曹氏;次女妙智,赘张进。

如果再往下一代追索,沈氏家族已经败没。即使有女嫁往麻城,恐怕也无力兴建一座庄园给她陪嫁了。

我国封建时代重男轻女,尤其是谱牒墓志之类,对女子的记载往往阙略疏漏。那么,沈万三或其弟沈万四是否还有女儿缺载呢?这些,以我们的能力实难强说,只好期待学者们深入考证了!

【注释】

- ① 全文见《麻城文史》2008,第二期。
- ② 清乾隆六十年刻本《麻城县志》上卷10、19。
- ③ 乾隆《山东通志》卷14《学校志》。
- ④ 民国二十四年铅印本《麻城县志》前编卷2。
- ⑤ 《明太祖实录》卷135,“洪武十四年正月丙辰”,台湾中央研究所史语所影印本。
- ⑥ 弘治《黄州府志》卷3“户口”,上海古籍书店1965年影印本。
- ⑦ 参阅韦庆远《明代黄册制度》,中华书局,1961;王昊《明代乡、都、图、里及其关系考辨》,《史学集刊》1991第一期;栾成显《明代里甲编制原则及其作用考述》,《江苏社会科学》2002第五期、《洪武鱼鳞图册考实》,《中国史研究》2004第四期;张哲郎《乡遂遗规——村社的结构》,载《吾土吾民》,三联书店1992;邓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杨国安《明清两湖地区基层组织与乡村社会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 ⑧ 《宋史》卷192《兵志六·乡兵三·保甲》,北京:中华书局,1985。
- ⑨ 《乡遂遗规——村社的结构》,《吾土吾民》第209页。
- ⑩ 《大明会典》卷20《户部七·户口二·黄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6。
- ⑪ 明万历《嘉定县志》卷1《疆域考上·乡都》。

- ⑫ 王世茂《仕途悬镜》卷1,明崇祯刻本。
- ⑬ 吴滔《明清江南基层区划的传统与市镇变迁——以苏州地区为中心的考察》,载《历史研究》,2006,第五期。
- ⑭ 乾隆《麻城县志》上卷3《舆图·坊乡》。
- ⑮ 参阅雍正《湖广通志》卷43,乾隆《麻城县志》卷11《职官表》。
- ⑯ 乾隆《麻城县志》下卷2“文征”毛凤韶《志略序》:“嘉靖乙未,苏侯松以名进士来令。叹曰‘可以麻城而无志乎?’乃以托于凤韶。先是庠生熊子吉辑《志草》,继而刘子子弼、邱子龙云亦与校焉。”乙未年即嘉靖14年(1535),故当于次年定稿刊刻。嘉靖16年,熊吉又将修志时所辑资料撰成《志略考》,曰:“丁酉秋下第归,惧其久则佚也,乃辑而镌之,以为后来君子备先驱云。”(道光《熊氏族谱》卷3《柏举文集》)。
- ⑰ 乾隆《麻城县志》上卷16“列传”。
- ⑱ 《四库全书》集部8。
- ⑲ 《巴蜀移民史》第290页,谭红主编,巴蜀书社,2006。
- ⑳ 《寻根》,大象出版社,2005第五期。
- ㉑ 清康熙九年刻本《麻城县志》卷3“变乱”。文中“汤九”、“常顺州”,乾隆《麻城县志》上卷2作“汤志”、“长顺州”。
- ㉒ 清徐鼐《小腆纪年附考》卷2,北京中华书局,1957。
- ㉓ 《焚书》卷3《赞刘谐》,张建业主编《李贽文集》第一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麻城孝感乡移民发源地的历史地位

——明清两季的移民发源地双倍的历史效应^①

孙晓芬

笔者以六个世纪的历史眼光,从赣、鄂、湖、川、渝广大地域的视角,来贯通研究一个地名虽小但却影响深远的移民发源地——麻城孝感乡。

一、两湖在明清两季大移民中的轴心地位(略)

二、“江西填湖广”影响深远(略)

三、“湖广填四川”推动西蜀再开发重庆崛起大商埠(略)

四、麻城孝感乡——明清两季的移民发源地中转地

(一)麻城的区位优势

麻城位于鄂东北、大别山南麓中段。又处于长江中游走廊,有贯流全境的母亲河举水直通长江,即从水路来看麻城位于江西中部赣江——举水直通长江进入川东三峡的通道上。这个长江中游走廊的水路通道特点,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凸现其优势。自古以来,麻城是兵家必争之地,又是元末红巾军(南路红军)起义和明末张献忠屯兵之地。战乱灾荒时,是草民流徙之通道,和平年代则是官家、商家、文人和游民南来北去的捷径。

(二)孝感乡的移民黄金口岸

举水是麻城最大的河流,共有三个码

头:

一是高岸河码头。距县城最近,位于城南10里(5公里)十里铺村沿河一线,今属南湖办事处。

二是江家堰码头(即移民后裔传承的著名的高杆堰、高坎堰等名称)。位于县北7里,在虎型地洗脚盆(今国家森林公园)附近。今属龙池桥办事处。

三是位于县境西部的歧亭码头,是即将出县境(向新州县方向进入长江)的码头。

在三个码头中,前两个码头是在古孝感乡境内移民出发地人数最多的。其中又以江家堰码头——即以高杆堰或高干堰或高坎堰或高阶堰等名称,载入移民的族谱中。在现今四川、重庆的移民后裔心中。江家堰的“江”字、“家”字在古麻城话中口音重,“江”字读作“钢”字,“家”字读作“嘎”字,声母音相近^②,在数百年的传承中,“江家堰”演变成“高杆堰”“高坎堰”等系列名称,这是上川祖的始发地。

孝感乡地域,在汉代就有坊集,相传其地名的由来,是坊集中有“至孝”者事迹突出,上奏朝中,“孝感”因此而得名。孝感乡的区位优势,自宋以来一直是水路交通的“快车道”,拥有举水的两个码头。无论经商、

迁徙皆十分便捷,由此乘船向西从县境到新洲县入长江。明初的洪武大移民,从麻城孝感乡的高岸河码头、江家堰码头(即高杆堰、高坎堰等系列名称)迁往巴蜀大地大量的移民,江西等省也有大量移民来此“过籍”^③,孝感乡后来因“户口耗尽”而在成化八年(1472年)被合并入仙居乡^④,在明代虽仅存了108年,但孝感乡作为区位水码头的优势依然存在,到了以后二百多年,明末清初的湖广填四川,孝感乡依然是移民发源地、中转地。

迁徙到麻城的移民有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避乱型。元末战乱时,江西人从赣江水路避乱到麻城,并定居下来。

第二、应诏型。明初朱元璋“移窄乡填宽乡”的宏大移民,江西人口多是“窄乡”,湖广人口较少是“宽乡”,加之麻城一带税率较低,又是水路走廊通道,麻城成为江西移民的首选地。大批江西籍移民构成明初以来麻城的主要人口来源。

第三、“过籍”型。以明代大文学家杨升庵家族为例,先祖世贤居江西庐陵,元末因欧阳乱避迁麻城,不久,又遇红巾军战乱再迁四川,定居新都。杨氏老祖宗在原籍的庐陵与川西新都之间的湖北地域麻城,居住时间不久(两三年),该杨氏在麻城就成为了“过籍”。过籍麻城的移民主要来自江西,还有来自河南、江苏、浙江、山西、山东等地域的。

第四、迅速通过型。清初朝廷招民垦荒的系列措施,麻城这个移民通道更加畅行,在“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大潮中,两广、福建的客家人跟随湖广人的脚步,水陆并进争相上川,有的取道湖南郴州,有的取道麻城水路。经麻城上川的移民省籍更加扩大,从麻城迅速通过的移民更加增多。

战乱产生大批生存型移民。麻城孝感乡自古至明代都是“丁旺”之患和农民起义

策源地或屯兵地。元末的“红巾军”,明末的张献忠都与麻城紧密相连。元至正十一年(1355年)八月,麻城铁匠邹普胜和邻县罗田布贩徐寿辉共谋,以白莲教发动起义,麻城罗田及附近各县数十万人揭竿起义,史称“南红巾”^⑤。百姓在战乱中逃往四川。徐寿辉称帝后,邹普胜任太师。在徐寿辉称帝前,其部下中有个干将明玉珍(湖北随州人)率军西进重庆,在徐寿辉称帝后,明玉珍在重庆建立了“大夏国”的政权十余年。在这时期有不少鄂北人随军入川或逃往“大夏”。再就是明末农民战争时,张献忠攻下麻城,并搞“计丁授田”^⑥,麻城有5.7万农民参军,张献忠在鄂北计率30万人打进四川。

战乱是生存型移民上川的推力之一^⑦。元末明初和明末的两届农民起义,都与鄂东北的麻城有着紧密的关系。战乱导致大量的移民,从这个渊源来看,战乱是大批生存型移民上川的推力之一。

大批移民上川的更大推力,就是明清两季开国定鼎的皇帝实行召民垦荒的举措。无论是朱元璋的“移窄乡填宽乡”的强制性移民,还是清初的朝廷倡导下的给予政策优惠的移民垦荒,大批百姓迁移的方向就是往四川。四川这个迁入地,数百年间都没有减少吸引力。

四川是个适于农业种植的好地方,是生聚繁衍的新家园。千千万万迫于饥寒生存,即寻求新的居住地以求得生存手段的草民——生存型移民(其中有的在川创业,成功者成为发展型移民),四川颇具吸引力。四川这个迁入地,有很强的拉力。四川适于生聚的信息,在古代交通不发达、蜀道难的情况下,移民信息的传递是通过返乡接眷、返乡祭祖墓或迎祖骸、或返乡续族谱、或“麻乡约”寄钱捐物、或商家小贩运货等渠道进行的。如果说初来的移民是迫于战乱、迫于生计,那么得悉“西蜀沃野千里”,“米粮贸易之

隆”的信息反馈,成千上万的百姓争相上四川。

从麻城移民上川的水路陆路之中各线:

水路:麻城—武昌府夏口垒—荆州南驿—四川州府永宁驿—重庆巴县朝天驿—成都锦官府锦官驿,全程 5660 里(2830 公里)。

陆路:麻城—黄安—黄陂—云梦—德安府—隋州—枣阳—襄阳—巴东—巫山县—成都府,全程 3500 里(1750 公里)。

五、麻城孝感乡移民发源地双倍的历史效应

麻城孝感乡经历明清的大移民,作为全国唯一一个历经两季的移民发源地,有着双倍的历史效应。笔者认为体现在湖广“麻城孝感现象”、祖籍记忆、永远的精神家园等方面。

(一)明清两季均有湖广“麻城孝感现象”^⑧。在明初的“江西填湖广和清前期的湖广填四川”的大移民中,湖广省既是移民的接受地,又是移民往四川的输出地,这个轴心的作用,决定了明清两季移民迁川的主要来源是湖广省。从地缘的角度来看,湖广省离四川近,捷足先登,到四川早、移入四川的人数多。其中,又以麻城孝感乡的为最。

1、在四川、重庆的许多地方文献中均有生动的记载。

清光绪邛州《大邑县乡土志》:“全资两湖、江西、两广、山陕之人来邑垦移生聚,麻城人最多,江西、山陕次之,两湖人又次之。俗传‘湖广填川’,其明征也。”

清咸丰《云阳县志》卷 2:“邑分南北两岸,南岸民皆洪武时由湖广麻城孝感奉赦徙来者,北岸民则康熙,雍正间外来寄籍者,亦惟湖南北人较多。”

民国《南溪县志》:“今蜀南来自湖广之家族,溯其始,多言麻城县孝感乡。”

民国《荣县志》:“明太祖洪武二年,蜀人楚籍者,动称是年由麻城孝感乡入川,人人

言然。”

当代新修的《南川县志》:“湖广移民,尤以麻城孝感乡鹅掌大丘人为多。”

从以上地方文献的记载,可见:一是记载了“湖广填四川”的明征,二是记载了移民多来自麻城孝感乡。

2、从一些移民后裔聚居地的调研和大量族谱关于移民家族的溯源数据,看湖广“麻城孝感”现象。

(1)220 部家谱印证湖广“麻城孝感乡现象”。

四川大学博士生导师胡昭曦教授,是研究“湖广填四川”的老前辈,他远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叶,就发表了《张献忠屠蜀考辩——兼及“湖广填四川”》的著名论文^⑨,笔者于 2008 年夏又电话采访胡教授,并在 2008 年秋新出版的《麻城祖籍寻根谱牒姓氏研究》中,胡老当年 220 支移民家族的家谱(涵盖合川、重庆、南溪、广安、简阳等地,还有四川省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等馆藏的族谱),对 220 支清以前迁川的移民家族中,分地区排比,总计来自湖广省的达 171 家。胡老所说的“清以前移民来川”的概念,绝大多数是指元末明初、明末清前期的移民,只极个别宋代和元初的。这 171 家来自湖广省的移民,占 220 支移民总数的 70%—80%(各地有一定的差异),其中在湖广籍中来自麻城的达 151 家。以上数据印证了明清两季都有湖广“麻城孝感乡现象”,尤以麻城为最。

(2)川北宣汉县明代移民的湖广“麻城孝感乡现象”。

笔者得到新修《宣汉县志·人口志》^⑩,详尽的记载了历代迁入该县的移民,难能可贵。其中,明代迁入 49 支,清代迁入 18 支,元代 6 支,宋代 2 支。笔者现就明代迁入的 49 支移民家族进行分析^⑪:

来自湖广省(包括麻城)和“过籍”麻城

的诸省移民36支,其余13支是从赣(6支)、鲁(4支)、山(1支)、陕(1支)、豫(1支)直抵宣汉。

在明代迁入宣汉的49支移民家族中73.4%从湖北地域到宣汉;在从湖北地域进入宣汉的36支移民中,从麻城县到宣汉的13支,从江西“过籍”麻城的9支,苏、浙、晋、闽、鲁、豫“过籍”麻城的计6支。

从以上分析数据可得知,从麻城(包括“过籍”的)到宣汉的移民达到28支,占湖北地域迁入宣汉移民家族36支总数的70%。这反映了两点:一是移民省籍来自湖广省湖北地域麻城县的多,二是各省籍移民路线取道麻城上川的多。

(3)渠县明清移民家族的“麻城孝感现象”学者傅昌志对该县的明清移民家族来源的调研文章《渠县明清时期迁川姓氏探源》,笔者对此文进行排比,从渠县51个姓氏73支来自湖广、江西、两广等移民家族的祖籍比例分析^⑫:

来源于麻城县境的家族达26支:其中来自孝感乡的21支(其中有15支明确记述了来自麻城孝感乡高阶堰);来源于湖广省湖北地域的6支;来源于湖广省湖南地域的13支;笼统自称来自“湖广”的家族13支。

从以上排比可见,总计来自湖广的移民家族58支,占73支总数的79.4%;在湖广省的58支中来自麻城县境的26支,占湖广省移民家族总数的44.8%;而在麻城县内,从孝感乡迁川的21支,占源自麻城26支总数的80%。

(二)以湖广麻城孝感乡为代表的祖籍记忆^⑬。

在四川、重庆千百万移民后裔的心中,“麻城孝感乡”、“湖广”,早已不是一般的地理概念,而且升华到祖先来源的人文地理概念。在这个人文地理概念中,或详细记有祖先来源的小山村,上川出发的小地名,或只

记得一条小河、一棵大树……,这些祖先生活土地上的山村,代表着祖先的精神风貌,祖先的语言风俗习惯,体现着一个字:“根”。其中又以麻城孝感乡最具代表性。

以麻城孝感乡为代表的祖籍记忆有三个层次:麻城(县)孝感乡,孝感县与隋州一带,湖广省。

1、“麻城(县)孝感乡”是祖籍记忆的第一个亮点。

麻城(县)孝感乡的移民来源最大,移民传承的故事也最多,数百年来在四川、重庆有着崇高的威望。千万麻城籍移民迁巴蜀的后裔,其谱牒记载或口碑相传有祖先在麻城居住的祖屋、上川的始发地等,这些都是祖籍记忆。

2、孝感县、隋州地域的祖籍记忆

孝感县、隋州与四川移民有数百年的渊源。元末红巾军农民起义的西路军领导人明玉珍是湖广隋州人,其兵将家属也多为同乡人。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正月,明玉珍在重庆府建立了大夏政权,历9年。是时湖广省的“乡亲”投奔大夏。

孝感县(今孝感市)在移民的源流方面虽不如“麻城孝感乡”那样著名,但在一些川、渝移民后裔的心目中,它也是祖先的故乡,是祖籍地。重庆现今还有孝感移民同乡会,有众多移民后裔。孝感县与麻城县的渊源要追溯到明清时期,有不少麻城人迁徙到孝感县,其后裔至今在孝感称晚上睡觉为“回麻城去了”。

3、“湖广省”(湖北、湖南地域)的祖籍记忆

“湖广省”的祖籍记忆是一个大范围的祖籍地,是祖先故乡的大方位。在战乱和沧桑岁月的变迁,或丢失家谱,或失去长辈。详细的祖籍地未能传给后人,后裔只记住湖广这个大范围的祖籍地。

(三)麻城孝感乡何以永存在祖籍记忆

中。

孝感乡在明成化八年(1472年)“因户口耗尽”就被取消了乡的建制,合并到仙居乡。

但在清前期的“湖广填四川”大移民时期,“孝感乡”仍然是移民的发源地、中转地,并且在移民家谱和口碑中传承下来。笔者认为有两大原因:

一是地缘条件。

本文前已详述麻城孝感乡的区位优势,是从水路直通长江上川的黄金口岸,在古代交通的条件下,只有水路是“快车道”,故而孝感乡并未因取消乡级建制而改变其水路黄金码头的优势。

二是移民迁徙的血缘地缘纽带。

这就是明清移民迁川的同宗同乡连续迁徙的血缘地缘纽带,始迁祖到达蜀中定居后,同宗、同乡的人相继迁来。以同宗——血缘同乡——地缘的纽带关系,迁徙到四川新乡聚居组合(社区),时间跨度数十年、上百年,这样连锁移住就把原籍地的语言、风俗、老地名、老码头等传播到四川新乡,并在四川新乡的聚族聚籍之地建立了一个原乡的人文社区。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自然经济条件下,长久传承下来。无疑作为著名的祖籍圣地,麻城孝感乡之名长久传扬,这是人文地理的一种传承,构成移民文化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四)祖籍记忆与精神家园

爱家——爱故乡——爱祖国,这是我们的精神家园的三个层次。以湖广麻城孝感乡为代表的祖籍记忆有诸多典型生动的事例:

1、熊氏移民后裔珍藏“麻邑四乡坛域图”印模——麻城孝感乡区位的物证。

麻城熊氏是大姓,迁川、渝和外省的熊氏宗亲,常有到麻城寻根问祖的。2007年4月,中华熊氏宗亲会在麻城召开。赴会的来自安徽的熊连可先生,带来了一枚珍藏多年

的印章寻根,以此印章证明他的麻城祖籍。这是祭祀时道士打谯举行仪式时用的印章——“冥合章”,又称“翻天印”。该印章上刻有麻城(麻邑)四个乡的区位示意图:四个乡呈“X”形状,亭川乡位于县境东,状如葫芦形;孝感乡位于县境南略偏西,顶部疆域超过X形的中心点;仙女(居)乡位于县境西部面积最大;太平乡位于县境北部,面积最小(其东部和西部的疆域皆分别有亭川、仙居的跨倚而变小)。在麻城当地的历史文献资料中,至今尚未看到四个乡均在的区位图,只有合并后的三乡图。这枚印章可谓是惊现麻城,其价值远远超过持章人寻根问祖的物证,而是孝感乡区位的物证。

在现今的麻城原古孝感乡境内,有的百姓祭祀祖先举行仪式,报告地址仍用孝感乡名。孝感乡已溶入当地的祭祖丧葬民俗中。

2、邓垦(邓先修)的麻城孝感乡祖籍记忆。

麻城孝感乡这个移民圣地,给川渝移民后裔很大很深远的影响,以至于幼年和少年时期就铸成了很强烈的认同感和回归感,有的成为了一种刻骨铭心的祖籍记忆,伴随着大半生的历程。麻城孝感乡的祖籍记忆不仅发生在著名老作家艾芜身上,而且发生在省部级干部邓垦(邓先修)身上。

在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诞生一百周年之际,湖北省媒体记者采访^④了在湖北省工作三十余年离休的省级老干部邓肯。93岁的邓垦(谱名邓先修)是邓小平(谱名邓先圣)的胞弟,他回忆起63年前和哥哥小平见面时的情景……邓老还透露说“我的老祖宗还是麻城人,麻城县孝感乡,后来才移民到四川,300多年了。”记者说到“很多文章和资料都说小平同志祖籍是江西的吉安”,邓老说:“江西吉安,那是毛毛写文章那么说的,我不相信,我的老祖宗是湖北麻城的,老祖宗生了两个儿子,大儿子生了

六个儿子叫“长六房”，二儿子生了四个儿子叫“二四房”，我们是四房的后代，第一代的祖宗，第二代的祖宗，我们清明节都要去扫墓，这是很准确的。”邓老还说：“后来我还到麻城去过，问了麻城的同志，他说历史上有一个孝感乡，后来不知什么年代这个乡取消了，但邓家塆还在，还有很多姓邓的。”

笔者对邓小平家族明清入川祖和明清世系作过系统研究^⑤。清乾隆《广安州志·氏族志》(简称旧志)和民国早年出版的《广安州志·氏族志》明确记载了广安姚平邓氏：“邓氏。旧志其先祖本江西庐陵人，明洪武中有鹤轩者以荐举南京兵部员外郎入川，遂籍广安、北姚平家焉……其祖墓均在姚平，有宗祠。”民国三十六年邓氏修成的《邓氏分谱》详记有邓氏的明代九世祖世系、清代世系，均与广安州新旧志一致，从来没有始迁祖原籍麻城孝感乡的记载。在此因篇幅所限，不展开论述。

现将邓氏与麻城的有关线索剖析如下：

第一，邓氏清代一世祖邓嗣祖，就是家族子孙口碑相传的“白衣秀士”。“白衣秀士”携妻、幼子及弟从广东返海上，千里迢迢，路经麻城孝感乡。并在麻城短暂休整，与麻城当地邓氏联系的可能性极大。

第二，该支邓氏清代一世祖(邓嗣祖)的生父邓昉是明初迁广安的始祖邓鹤轩之八世裔孙。无疑，邓嗣祖的十大房(长六房、二四房)子孙们皆是明上川始祖邓鹤轩的后裔。邓鹤轩上川的路线无论是从南京起程，还是从江西起程，均要走水路。因而笔者认为：邓鹤轩途经麻城的概率很大，在麻城作短暂停住的可能性同样很大，与麻城的江西乡亲同姓氏的联络也很有可能。所以邓鹤轩与麻城也是有点关系的。

第三，在麻城学者李敏编写的麻城邓氏谱牒提要中，两支邓氏——西乡邓氏、北乡邓氏，均在明初来自江西。其中，有宋埠镇

邓家塆的邓氏即西乡邓氏。其始迁祖的三个兄弟后来又返回江西原籍。所以说，邓先修(邓垦老)亲自去麻城邓家塆的那家邓氏，就是江西籍的移民后代。麻城的人口中，百分之七、八十人的祖先来自江西，民间素有“江西种”之说。

第四，笔者认为，邓先修(邓垦)少小离家出远门读书、参加革命，没有看到过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编印的家谱——《邓氏分谱》，晚年也没有读到清康熙《广安州·氏族志》，对自己家族的历史知道得不准确。加之幼时家乡的其他邓姓都是清初湖广麻城上川的，又加之自己“十大房”的一世祖“白衣秀士”也从麻城来，因此认为自己的祖先是麻城人。这个儿时的祖籍记忆是刻骨铭心的，似乎是难以改变的。加之中年以来在湖北工作、生活了30多年，湖北是第二故乡，倍感亲切。

著名老作家艾芜(汤道耕)儿时的祖籍记忆也是麻城孝感乡。他也不知道有族谱《汤氏族谱》^⑥就少小离家闯天下去了，在他的处女作发表并成名后，他还把麻城孝感乡的祖籍记忆写进了他的自传中发表。当然，艾老得悉《汤氏族谱》中自己家族的历史后，一再表示按照族谱中的记载办，希望大家协助他更正自己的族籍地是湖广宝庆府武岗。

可见湖广麻城孝感乡的祖籍记忆影响何其大，这个人文地理概念是何等的强烈。

(五)明清移民后裔寻根的双倍效应

族谱家乘是家族源流播迁、人口繁衍的历史记载，是寻根问祖的关键依据。有成都媒体记者郑褚著文形象的比之为“族谱——寻根密电码”。在这个“密电码”中记有三个要素：一是家族的始迁祖名字，二是祖屋地名或迁徙始发地名，三是家族的字派(辈派)。这三个要素构成家族血缘关系的连接链。有了家谱，寻根对接成功的概率大。

1、李硕勋李鹏家族寻根麻城对接成功。

四川高县庆符李氏是中共革命先驱李硕勋和国务院原总理李鹏的家族,庆符李氏家谱记有上川祖李朝翰名及李氏班辈,还记得有麻城松鹤村李家坝的祖屋,经亲属实地确认李家坝祖屋;又经诸多努力寻找关键家谱,在麻城市志办钟世武主任的努力下,终于找到了李成书先生珍藏的祖传《麻城李氏家谱》。该谱详记始迁麻城一世祖以下的十代世系,在第十代中有李朝翰(即李鹏家族明崇祯中叶上川始祖)。这样川麻两地李氏家谱对接成功,寻根问祖成功。

2、众多移民后裔的漫漫寻根路

由于年代久远,战乱和世事的变迁,众多的移民家族或谱谍被毁丢失,或战乱中迁徙展转亲人失散,寻根对接难度大。李世取教授于2003年从中国人民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退休后,四次到麻城寻根^①。其先祖是明初从麻城孝感乡上川,清初战乱逃到贵州,再迁回重庆府定居歇马镇(今北碚境内)皂角山,因战乱丢失了家谱、亲人离散,无法得知从麻城上川始祖名、也没有家族字派等“密电码”。李世取作为麻城孝感乡的移民后裔,四次到麻城寻根未果,并在网上呼吁,在寻根心灵旅程中,有着极深厚的寻根寻祖情结。李世取是众多移民后裔漫漫寻根路上之一例。

3、麻城孝感乡不仅是大量的清代迁川移民后裔的祖籍地,还是明代迁川移民后裔的祖籍地。长期以来明清的迁川渝移民的后代寻根问祖汇在一起,反响很大,是双倍的历史反响。

综上所述,麻城孝感乡是明清两季的移民发源地,其历史效应是双倍的,在我国明清的移民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特别是在建设

我们的精神家园有着深厚的历史内涵。在麻城原孝感乡的高岸河码头址,2007年,由麻城县人民政府分管的领导牵头,由南湖办事处党政办列为重点项目大力推进孝感乡移民文化精神家园。2008年4月,在“首届中国·麻城杜鹃文化旅游节”隆重举行之际,举行了“孝感乡移民始发地——高岸河”纪念碑揭牌仪式。高岸河麻城孝感乡始发地已规划将建成大型祭祖园,并有系列配套设施,迎接来自四川、重庆,来自全国各地和海内外的广大寻根者祭祖旅游,迎接各界人士、专家学者考察孝感乡移民圣地,共同建设我们的精神家园。

(作者为四川客家研究中心副主任、四川省志编委会编审。收入本刊时个别地方有改动。)

【注释】

①孙晓芬主编,钟世武、李敏副主编《麻城祖籍寻根谱谍姓氏研究》:笔者在第四篇提出“麻城孝感乡明清两季的移民发源地双倍的历史效应”的论点。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第1版。

②江益林《“高杆堰”正名新说》,载凌礼潮主编《麻城文史》2008创刊号第42—43页。

③有的移民在麻城住数月或数年,又迁往四川等新入籍地,谓之“过籍”。

④清康熙九年版《麻城县志》第21页,清乾隆六十年版第50页。麻城市地方志办公室收集再版。1999年,麻城市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⑤麻城市志办有关农



民起义的资料,见李开寿主编《五彩麻城·历史麻城》等,麻城市政府、麻城市志办等编印。鄂黄麻图书内字(2008)16号。

⑥钟世武《概述麻城》、曾锋《麻城移民概况》见《麻城祖籍寻根谱牒研究》第一篇《概述概况篇》。

⑦见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导论》《移民的迁移过程》:笔者引用有关生存型移民的论点,全文第23—35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

⑧孙晓芬在2005年秋出版的专著《明清的江西湖广人与四川》提出了湖广“麻城孝感现象”的论点。详见该书81—102页。

⑨《张献忠屠蜀考辩——兼及湖广填四川》,收入胡昭曦著《巴蜀历史文化论集》第107—189页,成都,巴蜀书社出版,2002年5月第11版。

⑩孙晓芬《清代前期的移民填四川》《十七县移民姓氏百例》第160—165页,首次全文引用。新修《宣汉县志·人口志》中的移

民姓氏来源,现今笔者分类排比之数据。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2月第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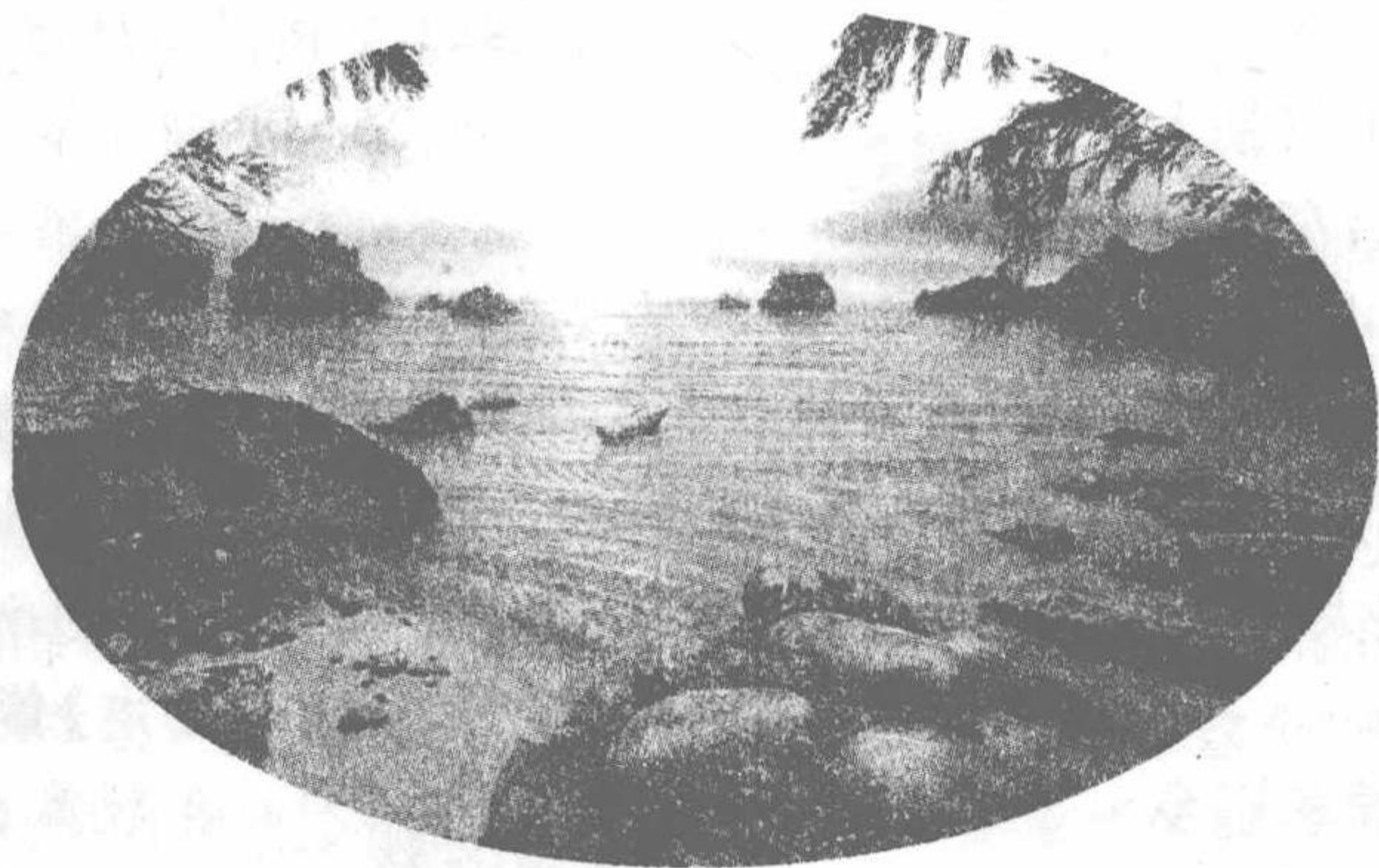
⑪孙晓芬主编,钟世武、李敏副主编《麻城祖籍寻根谱牒姓氏研究》:第四篇480—482页,分析研究宣汉明代迁入宣汉移民家族的湖广“麻城孝感现象”,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第1版。

⑫孙晓芬在2005年秋出版的专著《明清的江西湖广人与四川》提出了湖广“麻城孝感现象”的论点。详见该书81—102页。

⑬孙晓芬在2005年出版的《明清的江西湖广人与四川》一书中详尽的进行排比分析(第50—58页):提出了“祖籍记忆的人文地理概念”的论点。

⑭见2004年《荆楚大地的怀念·湖北电视台纪念邓小平百年诞辰系列报道》。

⑮⑯详见孙晓芬专著《明清的湖广人与四川》:《广安姚平邓氏家族的播迁(上)(中)(下)》185—264页。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1版。



民间族谱与“麻城孝感乡”

历史记忆

苏东来

作为历史上八大移民圣地之一的“湖北麻城孝感乡”，一直以来便是川渝民众心目中的故乡所在地。流传了近五百年的“问我祖先在何方，湖广麻城孝感乡”的民谣，更是反映了移民后裔对于家族迁徙历史、祖先功德的一种历史记忆。无论是正史，还是地方文献、民间资料在实质上都是对以往历史的一种记忆。而族谱作为民间记忆的主要载体，它不仅记述家族渊源、历史变迁、祖先事迹，还承担着弘扬祖德、约束子孙行为的功能，从而达到“各亲其亲、各子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的目的^①。正是基于族谱对于家族历史变迁记忆的记述，从而保存了大量有关家族历史的迁徙的信息。谭其骧先生指出：“移民史使用族谱在乎其族姓之何时自何地转徙而来，时与地既不能损其族之令望，亦不能增其家之荣誉，故谱牒不可靠，然惟此种材料则为可靠。”^②移民后裔在追忆祖先迁徙时间、迁徙原因、迁徙地点等问题上所留下的信息，是可以而且应该作为历史研究的依据的。近年来，四川学者在移民史、方言习俗等方面运用大量族谱进行研究取

得了可喜成果^③。笔者在前辈学者研究运用族谱的基础上，通过搜集整理 488 部民间族谱，围绕“麻城孝感乡”现象，就湖广麻城尤其是孝感乡的移民后裔是怎样传承家族历史记忆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移民时代的记忆

在中国移民史上，元代以来尤其是元末明初、明末清初的“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移民潮，开启了自东向西的迁徙流向。虽然“湖广填四川”作为一句歌谣在民间传唱且少见于正史记载，并未引起当时学者过多的关注；但是大量迁川移民后裔却对于此歌谣一致认同，并通过移民族谱对家族的迁徙时间、祖籍地作了详尽的记载。

由于以“湖广填四川”为背景的湖广籍移民迁川活动从 13 世纪持续至 18 世纪，时间长达近 500 年，以至民间族谱在追忆祖先的历史上，往往存在着时代交混的问题。笔者通过对搜集到的 488 部麻城孝感乡移民后裔撰写的族谱所呈现出来的历史信息进行初步整理，发现民间族谱在涉及祖先迁入

四川的时代记忆上,可以细分为8个时段:(1)元代:元代及以前迁川家族。(2)元末明初:元末、明初时迁川的家族。(3)明夏时期:明夏政权时入川或洪武元年至四年入川家族^④。(4)洪武时期:明洪武五年至洪武三十一年迁川的家族。(5)明代:洪武三十一年以后迁川的及载明明代迁川的家族。(6)明末清初:明末、清初、顺治时期迁川的家族。(7)康熙时期:载明康熙时期迁川的家族。(8)清代:清雍正、乾隆等时期迁川的家族。

以上八个时段上迁入四川的家族数量及比例,详见下表:

表一:八个时段迁川家族的数量及比例图:

移民时代	家谱总数	各时期家谱数	所占比例	总比例
元 代	488	7	1.43%	1.43%
元末明初		101	20.70%	50.82%
明夏时期		62	12.70%	
洪武时期		85	17.42%	
明 代		112	22.95%	22.95%
明末清初		72	14.75%	22.74%
康熙时期		34	6.97%	
清 代		5	1.02%	
时间不明		10	2.05%	2.05%

通过对表一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个结论:

(一)“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是历元至清不间断的持续近五百年的波澜壮阔的移民事件。从时间的连续性上看,可以把八个移民时段划分为三个大的移民时期:

1、元末明初:(包括元代、元末明初、明夏、明洪武时期)此时期始自元代,最早在元代中期,已有麻城孝感乡籍移民迁川活动。例如:王氏,原籍山西太原初迁麻城,元大德年(1298——1307)避兵乱迁川之宣汉双河。^⑤又如:赵民忠,原籍湖广麻城孝感乡,

元仁宗延祐七年(1320)迁川之简阳大桠口枷檐湾。^⑥当然,此时迁川的人数是零星的,从统计来看也只有7例,占总数的1.43%。

麻城孝感乡移民迁川在经过元末战乱、明夏招抚移民至明洪武组织移民三个时期而达到高峰。此时大量家谱记载了这三个时段的情形。

元末:如洪氏,原籍湖广麻城,元末避徐寿辉之乱迁川之涪陵龙潭。^⑦

明夏:如李祖一,原籍湖广麻城孝感青山。因明夏招抚,兄弟七人迁川之仁寿。^⑧又如:何德明,江西庐陵迁湖广麻城,为明玉珍将,子舜卿归附明朝,落业涪州。^⑨

洪武时期:如杨汉杰,麻城孝感人,洪武三十一年与旺杰、玉杰兄弟奉旨迁川之薄江高桥乡。^⑩又如:姜明继,湖广麻城人,洪武十四年从军征云南平凉山夷后守大渡河落业黎州。^⑪此一时期的移民运动以湖广人为主,占到整个移民的50.82%。

2、明代和平移民时期:在移民的高潮期过后,移民活动并没有就此终止。在经过明代二百余年的和平发展时期依然保持了它的连续性;而此时期的移民还是以湖广人居主,但是在移民的方式上呈现出多元化。据该表统计在明代麻城孝感乡籍移民家族112例占总数的22.95%。如曾氏,湖广麻城人,明永乐十三年迁四川井研县东。^⑫又如李乔,原籍湖广麻城,明代宦游入川,落业四川庆符县。^⑬李富阳,原籍湖北麻城孝感乡,明代迁四川资阳丰裕、资州西二里。^⑭可见在整个明代进入相对和平发展时期,这一移民运动仍未停止。只是与之前的元末明初的移民运动和之后的明末清初移民运动相比,无论在规模、数量、影响上都比较逊色。但是我们并不能因为它的逊色而忽略了它的存在,跳过对明代的这一和平时期的移民运动的考察,是无法从整体上来把握整个“湖广

填四川”移民运动作为一个历史时期重大事项的考察的。

3、明末清初及清代的移民运动:它是在明末战争的推动下,是元末明初与明代和平时期移民运动的继续,它包括明末清初、康熙时期、清代三个时段。在这一时期移民运动的发展趋势是:从原来的因明末战争避乱入川,发展到后来清廷平定四川开始大规模的招抚人民迁川,从而出现十余省份移民齐聚四川的移民高潮。据曹树基先生研究认为:“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四川人口增加达到顶点,以后人口开始渐次下降。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基本停止”。^⑮四川自此结束了近五百年的移民大潮(1298——1776),^⑯呈现出五方杂处的移民社会。因此笔者认为,在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的时段划分上,不应该割裂明代和平时期的移民运动,不应该以一次说、两次说或朝代说来划分这次移民运动,而应该把自元以来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来看做是一个考察的整体。

(二)在“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中,麻城孝感乡籍移民数量呈现出由高潮到低潮递减的规律。

在这一历经近五百年的大移民运动中,麻城孝感乡籍的移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贯穿于移民运动的始末。在元末明初,麻城孝感乡移民是移民运动的主力,无论由于元末红巾军之乱迁川,还是跟随明玉珍部队上川,还是洪武时期组织的复迁黄、麻人来实兹土。据表一可知,上述三个时期湖广移民迁川家族的比例占一半以上。可以肯定的说,此一时期是麻城孝感乡移民迁川的高峰期。正是由于麻城孝感乡移民不断涌入四川,这才导致孝感乡在明成化八年(1472)因户口消耗而撤销。^⑰

但是这并没有影响麻城移民的迁川,从

而使得在整个明代麻城移民仍然源源不断的迁向四川。此一时期的移民数量占到所搜集到族谱总数的22.95%。其后,在明末清初的移民运动中,由于政府的号召,移民省份从原来较为单一的湖广省,逐渐扩展到湖广、广东、福建、浙江、江西等十余个省份。而麻城移民只占到所搜集到族谱的22.74%。又据宣统《成都通览》对当时成都的人口构成所作的统计,“现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人”:湖广占25%、河南、山东5%、陕西10%、云南贵州15%、江西15%、安徽5%、江苏浙江10%、广东、广西10%^⑱等。可见在这次移民中,省份来源广,湖广移民人口在构成上没有占到优势。加之,此时的湖广包括湖南,如果除去湖南一半人口,则整个湖北省移民只占四川人口的12.5%,显然也就结束了以麻城为主体的湖广人在移民人口中的优势。虽说众多的移民后裔自称祖籍麻城孝感乡,其中确实有一部分祖籍为麻城或麻城孝感乡;但是更多的是一种冒籍心理在作怪。因此,从一个纵向的时段可以看出,麻城孝感乡移民在这一历史时期移民数量并非一成不变的。如果割裂了“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的连续性,就不可能完整地呈现出移民运动的起伏动态。

二、移民原因的记忆

中国人受儒家文化熏陶,向来有“安土重迁”的思想和“父母在、不远游”的文化心理。如果没有特殊的事件发生,中国人是不会丢下故乡、祖先坟墓而另迁他乡的。在历时数百年的移民运动中,关于祖先为什么离开故乡而千里迁川,在家谱上一般都有明确的记载。在笔者搜集到的488例家谱中,有明确记载祖先移民原因、动机的家族共126例,详见表二。

表二：移民原因统计表

原因 时期	避难 避乱 避兵	宦游 入川	奉旨 奉诏 奉命	从 军	贸 易	贬 谪	归 隐	时 期
元代		4						4
元末 明初	35	2	4	1				42
明夏 时期	2		5	4				11
洪武 时期	6	4	9	13				32
明代	2	9		1	1	1	1	15
明末 清初	16	2		1				19
康熙 时期					1			1
清代			2					2
总数	61	21	20	20	2	1	1	126
所占 比例	48.25%	16.67%	15.87%	15.87%	1.57%	0.78%	0.78%	100%

通过表二可以清晰的看出，移民迁川的原因和比例情况如下：

（一）避难、避乱、避兵入川。此原因占入川家族的将近一半，集中发生在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战争这一特定的时代背景之下。其入川情形又可以分为两种：

1、地主、贫民因战争、天灾等而逃难、避兵、避乱入川。例如：罗田祥，湖广麻城人，元末避难入川前四川营山鸡山之阴。^⑨王子宗公系湖广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梧桐村黄桷树坎人氏，“麻城第一家”，因避陈友谅乱，明洪武元年与其子觉高、觉兴、觉奚，挽舟逆水而上入蜀。落业于嘉定、仁寿、资中、资阳。^⑩张氏，湖广黄州府麻城孝感乡，元末因避红巾军之乱，迁四川成都府内江县西乡黄河镇两河口。^⑪石氏，原籍湖北麻城，明末避难入川落业宣汉天生。^⑫程氏，原籍麻城，明末避难入川落业宣汉天生^⑬。

因投奔红巾军，对抗朱元璋，而在明初避难入川：如“宋张文，湖广麻城人，明初恐

受牵连灭族，三兄弟改为宋、毛、张三姓避难四川峨边。^⑭樊继川，江西迁麻城，曾助陈友谅拒明，太祖定鼎，惧逮率子孙迁蜀之江津永川。^⑮吴氏，湖广麻城孝感乡，明洪武年间附逆，惧逮，避难迁川涪陵龙潭。^⑯

2、和平时时期逃罪入川。如王学仲，麻城孝感人，明万历八年避难入川之遵义府后迁夔州合州。^⑰又如：王氏，麻城孝感人，明嘉靖年间避难四川合州。^⑱

（二）宦游入川。多为外省人赴川任官而定居四川。其中，可分为以下情形：

1、文官任职而迁川。如：新繁“大陌林杨氏之先，家湖广麻城孝感乡，元季有名世杰者，由礼部尚书迁蜀总管，因家于射洪，其后始居于新繁。”^⑲陶文斌，湖广麻城人。洪武初，绵竹始建，文斌公首知邑事，后卒，子孙家焉。”^⑳

2、军职镇川守土迁川。如：王移，太原迁麻城，明末授宁远将军入川镇守临邛，子孙世系。^㉑又如：张近岑，湖广麻城，洪武间从军征云南有功，授千忠留守黎州，遂家焉。^㉒

（三）奉旨、奉诏入川。此原因入川家族多为政府组织的大规模的移民家庭。其中，又分为几种情形：

1、明夏政权招抚入川。如：元末李祖一公世居麻城孝感青山，陈逆之乱，乡人明玉珍据成都，招抚乡里，吾祖兄弟七人（洪武年间）迁蜀，因于祖一公载籍仁寿。^㉓黄氏，原籍山东，元代迁江南，五代后迁麻城孝感乡，明洪武元年奉命迁川。^㉔

2、明洪武组织移民入川。如：杨汉杰，麻城孝感人。明洪武三十一年与兄弟旺杰、玉杰迁蒲江高桥乡。^㉕简阳汪氏远祖，原籍麻城县孝感乡蒿枝坝大松树，至明洪武四年，同胞兄弟四人奉旨迁川。^㉖

3、清代组织移民迁川。如：马氏，湖广麻城人，清乾隆年间奉命垦荒至四川忠县石

宝寨沙地坝。^⑦王氏原籍山阴,后迁江西临川,再迁湖北麻城,清代奉旨入川之重庆通江。^⑧

(四)随军入川。多为跟随起义部队入川或跟随政府军队平蜀入川。其中,又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形:

1、跟随明玉珍军队入川。如何德明,江西庐陵迁湖广麻城,为明玉珍将,随玉珍军入川,后子舜卿归附明朝落业涪州。^⑨陈氏,原籍孝感陈家河,先代于元末随明玉珍军入川。^⑩

2、明洪武平蜀入川。如李文富,湖广麻城人,洪武四年以御林军征夏明昇后驻黎州,军屯子孙家焉。^⑪刘启,麻城孝感人,明山海关总兵,洪武四年入川居简州老龙场。^⑫

3、明代和平时期从军入川。如潘荣富,湖广麻城县孝感乡高阶堰,明弘治三年从军入川,迁四川绥定府达县,十三世孙潘元栋迁渠县清河坝。^⑬

4、明末随张献忠军队入川。如武氏,湖北麻城人,明末从军入川,居四川宣汉东林。^⑭

(五)贸易入川。如顾金徐,湖广麻城人,明嘉靖十四年贸易入川,落业于黎州尚礼乡苟家营。^⑮刘廷奇,原籍湖广麻城县,康熙三十九年先命家人刘俊臣,到四川中江“相土”“定宅”,然后偕妻“沿途贸易”,到中江定居。^⑯

(六)贬谪入川。如文天富,湖广麻城人,明代因贬谪迁川之潼川长丰。^⑰

(七)弃官归隐入川。如刘朝弼,湖广麻城人,明建义将军,入川,弃官归隐眉阳。^⑱

通过以上家族迁川原因的列举可以得出以下三个结论:

1、历时近五百年的“湖广填四川”大移民运动,是诸多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在众多的原因中由于战争导致的避难、避乱、避兵这种非正常的人口迁徙,是移民大量迁入四川的主要原因,所占的比例近50%左右。

2、移民迁川集中发生在元末明初和明

末清初两个时期,迁川人员的身份存在有明显的区别。在元末明初,由于红巾军爆发于两湖、江淮地区,严厉打击当地的地主士绅。因此在避难、避兵的迁川移民中,尤以官员及地主等为多。无论是避难入川的“麻城第一家”王子宗,还是文官杨世杰,或是军官李文富、刘启等,这批移民具有相当的经济实力和丰富的文化知识,在战后恢复和发展四川经济、文化事业中充当了传播者的重要角色。正因为如此,在明代,麻城孝感乡籍的移民后裔不仅人才辈出,而且获得了极高的名望。以至麻城孝感乡便成为四川社会中一块金字招牌,明代新都杨升庵家族就是其中出色的代表。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明末清初的移民主体则是农民为主。其中有一部分是随张献忠部队入川士兵,在张献忠失败后,士卒大多在四川归农落业。另一部分移民的主力则是在战争结束后,响应移民填川政策号召,以湖广、广东、江西等省份的百姓居多。他们因原乡遭遇天灾、人口压力、土地狭小而迁川。所以,在此次迁川的人员构成中,不仅省份多、人口构成复杂而且经济实力和知识层次都普遍较低。在这种背景下,此阶段迁川的麻城籍移民,无论在移民数量和经济实力上都不如前者。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形成麻城移民在四川的社会地位,加之战后很多逃亡在外的麻城籍四川人的返乡,新老麻城移民的结合,使得麻城籍移民重新在四川站稳了脚跟,因此,在整个清代,麻城籍移民依然在四川社会中享有较高的知名度。

3、战争是造成移民最为直接的原因。尤其在战争时期,此时的移民除了避难、避兵入川的地主、平民外,移民中还有许多人是从随部队迁川。尤其是在明夏政权入川、明洪武平川及张献忠入川等大规模的战争时期,一大批军队从省外进入四川,在战争结束

后,一部分士兵归农落业,或是因戍守而落籍四川,由此成为迁川移民的先行者。而当战争结束之后,统治者为医治战争创伤,便出台了迁民实川的政策,于是,民间族谱上便出现了所谓奉旨、奉诏、奉命入川的情况。这种移民虽然是在和平时期进行的,是正常的移民的输出,但在大移民运动中不仅数量上占很大比例,而且是恢复战后经济的主力。在战争背景下迁居四川的移民们,彼此之间也许有先来后到之别,但是在恢复四川经济方面都做出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移民地名的记忆

地名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给地理实体、行政区域或居民点所起的名称,往往有很强的延续性和稳定性。^⑨许多地名实体因为历史上发生的事件而得名,即使社会遭遇重大

历史变故,地理实体消失了,但地名却仍会延续下去。“湖广填四川”大移民运动持续时间之长、波及范围之广,其影响十分深远,这也反映在移民地名上。

麻城孝感乡因户口消耗于明成化八年(1742)被撤销,但它却让川渝数千万民众魂牵梦绕,难以泯灭。由于孝感乡是迁川移民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即使到了四川定居,心中那份眷恋与不舍之情依然十分强烈。因此,当定居新地建祠修谱时,沉淀在心底的浓浓乡愁便会喷涌而出,于是在家谱上,往往郑重地写上原籍或祖籍湖广麻城孝感乡,甚至细微到村名,乃至村边的一棵树、一道湾、一丘土、一个小地名都丝毫不遗漏。笔者根据搜集到的家谱,凡载有孝感乡小地名的,共有 37 例^⑩,详见下表:

表三:移民家谱中孝感乡小地名统计表

序 号	迁川始祖	原 乡 地 名	迁 川 时 间
1	王子宗及其子	孝感乡梧桐村黄桷树坎	明兴武元年
2	李祖一兄弟	麻城孝感青山	明夏时期
3	杨本芳	孝感乡五里塘	明洪武五年
4	张拱京	元末避乱迁麻城高杆簪	明洪武九年
5	陈 氏	孝感乡鹅井大丘	清康熙五年
6	陈万荣	陈思懿宋嘉佑七年(1062)迁麻城县麻城庄(筷子巷),后世陈万荣于明万历四十三年由孝感乡迁川	明万历四十三年
7	吴万一	麻城肖箕岩	明洪武二年
8	叶端详	麻城高干(阶)堰铜鼓滩	明洪武二年
9	叶 龙	孝感乡叶家寨高家淹	明成化二年
10	胡大海	孝感乡教子坊	清康熙末年
11	傅氏兄弟	孝感乡扒凿岭黄泥嘴	明 初
12	罗招贤	罗衍明嘉靖后期迁孝感乡月儿湾,四世孙罗招贤兄弟顺治年间迁川	清顺治年间
13	李君佑	孝感乡细鼎子高阶堰谢家庄	元 末
14	雍云鹤	孝感乡高阶堰 ^⑪	明洪武十年
15	严德清	孝感乡高阶堰鹅公大丘	清康熙后期
16	杨 氏	孝感乡大石板洗马凼杨家村第七层	明洪武二年
17	刘宁喜	麻城县红豆村高杆堰	清康熙末年
18	陈 氏	孝感乡洗脚河陈家堰	明 初

序 号	迁川始祖	原 乡 地 名	迁 川 时 间
19	宗 氏	麻城孝感乡高水井	明 初
20	邓 氏	孝感乡邓家塆 ^⑤	自江西迁来世居麻城
21	汤进贤	孝感乡高感院 ^⑤	宋嘉定元年
22	陈华能祖上	孝感陈家河 ^⑤	元 末
23	张忠民祖上	孝感张家湾 ^⑤	
24	何 氏	子孙世居湖北麻城孝感高家堰、洗脚河、太平坝、千家村凤凰山一带皆其族也。 ^⑤	明洪武二年
25			
26			
27	向万恩	元末,文秀公避乱麻城县,安居乐业,不知相传数代,至本支始祖万恩公住孝感乡向家坪、中坝、陈家沟一带 ^⑤	
28			
29			
30	杨志才先祖	孝感乡竹林湾 ^⑤	
31	郭 氏	孝感乡沙子场郭家嘴狮子岩儿子湾 ^⑤	明弘治二年
32	杨 氏	孝感乡马桑坪 ^⑤	
33	杨汉杰	孝感乡踏水桥 ^⑤	明洪武三十一年
34	汪氏兄弟	孝感乡蒿枝坝大松树 ^⑤	
35	刘千二	孝感乡锁口河 ^⑤	明洪武二年
36	王九禄	孝感乡复阳村	明洪武四年
37	李元仁	麻城孝感李家大土坎	元 末

以上列出的地名,经与今麻城市相关地图显示的地名相对照,能够符合的有 11 个分别是:

- 1、麻城孝感青山(今麻城市顺河集镇南部);
- 2、孝感陈家河,(今顺河集镇西湾村北部);
- 3、麻城孝感乡狮子岩(今张家畈镇蔡店河村东南);
- 4、麻城孝感乡大石板(今夫子河镇卢家河西部,参见:1993 年 7 月《麻城县志》附麻城区域图);
- 5、孝感乡高家淹、高干(杆)堰、高阶堰(今宋埠镇东北部,参见:江益林,《“高杆堰”正名新说》载《麻城文史》2008 年创刊号);
- 6、麻城孝感乡竹林湾(今龙池街道办事处西北部);
- 7、孝感张家湾(今阎家河镇西北部,参见:1997 年 9 月麻城交通游览图);
- 8、麻城孝感乡邓家塆(今鼓楼办事处与中馆驿镇交界处);

- 9、麻城孝感凤凰山(今阎家河镇东北部);
 - 10、麻城大松树(今三河口镇马家河与刘家河之间,参见:麻城行政区划图电子版,麻城信息服务部制);
 - 11、麻城孝感乡锁口河(今顺河集镇与乘马岗镇交界处,参见:凌礼朝主编:《歧亭古镇杏花村》,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 年)
- 此 11 地名中,青山、竹林湾、邓家塆、陈家河、高阶堰等、锁口河、大石板等 7 地,位于麻城市区西南方向。大致包括今顺河集镇、龙池办事处、鼓楼办事处、宋埠镇、中馆驿镇、夫子河镇等。另据麻城《赵氏族谱》记载,洪武年间祖上迁居香山,喜其风土定居。后有人迁四川两河口定居,不改乡音。香山也位于麻城西南与红安交界处,故有此“香山”极大可能为原孝感乡旧地。其他 4 地名张家湾、狮子岩、凤凰山,大松树,大致在今麻城市阎家河镇、三河口镇、张家畈镇等从麻城市区东北、东南方。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孝感乡的所属范围极有可能包括现在的麻城西南平原地带的诸乡镇及红安县等部分乡镇,在麻城市西南方与红安县东南方向的交界处。但由于孝感乡在明代成化八年被并入仙居乡,后设立黄安县,麻城又割去二十里,因此,孝感乡在经历重大历史变故后加之缺乏史料的有效支撑的情况下,我们只能从现有的资料来窥测孝感乡的大致面貌。

(作者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

【注释】

①《礼记·大同篇》。

②谭其骧:《长水集》(上),人民出版社,1987年7月版,第300页。

③胡昭曦:《巴蜀历史文化论集》,巴蜀书社出版社,2002年。

黄尚军:《四川方言与民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

崔荣昌:《四川方言与巴蜀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

孙晓芬:《清代前期的移民填四川》,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

孙晓芬:《四川的客家人与客家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2000年。

孙晓芬:《明清的江西湖广人与四川》,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

谭虹主编:《巴蜀移民史》,巴蜀书社出版社,2006年。

陈世松:《大迁徙“湖广填四川”历史解读》,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

陈世松等:《“湖广填四川”与西部生态环境及社会变迁研究》,2007年,国家社科基金西部学科项目,批准号04XZS004,待出版。

陈世松主编:《四川客家研究通讯》,第一期至第十九期(1999—2008)。

④把明洪武元年至洪武四年(1368—1371)迁川的家族列入明夏时期,因为在此期间朱元璋并未占领两湖地区,况且明夏政权依然统治四川,因此此时出现的奉旨、奉诏入川都应受到明夏政权的招抚。虽然家谱上写明洪武四年或之前奉旨入川的家族都应算做明夏时期。

⑤《宣汉县志·人口志》,1994年新版。

⑥民国《简阳县续志》卷10《氏族志》。

⑦《洪氏族谱》。

⑧光绪二十五年(仁寿)《李氏宗谱·世系谱》。

⑨民国《续修涪州志》。

⑩民国(蒲江)《杨氏续修族谱》。

⑪民国《汉源县志》。

⑫光绪《井研县志》。

⑬光绪《庆符县志》。

⑭《李氏家谱》。

⑮《中国移民史》第六卷,第649页。

⑯这里以1298年和1776年作为“湖广填四川”大移民起始点和终结点,是考虑到本文在搜集的移民族谱中涉及到迁川时间有明确规定的是元大德年间(1298—1307)故采用1298年,再者在元代中期以后已经形成了移民的潮流。1776年即乾隆四十一年是采取的曹树基先生的观点。

⑰康熙九年《麻城县志》卷一,麻城市地方志办公室翻印本。

⑱傅崇矩:《成都通览》(上册)巴蜀书社出版社,1987年版,第109—110页。

⑲同治《营山县志》。

⑳宣统二年(资中)《王氏宗谱》,存资阳市档案馆。

㉑同治十年(内江)《张氏家乘·序》。

㉒㉓《宣汉县志·人口志》,1994年新版。

㉔尹级和:《峨边县宗教调查》。

㉕民国《续修简阳樊氏宗谱》卷1,四川省图书馆藏。

②⑥《吴氏族谱》。

②⑦②⑧民国《合川县志》。

②⑨民国《新繁县志》卷5,《氏族》。

③⑩光绪《绵竹乡土志》。

③⑪咸丰《天全州志》。

③⑫民国《灌县志》。

③⑬光绪二十五年(仁寿)《李氏宗谱·世系谱》。

③⑭《黄氏族谱·序》。

③⑮民国(蒲江)《杨氏续修族谱》。

③⑯民国《简阳罗架沟汪氏族谱》,四川省图书馆藏。

③⑰《马识途祖籍和少年时代》。

③⑱《宣汉县志·人口志》,1994年新版。

③⑲民国《续修涪州志》。

④⑩鲁璠:《世居重庆、四川及所辖市县人士祖籍为孝感渊流考》,载孝感市孝南区文史资料(2001)。

④⑪民国《安县志》。

④⑫民国《简阳县志》。

④⑬傅昌志:《渠县明清时期迁川姓氏探源》。

④⑭《宣汉县志·人口志》,1994年新版。

④⑮民国《汉源县志》。

④⑯民国《刘氏族谱·内篇》。

④⑰嘉庆《三台县志》。

④⑱民国《双流县志》。

④⑲李文田、周申立:《四川城市地名探源》载《聊城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⑤⑩族谱中载明的小地名共49例(有隶属关系的地名归为一例)其中有13例同时来自孝感乡高阶堰,计算在49例之中,而表格中只取一例,其他12例不计算在内。

⑤⑪搜集到的家谱共有13例注明祖籍孝感乡高杆堰:雍云鹤,明洪武十年迁川;潘荣富,明弘治三年迁川;罗殿舞,清初;寇氏兄弟,清顺治年间;范文兰,清朝;赵时万,明末清初;肖元,清康熙后期;周天球,清朝;文宗猷,清康熙年间;龚凉,清初;熊千九、谯氏,

明末清初;杨氏,清初。

⑤⑫周启志:《湖广填四川与湖北麻城孝感乡》,载《四川客家研究通讯》2005年特刊,总第13—14期。

⑤⑬《汤氏族谱》,原四川人大主任汤兴伟提供。

⑤⑭鲁璠:《世居重庆、四川及所辖市县人士祖籍为孝感渊流考》,载孝感市孝南区文史资料(2001)。

⑤⑮鲁璠:《世居重庆、四川及所辖市县人士祖籍为孝感渊流考》,载孝感市孝南区文史资料(2001)。

⑤⑯《万县何氏家族史料汇编》,载凌礼潮主编《歧亭古镇杏花村》,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年。

⑤⑰长寿县《向氏族谱》,载凌礼潮主编《歧亭古镇杏花村》,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年。

⑤⑱杨志才:《川北烟云》。

⑤⑲李世取:《麻城孝感乡移民四川之我见》,载凌礼潮著《麻城孝感乡之谜》,麻城地方志办公室。

⑥⑩《杨氏族谱》,载陈世松《大迁徙“湖广填四川”历史解读》,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

⑥⑪民国(蒲江)《杨氏续修族谱》。

⑥⑫民国《简阳罗架沟汪氏族谱》,四川省图书馆藏。

⑥⑬简阳《刘氏族谱》,载凌礼潮主编《歧亭古镇杏花村》,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年。



明清时期四川麻城籍

移民后裔数量估算

罗卫华



一直以来,学术界对麻城特别是孝感乡移民后裔在四川总人口中所占的高比例充满着争议,认为一个小县不可能迁出那么多的人口到四川。其实,考虑到明清两朝长达543年的历史,以及人口自然增长率,结合麻城移民史实,麻城并不需要每年迁出很大规模的人口就可以达到现在的人口比例。本文试从数学模型的角度加以推算,就可以得出上述结论。

一、元末及明朝时期麻城移民四川人口数量

根据对麻城中驿镇(地属古孝感乡)100个姓氏谱牒的统计,其中有为官改籍、外贸未归、从军寄籍他乡、徙居外省内容的有60个姓氏。以这60个姓氏的谱牒为依据,以姓氏宗支为单位,分省统计,迁往外省的统计结果为60个姓氏共迁出2381人(按每人带两名家属统计,就是7143人)。其中,迁往的省份有四川、陕西、河南、云南、贵州等省以及湖北周边县市。迁往四川的最多,达到1356人,占迁往外地总人口数的56.95%。其次是陕西省,有374人,占迁往外地总人数的15.71%。第三是河南省,有293人,占迁往外地总人数的12.31%。四川成为麻城移民的主要集中地。四川沃野千里,气候适宜,被称为“天府之国”。高山环绕,行路艰难,成为天然屏障。经济自给自足,自成体系。四川独特的地理环境非常适宜于人口的滋生繁衍,成为战乱时避乱的首选地。从地理位置看,湖北离四川最近,又有

长江通往四川盆地,在古代条件下,是进入四川的最佳路线,所以麻城在历次移民中移往四川的最多。黄尚军先生曾对四川100部家谱作过统计:明确记为祖籍湖广的有59族。其中,麻城24族,占湖广移民的40.7%。麻城移民中,来自孝感乡的15族,占麻城移民的62.5%。^①无疑就是对此很好的证明。

1、元末夏政权时期四川麻城籍移民及后裔繁衍数量估算。

历史上麻城大规模移民到四川,始于元末明初。元至正十七年(1357年),徐寿辉部将明玉珍率兵20万西征入川,建立夏政权,大量麻城人随迁入蜀,首开麻城大规模移民到四川之先河。《明史》载:

徐寿辉起,明玉珍与里中父老团结千余人,屯青山。及寿辉称帝,使人招玉珍曰:‘来则共富贵,不来举兵屠之。’玉珍引众降,以元帅守沔阳。^②

青山就在麻城孝感乡。四川仁寿《李氏族谱》说:“元末吾祖世居麻城孝感青山,陈逆之乱,乡人明玉珍据成都,招抚乡里,吾祖兄弟七人迁蜀,因与祖一公籍寿焉。”^③由此可见,麻城是当时明玉珍起兵的根据地,也是征集兵源、粮草的基地。当时跟随明玉珍入川的麻城移民人数众多。明玉珍两次下令广招湖广百姓入川垦殖,派专差到麻城、应山等地招民。于是,正处于战火中的湖北难民,包括不少麻城人奉旨入蜀。

谭红先生对方志家谱所载各时期湖广籍入川移民家族作过统计:

方志家谱所载各时期湖广籍入川移民家族分步统计表^④

数量 时间	原籍	湖广地区入川移民家族数量				同期迁入四川的移民家族总数
		麻城	孝感乡	其余州县	合计	
元末		28	12	28	68	96
夏时期		30	51	24	105	121
洪武时期		73	45	35	153	193
永乐至后期		109	48	90	247	438
四川卫所		13	4	11	28	117
合计		253	160	188	601	968
百分比		26.1%	16.5%		62.1%	

我们按照该书实际统计情况,对各个时期的两项数据进行调整,一是对同期迁入四川移民家庭总数进行调整,剔除原籍不详的

家族;二是剔除可能为孝感县的家族。调整后的数据列表如下:

数量 时间	原籍	湖广地区入川移民家族数量				同期迁入四川的移民家族总数
		麻城	孝感乡	其余州县	合计	
元末		28	9	31	68	94(39.4%)
夏时期		30	48	27	105	119(65.5%)
洪武时期		73	44	36	153	193(60.6%)
永乐至后期		109	43	95	247	411(37%)
四川卫所		13	2	13	28	108(13.9%)
合计		253	146	202	601	925
百分比		26.1%	16.5%		62.1%	
调整后百分比		27.4%	15.8%		65%	

通过上述数据,求得麻城移民家族占同期迁入四川的移民家族总数的比例的加权平均数为(94 × 39.4%+119 × 65.5%+193 × 60.6%+411 × 37%+108 × 13.9%)/(94+119+193+411+108)≈43.1%。

洪武四年(1371年),汤和、傅友德等灭大夏政权。洪武五年统计四川约40万人,其中不包括明氏军人及家属。明氏入川后军队约20万,以一个军人带一个家属计算,明氏的移民人口应在40万人以上。^⑤元末明初四川总人口为70—80万人。假设麻城移民家族所占四川全部移民家族比例与麻城移民人口占四川全部移民人口比例相当,那么洪武五年(1372年),四川麻城籍移民就有40 × 65.6%=26.24万人,占四川总人口的26.24/80 × 100%=32.8%。明代四川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7‰^⑥,到明崇祯三年(1630年),这258年的自然繁衍,麻城籍移民后裔数量为26.24 × (1+7‰)²⁵⁷≈157.59万人。

2、明朝麻城移民四川人口及繁衍数量估算

明代初年,鉴于巴蜀地区人少地多,急待垦殖,所以朱元璋有意安排邻近巴蜀的湖

广移民入蜀,这是整个元末明初“湖广填四川”中的主要部分,所以在现存的很多族谱中,都记载着先世在明初洪武年间是如何“奉旨入蜀”的经历。湖广地区的移民继续大量入川,到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年),四川人口就上升到146万。外地移民,特别是湖广移民占了这一时期所增加人口的主要部分。民国《荣县志》载:“明太祖二年,楚人入蜀者,动称是年由麻城孝感乡入川,人人言然。”宣统《广安州新志》引《大竹志》载:“洪武四年,廖永忠平蜀,大肆杀戮。复徙楚之黄麻人来实兹土。”咸丰《云阳县志》卷2称:“邑分南北两岸,南岸民皆明洪武时由湖广麻城孝感奉敕徙来者,北岸民则皆康熙、雍正间外来寄籍者,亦惟湖南、北人较多。”

从洪武五年(1372年)到明崇祯三年,四川无大的战事和自然灾害,社会基本稳定,对人民的休养生息总体有利,因此,做相当保守的估算:假定从洪武五年(1372年)开始,麻城每年移民500人到四川并繁衍生息,人口自然增长率以7‰计算,到明崇祯三年(1630年)这258年间,四川麻城籍移民后裔数量为:

根据等比数列公式 $S_n = [A_1(1-q^n)] / (1-q)$

$A_1=500$ $q=1+7‰=1.007$

$n=1630-1372=258$

$S_n=500 \times [1-1.007^{258}] / (1-1.007)$

≈36.06万人。

即从1372年到1630年麻城移往四川的人口繁衍生息达到36.06万人。加上明玉珍时期麻城迁往四川繁衍人口数量,到1630年,四川麻城籍移民后裔总数为157.59+36.06=193.65万人。明崇祯三年,四川人口总数为735万人,麻城籍移民后裔就占四川总人口的195.06/735×100%=26.35%。

二、明末及清朝时期四川麻城籍移民后裔数量

1、明末及清朝时期四川麻城籍移民及

后裔繁衍数量

计六奇《明季北略》记载:

(癸未四月)献忠遂入麻城。城中降者五万七千人,献忠别立一军,号为‘新营’,选勇士将之,势复大振。已而献忠去,众悉从之。^⑦

这支新营随张献忠入川作战,后大部军籍改民籍。兵败后,其将士也隐姓埋名,定居四川,繁衍后代。民国《中江县志》载一新营老兵事:“杨可举,字香吾。顺治三年脱献贼之祸。六年投效总督李国英标下……时邑境人稀地广,朝夕与居者惟投诚数百人。”

明末长期的战乱,再加上瘟疫、旱灾、虎患等盛行,四川人口大量减少。到康熙20年(1681年),四川残存的居民仅50万左右^⑧。麻城籍移民后裔大约有50×26.35%≈13.18万人。

曹树基先生曾对1653-1953年四川人口的变动有过以下统计:

1653—1953年四川人口的变动^⑨

时 间	户(万)	口(万)	年均增长率(%)	修正人口(万)	年均增长率(‰)
康熙20年(1681年)		50		50	
康熙61年(1722年)	57.9	231.6	38.1	231.6	38.1
乾隆1年(1736年)	65.3	261.2	8.6		
乾隆41年(1776年)		779	27.7	1000	27.9
嘉庆17年(1812年)	511.3	2071	27.5	2071	21
宣统二年(1910年)		4414	7.8	4800	8.7
1953年		6568.5	9.3	6568.5	7.3

按照上述四川人口数量及年均增长率,可以推算清朝时期四川麻城籍后裔人口数量:

(1)从康熙二十年(1681年)至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的41年中,四川人口数量从50万增加到232万,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38‰。四川麻城籍后裔数量为 $13.18 \times (1+38‰)^{40}=58.59$ 万人,占四川总人口的25.25%。

(2)从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至乾隆四十一年(1777年)的55年中,四川总人口增加到1000万人,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27.9‰。四川麻城籍后裔数量为 $58.59 \times (1+27.9‰)^{54}=258.92$ 万人,占四川总人口的25.89%。

(3)从乾隆四十一年(1777年)至嘉庆十七年(1812年)的35年中,四川总人口增加到2071万人,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达到21‰。四川麻城籍后裔数量为 $258.92 \times (1+21‰)^{34}=524.86$ 万人,占四川总人口的25.34%。

(4)从嘉庆十七年(1812年)到宣统二年(1910年)的98年中,四川总人口增加到4800万人,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8.7‰。麻城移民人口数量为 $524.86 \times (1+8.7‰)^{97}=1216.07$ 万人,占四川总人口的25.33%。

(5)从宣统二年(1910年)到一九五三年的43年中,四川总人口增加到6568.5万人,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7.3‰。麻城移民人口数量为 $1216.07 \times (1+7.3‰)^{42}=1654.24$ 万人,占四川总人口的25.18%。

2、清代麻城移民及后裔自然繁衍数量

清前期的大规模移民填川,据人口研究专门部门的科学推算,直接入川的移民有100多万人,这在四川历史上是一次最大规模的移民运动。这100多万人中,有一半来自湖北、湖南。其中湖北约有30万人。其中,麻城占据相当大的比例。民国《丰都乡土志》第三章《食货》记载:“清初流贼张献忠由陕入川……我邑城乡数百里,迄无居人,户口全空矣……先民田宅,悉外省人移补,而湖广麻城人尤多。”据光绪《广安州新志》

提供的数据,湖北黄、麻籍占入广安州人数的26.64%,湖北、湖南合计约占60%。

按照曹树基先生1653-1953年四川人口变动情况表数据,假设每年麻城移民800人到四川繁衍生息,自康熙八年(1668年)四川巡抚张德地上书要求湖广填川开始,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这127年间,人口自然增长率按7‰计算,

根据等比数列公式 $S_n=[A_1(1-q^n)]/(1-q)$

$A_1=800$ $q=1+7‰=1.007$

$n=1795-1668=127$

$S_n=[800 \times (1-1.007^{127})]/(1-1.007)$

≈ 16.29 万人

即从1668年到1795年,四川麻城籍移民后裔达到16.29万人。再加上明末清初时期麻城移民已在四川的繁衍数量1654.24万人,到一九五三年四川麻城籍移民后裔就为 $16.29+1654.24=1670.53$ 万人,占四川总人口数量的25.43%。

三、结论

结论一:麻城籍后裔占四川总人口的比例要达到25%以上,只需要明朝每年移民500人以上,清朝每年移民800人以上即可。《麻城县志》载麻城历代人口:“明代洪武二十四年15809户,105112人;永乐七年15810户,104180人;弘治五年13423户,137936人;正德七年13550户,145095人;嘉靖三十年19380户,140240人;万历四十七年10605户,116234人。崇祯时册定亦如前数。清顺治二年10704户,110287人;乾隆二十四年无户数记载,283888人,光绪二年无户数记载,人口为316812人。”^⑩由此可见,对于一个十多万人的县来说,每年移民500至800人到四川,是完全可行的。

结论二:依据谭红先生提供的统计数据,算出麻城移民家族占四川总移民家族的比例的加权平均数为43.1%,本文算出的比例为25.43%。比例之间存在差距,主要是误

籍与冒籍原因。一是孝感县误籍为孝感乡称为麻城人；二是外地移民冒籍为麻城人。^①

清人邹知新在其《都碑记》里面记载：

当洪武初，太祖定迁民之策，迁诏至公署，县堂徙治磨子场。十年，遂升其都为散州，统属七县。未几罢之。永乐中复旧治。弘治时都崩基圯，故今不知有其乡云。^②

洪武初年，麻城管辖七县。若这个时期政府组织百姓迁往四川，在政府所发“凭照”上他们的原籍自然是“麻城县孝感乡”。有六县在迁往四川时，都托名从麻城迁来。由于存在着误籍与冒籍的原因，从而形成了比例的较大误差。

【注释】

①参见黄尚军《四川方言与民俗》第303页“附录”，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

②《明史》卷123《列传第十一》。

③参见葛剑雄 吴松第 曹树基《中国移

民史》第五卷第150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④参见谭红主编《巴蜀移民史》第442页，巴蜀书社，2006年。

⑤参见葛剑雄 吴松第 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五卷第153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⑥参见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第四卷第235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⑦参见计六奇《明季北略》第378页，中华书局，1984。

⑧参见李世平《四川人口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

⑨参见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六卷第95页。

⑩《麻城县志》，红旗出版社，1993。

⑪参见《麻城文史》第1期凌礼潮《麻城孝感乡移民问题考辩》。

⑫参见《麻城文史》第2期《都碑记》。





清代名人张鹏翮张问陶

家族之根在麻城

胡传淮

元明之际,由于战乱的原因,四川人口锐减,田地荒芜,经济萧条,文化板荡。据有关史料记载:明洪武初年,四川省境内登记到的户籍仅八万多户,实际人口也不满百万。鉴于四川地区地广人稀,急待垦殖,明政府多次组织邻近四川的湖广(今湖北、湖南等地)移民入蜀,掀起了“湖广填四川”的第一个高潮(第二个高潮发生在清初)。到洪武十四年(1381),四川人口猛增至140多万,这对四川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湖广填四川”起于元末明初,并一直持续至清朝中期,可以说是一场历时400多年的大移民运动,这在中国移民史上也是不多见的。说起自家的根,今天四川人总言必称“根在湖广麻城孝感乡”。

据《遂宁张氏族谱》(民国十三年刻本)记载:清代宰相张鹏翮及其玄孙清代大诗人张问陶的祖先,原籍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他们的根在麻城,明代洪武二年(1369),迁入四川遂宁县黑柏沟。入川始祖为张万,至张问陶,已历十三世。其世系为:

第一世

张万,原籍湖广省麻城县孝感乡白獭河之绿柳村,明洪武二年(1369)迁蜀,卜居遂宁县黑柏沟,卒葬黑柏沟大樟树湾。

黑柏沟位于遂宁东部,距遂宁城10余公里,明代、清代和民国时期均为遂宁县所辖。1954年,黑柏沟始划归蓬溪县管辖。黑柏沟全长10余公里,分上下两沟。上沟大樟树湾和下沟两河口,均为张氏祖居地。两河口有张氏祖茔;大樟树湾有始祖祠。大樟树湾与两河口相距7公里,前者今属蓬溪县任隆镇黑柏沟村五社大樟树湾;后者今属蓬溪县金桥乡翰林村两河口。两河口张氏祠堂现为金桥乡翰林村村委会驻地。清初名臣张鹏翮《大樟祖居》诗云:“柏沟樟树荫茅庐,始祖由来卜此居。三派辛勤躬稼穡,百年清白事诗书。宅心忠厚貽谋在,传世醇良积庆余。佑启后人培福德,莫忘高大耀门闾。”自注:“始祖万公明初自楚迁蜀,兄弟三:一居铜梁,至大司马肖甫公(张佳胤)显;一居安岳,至侍御留孺公(张任学)显;一居遂邑,

自景泰时姚安太守(张赞)至崇祯壬午,孝廉科第联绵。”(《张文端公全集》卷五)。张问陶《船山诗草》卷七载有其乾隆五十七年(1792)春回故乡所作的《樟树湾祠堂月夜同寿门(张问莱)弟作》一诗,诗中有句云:“疏篱明夜火,老树立村名。”大樟树湾就是因湾内有一株高大古老的樟树而得名,其树古干虬枝,亭亭如盖,至今犹存。

关于遂宁张氏源流,除张鹏翻三派说外,另有一说,最早载于清代《池上草堂笔记》。清钱泳《履园丛话·报应》卷十六和近人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亦有载。张百龄有一日对客人说:“我本汉军张姓,先世系江西人。自元以来,积德累世,人无知者。某公精堪輿,尝卜一地,葬其先人。葬毕叹曰:‘吾子孙如不坠先业,后必出三公。’……葬后生子五人,分居五处:其一处湖广,后生江陵相国居正,谥文忠;其一处四川,入本朝,生遂宁相国鹏翻,谥文端;其一居江南,生京江相国玉书,谥文贞;其一居安徽,生桐城两相国,英谥文端;子廷玉谥文和;其一居长白山,入汉军,即吾先代也。”张百龄于嘉庆十八年,以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谥文勉。合计一支,五房而出六宰相(张居正、张鹏翻、张玉书、张英、张廷玉、张百龄),今尚科甲蝉联,卿贰接踵。[转引自光绪丁未(1907)年所纂《张氏宗谱》中卷第38至41页。]张氏一支五房出六宰相,风光占尽,有清一代,鲜与伦比。

张万卒后,葬大樟树湾观音寨山中麓,其墓今存,人称“始祖墓”。墓碑素面小碑,纵2米、横0.8米,厚0.3米,碑面文字大多剥蚀,今仅存“始祖张公讳万之墓”等字。清康熙末年,张鹏翻在京师曾多次向家人写信云:“闻黑柏沟世产,被楚人侵占。十里周围之田地,虽难以尽复,然祖茔之山前后及大湾,祖基两河口交汇处,二地田土关系风水,断不可轻失。”“黑柏沟有始祖墓,尚未有祠,须令懋德(张鹏翻侄子)兼看,以防楚人侵

占。”清初大批移民入川,形成“湖广填四川”的第二次高潮,张鹏翻时任户部尚书,老家田产祖茔还被湖广来的移民侵占,无计可施。可见其廉洁正直,不恃势压人。后来清还,张鹏翻作有《黑柏沟祖茔被楚民侵占,蒙制军清还,读罢檄语,感而泣下》一诗,诗中有句云:“日暮秋风生万壑,几回衫袖掩啼痕。”

第二世

张永成,张万长子,赠封承德郎、礼部仪制清吏司主事,娶余氏。卒葬遂宁土桥铺(今遂宁市安居区聚贤乡)。

第三世

张赞,永成子,字邦翊,号靖翁,生于明永乐十三年(1415)十一月十四日。景泰四年(1453)举人,五年(1454)三甲第167名进士。历官礼部主事、员外郎、郎中。天顺八年(1464)出任云南姚安府知府,惠政卓著,吏民称歌。《云南通志》、《姚安县志》、《明清进士题名碑录》有载。娶王氏,子二人、女一人。卒于弘治二年(1489)三月,葬土桥铺,崇祀名宦祠、乡贤祠。《遂宁县志》有传。

第四世

张福暎,张赞次子,隐居不仕。

第五世

张尚威,福暎子,处士,为张鹏翻之高祖。卒葬黑柏沟,其墓今存。墓碑纵2.9米,横4.6米,厚0.6米。墓碑主文为“明处士高祖考张尚威之墓”。清代张邦伸撰《锦里新编》卷二载:“文端公(张鹏翻)高祖葬遂宁黑柏沟,山势雄峻,落穴端平,惟元神水直出,不能百步转澜,形家以为贵而不富。张氏自文端公后,科甲连绵四五世;至船山(张问陶),官阶俱至府道以上……累世皆以清节著,家无余赀,彼形家风水之说,诚非无因也。”(载《锦里新编》上册第11页,1984年巴蜀书社版)。

第六世

张惠,尚威长子,字教庵,隐居不仕,积善好施。生于明嘉靖十五年(1536)二月初二日,配孟氏,子五人。卒于崇祯五年(1632)十二月十八日,享年97岁,学者私谥“三多先生”,葬祖茔两河口。清康熙时状元韩荻撰有《教庵公传》,载于民国本《遂宁县志》卷五和《遂宁张氏族谱》卷二。其墓今存,位于蓬溪县金桥乡翰林村两河口南边纱帽山中麓,墓碑纵2.8米,横0.95米,厚0.4米,碑文完好。

第七世

张应礼,张惠次子,字和斋。生于明万历六年(1578)三月十六日,娶周氏,子九人。官怀远将军都司佾书。卒于崇祯十一年(1638)十一月十二日,与张惠合葬于两河口,其墓今存。

第八世

张烺,张应礼第四子,字冲寰,号松龄。生于明天启七年(1627)五月二十三日,卒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八月初二日,享年89岁。配景氏,侧室季氏。子六人:鹏翮、鹏翼、鹏举、鹏飞、鹏翥、鹏搏,女二人。景太夫人为张鹏翮生母,生于明天启四年(1624),卒于清康熙十九年(1680),初葬遂宁玉堂山,后迁葬祖茔两河口。清武英殿大学士、礼部尚书熊赐履撰《景太恭人墓志铭》,其墓今存。

康熙帝曾书“鲐背神清”、“养志松龄”二匾额赐张烺。康熙五十二年(1713)三月,逢康熙六旬万寿,张烺穿巫峡,渡黄河,经数千里到京城为康熙祝寿,天颜大喜,颁赐珍膳及召见,复赐老人宴。张烺与宋荦、徐潮、王鸿绪、许汝霖、徐元正等名臣坐前列,传为美谈。四月,诏问张献忠入川始末。法式善《陶庐杂录》卷一载:康熙五十二年四月,上问尚书张鹏翮曰:“明末张献忠兵到四川,杀戮甚惨,四川人曾有记其事之书籍否?”张鹏翮奏:“无有记其事者。”上曰:“……尔父今年八十有七,以张献忠入川时计,约已十七八岁,必

有确然见闻之处,尔问明缮折进呈。”后来由张烺口述,张鹏翮缮疏上闻。

张烺著有《烬余录》、《松龄老人笔记》等书。《烬余录》自录其生平,起于天启七年,止于康熙五十四年,记载了明末清初八十余年见闻,对张献忠据蜀记载尤详,对研究明末清初四川历史和张献忠起义均有很大价值。明末清初,四川进入了一个比宋元之际时间更长、情况更烈的战乱与残破时期,四川人民再次遭到了今天难以想象的灾难。从宏观上看,可以说是四川历史上最残酷的一场浩劫。《烬余录》中载:“吾族自麻城迁蜀家于遂宁之黑柏沟,有明三百年,族姓蕃盛,乃散居于邑西猴溪、土桥、治口、凤台等处,计十三房,凡万有余人。”“劫运后,逃散死亡,靡有孑遗,独余从万死一生中,得延余生。”“遂宁为水陆要冲,贼众往来,非宁区。”明末张氏一家,“三世一宅,僮仆百余人。”顺治二年(1645)十月,遂宁城中居民在战乱中被大量屠杀,“城中居人,无一存者。贼又掳其丁壮千余人,带至西洲坝,尽杀之。余诸兄及族姓之在城者,悉遭其厄。”“余乃悉窖藏其米谷等物,奉母入深山中。”“蜀民至是殆尽矣。”在清代官方史书中,大多认为这场洗劫是因为“张献忠剿四川”造成的。张烺实事求是地认为是由战乱、瘟疫和天灾交织而造成的。《烬余录》载:“又有瘟疫之侵,猛虎之灾。”“今统十分而计之:其死于献贼之屠戮者三;死于姚黄之掳掠者二;因乱而自相残杀者又二;饥而死者又二;其一则死于病也。”顺治十八年(1661),四川全省总人口才九万左右,于是清政府大规模地组织移民入川,这是继明代初年的移民入川以后,更大规模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烬余录》有一万余字,载于《遂宁张氏族谱》卷四,有民国十三年刻本。

张烺卒后,葬于遂宁县三汇场庆元山(今属重庆市潼南县小渡乡月山村所辖),其墓今

存。清保和殿大学士、礼部尚书陈诰和康熙时状元王敬铭分别撰有《光禄公传》，载于民国本《遂宁县志》和《遂宁张氏族谱》。

第九世

张鹏翮，字运青，号宽宇，张烺长子，船山高祖。生于顺治六年（1649）十一月十七日，卒于雍正三年（1725）二月十九日，配唐氏，子二人：懋诚、懋龄，女三人。

顺治五年（1648年）五月二十日，张烺一家迁居顺庆（今南充市顺庆区），第二年十一月张鹏翮出生。顺治八年（1651）迁居于西充县槐树场大堰沟；十二年，迁居于杜家；十三年，迁居于盐亭县廖家沟；十五年，迁居于西充石板场老鹤村。直到顺治十八年（1661），始归遂宁，居县东河沙乡之赤崖沟。张鹏翮撰有《第一山精舍读书记》，记其少时在赤崖山读书情况；并作有《赤崖旧宅》诗。康熙七年（1668）迁遂宁广济坝，居张烺岳父景运亨宅。

康熙八年（1669），张鹏翮考中举人。九年（1670）考中三甲第122名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历官苏州知府、兖州知府；康熙二十八年（1689）三月至三十五年（1696）正月任浙江巡抚；后任江南学政、刑部尚书；康熙三十七年（1698）任两江总督；康熙三十九年（1700）三月至四十七年（1708）十月任河道总督；康熙四十八年（1709）二月至五十二年（1713）十月任户部尚书；康熙五十二年（1713）十月至六十年（1721）任吏部尚书；雍正元年（1723）二月至三年（1725）二月任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太子太保、太子太傅，卒谥文端，廷推天下第一清官。康熙二十七年（1688）出使俄罗斯，为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作出了重大贡献。张鹏翮为雍正初期领导集团的核心人物，扬名中外，集文学家、诗人、水利专家、外交家于一身，为清代268年中蜀人作官地位最显赫、名声最响亮的人物。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九册）对张鹏翮治理

黄河的功绩作了高度评价。

张鹏翮从政50余年，名满天下。康熙三十九年康熙帝谕大学士曰：“鹏翮往陕西，朕留心访察，一介不取，天下廉吏，无出其右。”仅在此一年内，康熙帝称赞张鹏翮为好官、清官即不下十次之多；御赐张鹏翮之诗、联、匾、书画等，多达十余件。卒后，雍正帝亲自为他撰写祭文、墓碑，称他：“矢志端方，持身廉洁”；“志行修洁，风度端凝”；“流芳竹帛，卓然一代之完人；树范岩廊，允矣千秋之茂典。”评价之高，无出其右。清代著名文学家彭端淑《张文端公传》云：“公自弱冠入仕，及为相凡五十余年，名满天下，主上不疑，同官不忌，考诸史册，往往难之。”著有《冰雪堂稿》《如意堂稿》《治河全书》《奉使俄罗斯行程纪略》《兖州府志》《遂宁县志》等10余部著作。光绪八年刊刻《张文端公全集》，凡七卷，内有诗二卷，诗风纯实简正，自是正声。生平事迹见《清史稿》卷279本传、《清史列传》卷11本传、彭端淑《张文端公传》、陆耀《治河名臣小传》、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国朝名臣传》《中国文学家大辞典》等等；清遂宁张知铨（张鹏翼六世孙）编《张文端公年谱》。《清诗别裁集》《国朝全蜀诗钞》《蜀雅》《清诗汇》及胡传淮《张鹏翮诗选》录有其诗。

张鹏翮卒后，归葬遂宁中安仁里庆元山。唐太夫人卒葬山东曲阜县之南官府马鞍山。民国元年（1912），由蓬溪县划出东乡十一个场镇，遂宁县划出上安、中安、下安三里，建立东安县（因位于潼川府之南，后更名为潼南县）。张烺、张鹏翮父子墓所在地庆元山划归了潼南县所辖。庆元山今属重庆市潼南县小渡乡月山村，张氏父子墓仍存。张鹏翮墓在庆元山金簪子坡下的第三台土上，坐北朝南。坟墓比普通坟墓略大，墓前立有一通墓碑，碑高144.5厘米，宽67厘米，厚14.5厘米。墓碑有三行文字：左行“雍正四年二月吉旦”，中行又分两小行：

皇清 文华殿大学□□ (以下文字漫漶)
书少保文端□□

右行“孝男礼科□□□”(以下文字漫漶)。碑文是张鹏翮生前、逝后的授职和谥封,与《遂宁县志》《遂宁张氏族谱》相符合(《清史稿·张鹏翮传》及《辞海》载张鹏翮为“武英殿大学士”,均误,应作“文华殿大学士”)。

张烺墓在庆元山金簪子坡下第四台土上。张鹏翮《庆元山》诗中所云:“他日归来第四台,独寻春色几徘徊”即指此。其墓坐北朝南,坟冢略小,墓前有一与张鹏翮墓碑相仿的碑石,但碑面已严重剥落,只有中央有“户部”二字尚依稀可辨认。张烺生前曾“诰封光禄大夫、户部尚书加三级。”

在庆元山下祠堂湾,原建有张公祠,坐北朝南,是一进两层的两个四合大院,建筑精美,有客厅和守墓人的住所,现大部分房屋已拆除。庆元山为一走势壮观的峰群,透露出一派雄秀之气。三百多年过去了,当时祭祀、纪念性建筑今已大多残破,尚存者唯张烺、张鹏翮两墓冢。

康熙十四年(1675),张鹏翮召对懋勤殿,命坐赐茶,问父母无恙否,荣遇殊甚。遂宁张氏家族遂仿周公得禾、孔子受鲤之意,以十六字为字派名子孙。十六字派为:“懋勤顾问,知遇崇隆;清正仁厚,进德立功。”从第十世起,遂宁张氏就以这16字为字辈给子孙命名。

第十世

张懋诚,字孟一,号存庵,张鹏翮长子,船山曾祖。生于康熙六年(1667)十月二十日,卒于乾隆二年(1737)十一月十八日,娶罗氏(四川阆中人、青州知府罗大美之女)、朱氏。子五人:勤望、勤宠、勤保、勤河、勤复,女九人。康熙二十六年(1687)举人。历官安徽怀宁知县、奉天辽阳知州、通政使司通政使,署工部右侍郎,诰授通奉大夫,著有《通政诗集》一卷。性忠直,有气节,卒葬遂宁楼

山(今遂宁市船山区永兴镇)。《遂宁县志》载有《通奉公(张懋诚)传》,其子张勤望撰有《通奉公行述》《罗太夫人行述》(载民国版《遂宁张氏族谱》卷四)。

第十一世

张勤望,字孚嘉,号莲洲,船山祖父。生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五月二十九日,卒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四月十四日,配岳氏(四川南江县人、进士岳度女)、杨氏。子八人:顾鉴、顾霖、顾京、顾墀、顾銮、顾瀛、顾普、顾振,女二人。荫生,历官宁国府知府、山东登州府知府,署登莱青海防兵备道,诰授中宪大夫。时人称誉曰:“不愧天下清官张相国之孙,二十年尘案,片言决矣。”所至卓有循声,无愧贤良。善诗,民国本《遂宁县志》载其诗6首。《遂宁县志》有传。卒葬两河口,其墓今存,为张勤望与妻岳氏、杨氏三人合冢墓,位于金桥乡翰林村东300米的人头山上。墓碑纵3.1米,横1.5米,厚0.5米。素碑无饰雕。

第十二世

张顾鉴,字镜千,号冰亭,船山之父。生于康熙六十年(1721)四月十四日,时张鹏翮任吏部尚书,喜初得曾孙,取“张曲江千秋金鉴”之义,以命是名。卒于嘉庆元年(1796)十二月十二日,娶李氏、周氏(山东即墨人)。子三人:问安、问陶、问莱;女二人,长女适浙江归安监生潘本侃;次女张筠适镶黄旗汉军袭骑都尉高扬曾。三子二女之生母均为周氏。过去,学术界不少人认为张筠之夫为汉军高鹗,实误,此可参见拙文《洗百年奇冤,还高鹗清白——高鹗非“汉军高氏”铁证之发现》,载2001年《红楼梦学刊》第3辑。乾隆六年(1741)张顾鉴中顺天乡试副榜,历官河南安阳知县、山东馆陶知县、湖北均州知州、荆门州知州、汉阳府同知、云南开化府知府,诰授朝议大夫。卒后与李氏、周氏均葬两河口祖茔。张顾鉴善诗,与著名诗人袁枚为少年诗友,著有《近花窗诗稿》、《耐舫近稿》、《擷

芳集》等诗集。《四川历代文化名人辞典》《遂宁县志》有传。

第十三世

张问安，字悦祖、季门，号亥白，张顾鉴长子，船山之兄。生于乾隆二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公元1757年2月2日)，卒于嘉庆二十年正月初五(公元1815年2月13日)。娶陈慧殊(1755—1783，浙江海宁人，江西南安府同知陈亿女，著有《香远斋稿》)、王氏、文氏、吴氏，著有《亥白诗草》八卷，存诗840余首，夫妻均葬两河口。亥白为清代诗人、书法家，诗才超逸，与船山号称二雄。其生事可参见拙编《张问安诗选》和拙文《清代诗人张问安行年简谱》(发表于《川北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

张问陶，字乐祖、柳门，号船山，张顾鉴次子。生于乾隆二十九年五月二十七日(公元1764年6月26日)，卒于嘉庆十九年三月初四(公元1814年4月23日)。娶周氏(涪陵人，左都御史周兴岱女)、林颀(江苏人，四川布政使林儒女，著有《林恭人集》)。张问陶著有《船山诗草》二十卷、《补遗》六卷。其诗书画，遍传宇内，是清代第一流的大诗人、大书画家。卒后寄殡苏州光福镇玄墓山，后归葬故乡两河口祖茔，其墓位于今蓬溪县金桥乡翰林村东500米唐家湾无名山中麓，碑文曰：“张问陶船山之墓”。周氏、林颀亦葬两河口。其生事可参见拙著《张问陶年谱》(巴蜀书社2000年1月初版、2005年1月修订再版)。

张问莱，字承祖、寿门，号旗山，张顾鉴季子，船山之弟。生于乾隆四十年(1775)正月十八日，卒于道光十八年(1838)七月初八日。娶杨继端(1773—1817)，子一人：知训。卒后，与杨继端均葬两河口。张问莱为蜀中才子，与著名书法家梁同书为忘年交。其妻杨继端，四川旺苍县人，松江府知府杨玺女，

字明霞，号古雪，清代女诗人、画家，著有《古雪集》，今存诗448首，词32阙。《巴蜀文化大典》赞扬张氏“丈夫兄弟三人皆才子，妻子妯娌三人均诗人，当时文坛传为佳话。”

从明初入川始祖张万，至清乾嘉时张问陶，共计十三世，即：张万→张永成→张赞→张福暎→张尚威→张惠→张应礼→张烺→张鹏翮→张懋诚→张勤望→张顾鉴→张问陶(兄问安、弟问莱)。

张问安、张问陶无子，族人认为：“船山为一代名人，固不可无后；而亥白系六房大宗，尤不可阙如，因饬族议，以读书明理者嗣之。”遂众议以张知训(张问莱子)承嗣问安，继大宗兼祧本支；以张知防(张问伸子、张勤望曾孙)承嗣船山，故船山嗣子为张知防。

目前张氏后裔还散居于遂宁市城区小东街御书楼、仁里镇乘龙院、船山区北固乡玉堂寺、新桥镇象山和蓬溪县任隆镇黑柏沟村、金桥乡翰林村两河口等地，已发展到第二十一世“厚”字辈了，今张氏后裔总人口有二千余人。

遂宁张氏家族是一支兴盛时间长达两百年左右，在政治上和文学上都有重要影响的大家望族。从清初张鹏翮入仕，到清中叶张船山中进士，这期间张氏中进士者三人，中举人者九人，成贡生者十八人，为官者达数十人，既有文官，亦有武将。一人入《中国通史》，二人入《辞海》，三人入《清史稿》列传，四人入《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清代遂宁人入乡贤祠者8人，而张氏一家就占了7人之多。张鹏翮是清代蜀人中官位最显赫、名声最响亮的人物。张船山为清代蜀中诗冠，也是当时第一流的大诗人和书画家。其诗，天才踔厉，价重鸡林。“才隽之士，多则效之，……朝鲜使人求其诗，至比之鸡林纸价。”当代清诗研究专家钱仲联先生“力主将乾隆三大家中之蒋士铨换为张问陶”(见《钱仲联学述》第160页，1999年3月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其书画,蜀中从清代后期起民间就有“家无船山画,不算书香门”、“家无船山字,枉为读书人”之说;清末民初著名学者杨守敬(1839—1915)在《学书述言》中云:“乾嘉间之书家,莫不胎息于金石,博考名迹,惟张船山、宋芷湾不依傍古人,自然大雅,由于天份独高,故师古而不泥于古。”由此可知,船山诗书画三绝,博大精深,风行宇内,“四海骚人,靡不倾仰”(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卷八)。因此,无论从政治上或从艺术上,都有必要对清代遂宁张氏家族进行全面深入的清理和研究。

【参考文献】

[1]《遂宁县志》(6卷,首1卷),(清)孙海、李星根等纂修,清光绪五年(1879)刻本。

[2]《遂宁张氏族谱》(4卷),(民国)张崇阶等纂修,民国十三年(1924)刻本。

[3]《张问陶年谱》,胡传淮著,巴蜀书社2000年1月初版,2005年1月修订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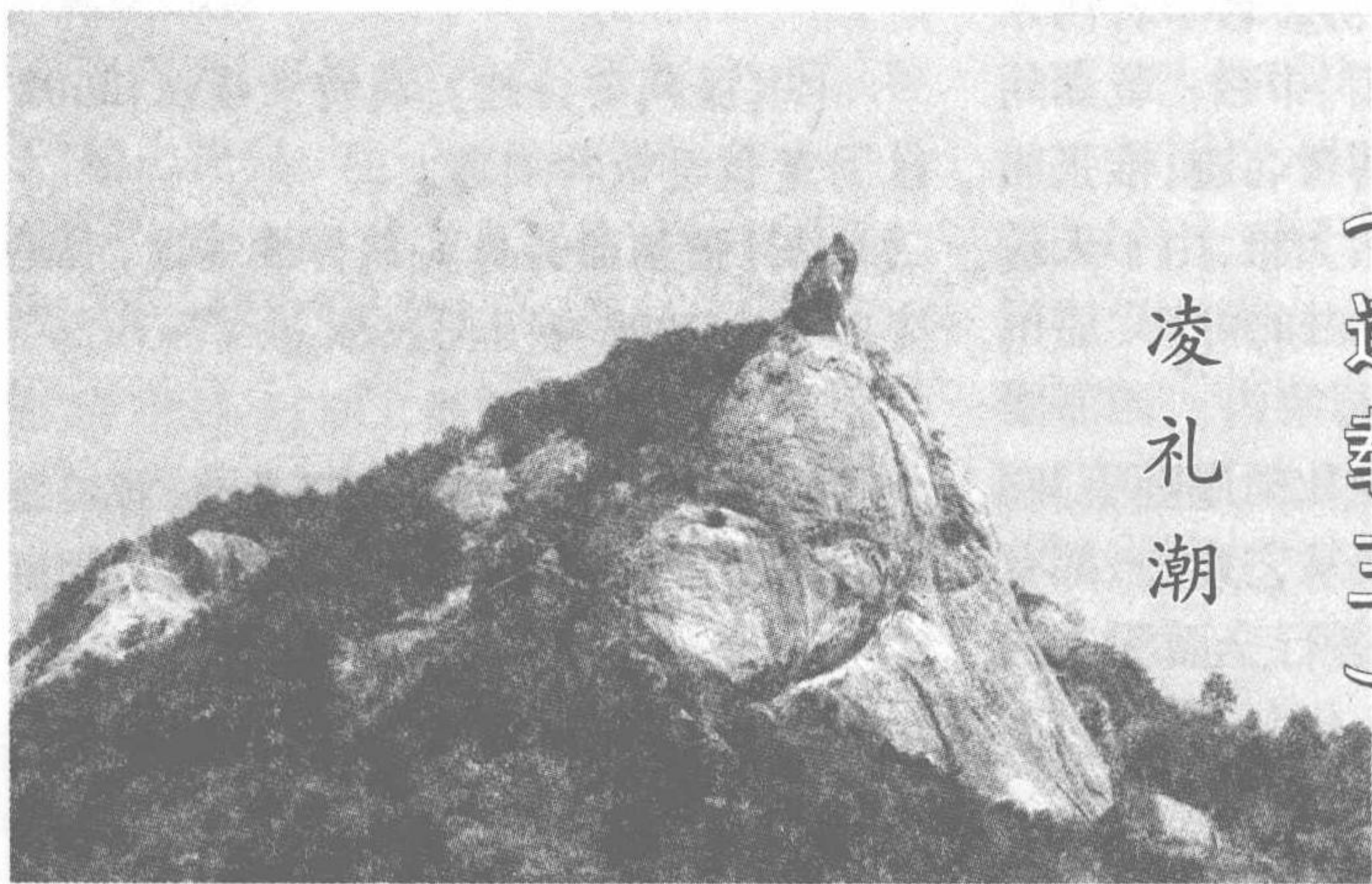
[4]《清代诗人张问安行年简谱》,胡传淮编,刊载于《川北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

[5]《张问安诗选》,胡传淮选注,2002年11月蓬溪县政协刊印。

[6]《张鹏翮诗选》,胡传淮编选,香港银河出版社2006年6月出版。

作者简介:胡传淮,1964年生,四川蓬溪人。大学中文系毕业。现任蓬溪县政协常委、文史委主任,系四川省楹联学会理事、遂宁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张船山研究会学术顾问。主要致力于巴蜀文化及乡邦文献的整编与研究。出版专著有《张问陶年谱》《张鹏翮诗选》《张问安诗选》《王灼集校辑》《大英风物志》《蓬溪诗存》《船山诗草全注》《千年逸响:蓬溪诗词史略》《笑问君从何处来:蓬溪姓氏备征》等,已在《社会科学研究》《红楼梦学刊》《苏州大学学报》等学术报刊发表论文30余篇。





凌礼潮

(连载三)

麻城史话

八、柏举之战

上一期我们讲到麻城人民的两次亡国之痛。第一次是在公元前 648 年,黄国灭亡,麻城正式并入楚国版图;第二次在公元前 224 年,楚国被秦国灭亡,麻城随之成为大秦帝国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在楚国一千多年的历史中,麻城有 425 年成为楚国的属地。

历史学家们习惯于把公元前 770 年至公元前 476 年这近三百年称为“春秋”时期,而把公元前 475 年至秦统一全国的公元前 221 年这 250 多年称为“战国”时期。我们知道,整个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战争最为频繁、杀戮最为残酷的时代之一。在冷兵器时代,军队的数量,就是胜利的保证。因此,无论是春秋五霸,还是战国七雄,他们无不最大限度地动员本国军事力量参加战争,同时,也无一例外地大规模屠杀敌国人民,以保持自己的绝对人口优势。麻城地处江淮之间,是楚国东北边鄙之地,东边是吴国、东南有越国,北边更是中原各强邻,基本上总是处于列雄争霸的前沿阵地。发生在公元前 506 年的吴楚“柏举之战”,就是最典型

的一例。

公元前 506 年,吴王阖闾亲统大军,以伍子胥、孙武、伯嚭为副总指挥,联合蔡、唐两国军队,大举进攻楚国。

这伍子胥可不是等闲之辈。他本是楚国人,由于楚平王杀了他的父亲伍奢和哥哥伍尚,并要追杀他,他才逃亡到了吴国。伍子胥见到吴王僚(阖闾的父亲)后,便极力宣扬进攻楚国的好处。吴王僚连连点头称是,但站在一旁的公子光(阖闾)却反对说:“伍子胥是因为父兄被杀而欲报私仇,他的话万万不可听。”伍子胥听后心中暗想,这公子光一贯主张消灭楚国,今天为什么一反常态呢?啊!一定是怕吴王采纳了我的主张而重用我,妨碍了他夺取王位的行动。一个念头在伍子胥的心头闪过:“既然如此,我何不助他一臂之力,让他当上国王,再借他的手去讨伐楚国呢?”于是,伍子胥物色了一位名收专诸的武士,推荐给公子光,自己却躲到吴国的边境上去种地,等待事态的发展。七年后,机会终于来了。公子光利用专诸杀死了吴王僚,夺得了国君的宝座,他就是吴

王闾閭(一作闾庐)。闾閭论功行赏,马上任命专诸的儿子为卿,任命伍子胥为行人,管理朝觐聘问方面的事务,并参与军政大事的谋划。从此,吴王闾閭得到了足智多谋的伍子胥的支持,而伍子胥为了复仇,也积极地为他设谋划策。

孙武更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军事家。他的祖先居住在陈国(今河南东部及安徽一部分),因避战祸而逃到齐国(今山东北部)。他的祖父叫陈书,是齐国的战将。因为攻莒(在山东)有功,被赐姓为孙。孙武年轻时就研究军事,苦练剑术。后因齐国内乱,来到了吴国,从军数年,参加过对楚作战。受伤后隐居于吴国边境,认识了伍子胥。经过伍子胥的推荐,吴王闾閭召见了孙武,和他一起讨论军事理论和战略战术。这时,孙武又献上他所著的兵书十三篇,并在闾閭面前进行阵法的实际演练,深得闾閭赏识,立即任命他为将军。

伍子胥还推荐伯嚭当了吴国的大夫,伯嚭是被楚灵王杀掉的伯州犁的孙子,也是被迫逃到吴国的,他的精明干练也得到吴王闾閭的重视。

吴王闾閭是一个心雄志壮、决意击败楚国,谋求霸业的人。有此三人的辅佐,简直是如虎添翼。他锐意整饬朝政,安抚百姓。自己的生活极为简朴,吃饭只做一道菜,座位只垫一层席,用具不施雕饰,车船不加装潢,宫苑内不造楼阁,住室不建在高坛上,衣着穿戴只求结实耐用。而每当国内遇到灾害以后,他就亲自去巡视灾情,安抚孤寡,赈济危难。在行军作战时,常常要等士兵都分到了食物之后,自己才食用。有时得到一些珍贵的食品,也总要分给将士们尝尝。因此,吴国虽然长期作战,但国家的财力不感匮乏,士兵也能为之效命、努力向前。

与此相反,此时的楚国,正处于极为混乱的状况之中。国家政治腐败,经济萧条。

统治者穷奢极侈,又以令尹囊瓦(子常)为最。令尹是楚国最高的官职,囊瓦掌握军政大权后,残暴贪婪、聚敛无度,老百姓的生活却日益贫困。于是,民众们纷纷铤而走险,聚众反抗。

囊瓦的贪婪,还引起了蔡国(在今麻城北部河南省境内)和唐国(在今随州市西北唐县镇)极大反感和不满。事情是这样的:蔡昭侯在得到一大块美玉之后,命玉工精雕细琢,制成了两件玉佩。又让缝工制成了两件轻厚柔软、毛色纯净的皮衣。当他朝聘楚国时,自己穿了一件皮衣,戴了一块玉佩,把另一件皮衣和一枚玉佩献给了楚昭王。在欢迎他的宴会上,楚昭王和他两人都穿戴着相同的皮衣和玉佩,兴高采烈,酒席尽欢而散。第二天,囊瓦向蔡昭侯索要皮衣和玉佩,蔡昭侯拒绝了。于是,囊瓦公然将他囚禁在郢都,这一囚,竟然长达三年。唐国的国君唐成公朝聘楚国时,带去了两匹驪驪马。驪驪是名马,肥壮高大,善跑健走,毛长而光滑,遍体无一丝杂色,极逗人喜爱。囊瓦一看,喜之不尽,便向唐成公索取,唐成公没有给他,结果也被扣留起来。

唐国有人商量了一个办法,派人来替换唐成公的随从人员,用酒灌醉了他们,将马偷去献给了囊瓦,唐成公才得以释放。回国之后,偷马的人自请囚禁并答应赔马,唐成公不但没有处罚他们,反而给予了奖励。但唐国对楚国却十分仇恨了。

蔡国人知道了这件事,便坚决请求蔡昭侯将玉佩献给囊瓦。蔡昭侯无奈,只好忍痛割爱。他在回国的途中,路过汉水时,将随身佩戴的另一枚心爱的玉佩折断后丢进汉水,并发誓说:“我如果再过汉水去朝见楚国,就象这汉江一样,一去不复返!”

蔡、唐和楚的矛盾尖锐起来,伍子胥利用这个矛盾,迅速出使蔡、唐,游说他们反楚,结成了吴、蔡、唐的联盟。

其实,伍子胥早就做好了全面进攻楚国的准备。他知道,楚国执政的人虽然很多,但因为互相不和,没有人敢承担责任,所以对吴国的进攻,不能分开独立作战,往往几个掌权的人同时领兵而出。他便利用楚国的这一弱点,建议阖闾将吴国军队组成三支独立的作战部队,轮番对楚发动突然袭击,遇到抵抗就迅速撤退。待楚军退回,马上又出击。每次出兵,吴只须出动一支部队,楚却要出动全部兵力,其结果必然使楚军疲于奔命。而且,此计还可能诱使楚军失误,吴军即可组织全部力量猛攻,必胜无疑。这就是有名的“三军病楚”之计。因此,楚国在楚昭王继位后年年受到吴的进攻,楚军被拖得兵疲将倦、困顿不堪,辛辛苦苦却落得军事上的连续失败。公元前512年,吴军攻克舒地(今安徽庐江县西南),杀了投降楚国的公子盖余与烛庸。同年冬天,灭徐国(今江苏泗洪县南)。第二年攻占了楚国的六(今安徽六安)、潜(今安徽霍山县)两地。公元前508年攻占巢邑(今安徽桐城县南),俘获了驻守在巢邑的楚大夫公子繁。至此,楚国的外围据点基本扫清,大规模战略进攻的时机已经到来。

楚昭王十年,也就是公元前506年的冬天,战争的序幕正式拉开,吴、蔡、唐三国联军大举攻楚,目标直指楚国的首都——郢!

吴军首先北上入淮,乘船溯淮河西进,至淮汭与蔡军会合后舍舟登岸,再急行军南下直抵汉江。这条行军路线看起来有些奇怪,从空间距离上讲,吴军自都城(今苏州市)沿长江而上只有约600公里就可直达楚国腹地,但他们偏偏先北上,再西进,然后南下,绕行近千公里。这是为什么呢?其实,选择这样的行军路线,正充分体现了《孙子》兵法中“以迂为直”、“以患为利”的军事思想。

因为这条路线是经吴军连年扫荡后,楚军防守最薄弱的地带。徐、钟离、夷、六、潜、巢等地已经为吴所有,成为吴的前沿阵地,吴军能顺利通过而不会被楚军发现。这正与《孙子·虚实》所说的:“行千里而不劳者,行于无人之地也”相合。也合于《孙子·九地》“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实际上正是如此,西进的吴师未遇楚军阻拦,得以突然出现在汉水边上,给楚国君臣造成强大的军事压力。

至于吴师从淮河登陆的具体地点,我们同意“安徽凤台县”说。理由很简单,河南固始县侯古堆有阖闾夫人墓,经考古鉴定,该墓下葬于公元前506年冬或公元前505年春^①,而固始正好处在从凤台至郢都的直线上。同时,我们还可以断定,该墓应下葬于吴军进攻而不是撤离楚国的路上。因为阖闾夫人如果是死于撤离途中的话,吴王肯定会将其带回吴国安葬,而不会就地远葬在楚国的辖境里。

《左传·定公四年》说:“(吴军)舍舟于淮汭,自豫章与楚夹汉。”对于“豫章”这个地名,杜预说“当在江北淮水南”或为“汉东江北地名”。后人据此解释不一,但最为权威的有两种,一是顾栋高《春秋大事表》,谓豫章系宽大语,东从安徽中部起,西至河南息县、湖北红安县(包括两省的江北、淮南地),南从江西鄱阳湖地区起,北至安徽西北部,皆为楚之豫章地;二是高士其《春秋地名考略》谓在今安徽凤阳县以西,包括淮河以南的光山县以东,霍山县以北地区。两种意见,不管是哪一种,都与我们上述吴军的行军路线相一致。总之,吴军直抵汉水东岸,与楚军隔汉水对峙。

这时,楚国的左司马戌与令尹囊瓦商量说:“您沿汉水与吴军周旋,不让他们渡过汉

^①张正明《淮汉之间一周代的一个文化交错地段》,载《中原文物》1992第二期。

水。我先率领方城山以外的兵力毁掉他们的船只,然后回师堵住大遂、直辕、冥厄三关,截断敌军退路,您再渡过汉水进攻,我们两面夹击,必能大败吴军。”囊瓦同意了这一战略计划。

当左司马戍领兵出发以后,大夫武城黑却建议速战速决,大夫史皇也别有用心地调拨说:“楚人厌恶您而喜欢司马,若司马毁舟堵隘,战败了吴国,将是他一个人的功劳。您应该速战速决,否则,就会对您不利!”囊瓦在他们的怂恿下,便不顾原与司马戍所定的计划,贸然下令渡河进攻。吴军长于徒战和水战,短于车战,便向东作战略撤退,边退边战,引诱楚军进入山地。从小别山(今汉川酃山),一直退到大别山南麓,其间三战,双方各有伤亡。囊瓦求胜心切,穷追不舍。

11月18日清晨,两军在柏举相遇,吴军决战的机会到了。在商量作战计划时,阖间的弟弟夫概主动请缨,要求带领精锐部队为先锋,突然向楚师发动进攻。他说:“囊瓦这人不仁不义,他的部下都没有为他牺牲的志向。我抢先冲过去,他的军队一定会不战而逃。我们的大部队再随后压上去,一定能大获全胜。”阖间担心他遇到危险,不同意他担任先锋。夫概大声说道:“为国献身,义无反顾今天就是战死,也要直捣楚都!”转身率领五千精兵,抢先猛攻楚军。果然不出夫概所料,楚军一触即溃,被吴军打得大败。囊瓦逃奔到郑国去了,史皇死于乱军之中,吴军一直赶到清发(今湖北安陆浈水),趁楚军半渡之机,又一次打败楚军。往往败逃的楚军正做饭,吴军一赶到,楚军便弃饭而去,吴军吃完楚军做的饭,又继续追赶楚军。在吴军的追击下,楚军士兵的情绪一落千丈,完全丧失了抵抗的信心。吴军接着又在雍渚(今湖北京山西南)等地五次大胜楚军之后,于11月28日攻进郢都。楚国这个建都近二百年的古城第一次沦于敌人手中,直到第

二年秋,才在秦国的帮助下收回。

这场吴楚大战,历时十月,楚国创巨痛深,遭受沉重打击,元气大伤,中部的荆州和北部的麻城损失尤为惨重。

“柏举之战”,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著名战役,也是中国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据《吕氏春秋·用民》的记载,此役吴国动用的兵力不过三万。《吕氏春秋·简选》还载:“吴阖间选多力者五百人,利趾者三千人,以为前阵,与荆战。”这大概就是夫概率领的那支冲锋陷阵的前锋部队!

“柏举之战”距今已2516年,战争的阴霾,早已烟消云散。然而,麻城这个当年的主战场地,会永远被载入史册,成为学者研究、文人凭吊、民众猎奇的圣地!



从麻城各姓氏族谱

看湖广麻城孝感乡移民现象

李 敏

“若问祖籍在何方？湖广麻城孝感乡”，这是川渝两地数千万人民对于祖先的共同记忆。在世界被称为“地球村”之今日，高科技的快速发展与应用，“环球同此凉热”的趋同性，使人们愈加怀念并刻意追求自己的精神家园。寻根问祖，已成为初步走向小康的诸多中国人（包括海外侨胞）共同的心理需求。近年来，到麻城寻根问祖的川渝（含由川渝两地又转迁滇、黔等其他地区）移民后裔越来越多。令人遗憾的是，有关麻城孝感乡的历史遗存，极难在各种文献资料中查找到有价值的信息，以至于研究中国移民史的著名学者葛剑雄教授也为难地说：“我们在撰写《中国移民史》时，也以这一重要的移民发源地（指麻城孝感乡）不见踪影为憾。”^①

近四年来，笔者查阅了麻城 120 姓（此 120 姓涵盖麻城现居人口 90% 以上）160 支宗谱，对孝感乡移民现象形成两点粗浅认识，简述如下。

一、元末明初，“江西填湖广”与“湖广填四川”两大移民流基本同步进行，从战乱流徙到奉旨移民，由自发西迁到“徙实填空”，麻城孝感乡逐渐成为长江走廊上的移民集结地

（一）麻城土著流徙四川

综括麻城各姓氏族谱的相关记述，元末明初自麻城移民四川有下列几种情况：

1、随红巾军将领明玉珍入川

元至正十一年（1351 年）八月，麻城铁匠邹普胜与罗田布贩徐寿辉、江西和尚彭莹玉等人聚众起义，全盛时拥有百万军队。麻城与罗田是邻县，作为“南红巾”的发源地和根据地，众多当地农民参加了这场持续 18 年的农民战争，其中部分人离开家乡后，又随义军将领明玉珍辗转进入四川。我们从《陶氏宗谱》的相关记述中，可见一斑。

陶家在北宋初期入籍麻城，至元朝已成为当地土著。《陶氏宗谱》中保存有一篇《五户叙》，文中说：“大元至正间，红巾作乱，……先是妣陈氏携三孤（源、海、梁）及叔僎（名细宝）潜逃避难，贼兵逢之，掳细宝。陈氏思叔乃公姑之脉，必欲留之，哀求贼众，愿将三子任取其一以易叔。贼悯其哀，遂取梁而去。”

在陶氏瓜藤谱中，陶梁名下亦有一段文字：“值元时红巾贼起，公母陈妣携公兄弟三人与叔僎避乱。忽僎公被掳，陈妣将公换叔。贼遂将公掳至四川成都府，离城五里，遂入籍焉。”

这是麻城人跟随邹普胜起义,后来又随明玉珍转进四川,在蜀地入籍的典型案列。

2、因战乱引起的麻城难民大批流向四川

红巾军兵分两路,挺进湘赣,一直打到浙江福建。至正十三年(1353年)遭到元军围剿,进入低潮。十五年春又大举反攻,在汉阳县城重新建都。到至正二十年(1360年),红巾军内讧,先是陈友谅暗杀徐寿辉,篡权夺位改国号。三年后,朱元璋又与陈友谅大战鄱阳湖。陈友谅战死,邹普胜下落不明。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中,未参加造反的麻城土著,大多因战争逃难四方,其中又有一部分流向当时相对安定、更有楚人明玉珍在那里主政的蜀地。到明朝立鼎后,麻城已成为人烟稀少之地。

阮姓是宋代端平三年因官留籍麻城的。康熙五十六年《阮氏宗谱序》说:“迄其元末流氛猖獗,井里邱墟,城郭皆非。三乡人民仅存八户,其余黔氓徙自江右。”

麻城土著到哪里去了?因绝大多数明代麻城族谱毁于明末战火,仅有个别家谱中保留了零星信息。

中馆驿镇甘姓始祖甘理于北宋太祖八年(967年)迁入麻城田水畈,谱载族人甘永发在元顺帝(惠宗1333—1368)时迁居四川。城区坝陂李氏始祖李季八于宋朝末年“提兵抗元”,自江西南昌入籍此地。季八次子玄(元)中、三世孙振纲、五世孙义甫、六世孙信忠等人,相继迁往四川。

3、洪武初期奉旨移民入川

麻城土著被朱元璋视为敌对势力,实行强制迁徙。明朝初期,战乱平息,参战和逃难的人群回到已经残破不堪的家园,面对的是新的强制性迁徙。

郑家是元朝望族,始祖郑亨于宋朝晚期因军功授职百一总管,入籍麻城。其长子郑

和,元朝初年升任千一总管。三世郑绥,又因军功晋升万一总管。大元王朝近百年,郑家一直是麻城的统治者。到明朝初年,郑家已有大小人丁500余人。朝廷规定,除长房长孙文英留本地守护祖墓外,余皆分迁各县。文英叔父郑荣庆急中生智,以入赘妻家为借口,改名梅敬立户,得以留在麻城,后来发展成颇为兴旺的梅氏望族(见《郑氏族谱》《梅氏族谱》)。并且,据郑家族人口耳相传,至今仍在说他们的祖先曾经与皇帝争天下。可见郑家是因被视为新朝廷的对立面,才强制迁徙分散各地的。

另一家旧氏族《陶氏宗谱》中保存的《五户叙》一文,一针见血地揭示出麻城土著被强行迁徙的历史原因,“妣(陈氏)携三幼入金刚台(河南商城县)。大明定鼎六年方归麻邑。邑只有秦黄陶李毛五姓,以麻城好反,众皆掉于四川矣!”

(二)“江西填麻城”与“孝感乡填川”

为了比较准确地说明这一问题,我对以原孝感乡为主的120姓160支麻城各姓氏家谱进行了摸底统计。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至明洪武末年(1398年),48年间迁入麻城的家族计有107支,除1支来自蒙古、2支来自福建,还有本省蕲州府1支、襄阳府枣强县1支,其余102支均来自江西,占95%以上。而这些元末明初自江西迁入麻城的家族中,又有大量人群迁徙四川(含滇、黔)、陕西和邻近的德安府(今孝感市地区),一般称之为“麻城过籍”。

江西百姓因何成群结队迁徙麻城?《余氏族谱》中保存了一篇《二世祖君义公迁麻遗文》,文中转述了他父亲余万伍对迁徙历程的口述:

我父之迁麻城也,在洪武之八年,十年生我。我八九岁时,父尝对母言曰:迁居之苦,当为儿言之矣!陈友杰(谅)抚有江西福建,太祖未下,兵燹之忧,日

无宁刻。虽大军爱民如子,而百姓见之提防,人各避锋,土如瓜裂。我于是携母走浮梁,过余干,至庐山、鄱阳,澎湃惊人,月余始渡。寄食于兴国州之胡姓家数日,胡姓诚恩人也。后忽至武昌之金牛,欲居焉。然江分南北,南岸干戈如故,不若江北之稍宁。春三月渡江,由齐安北上,幸遇故土之郝公、秦公、曹公,亦逃居于麻泥陂之所,我始安焉。儿记之,以遗后人。

从余万伍的迁徙历程看,余家是在朱元璋与陈友谅大战(元至正二十三年)之前离开老家,沿途经过浮梁县、余干县、庐山、鄱阳。在鄱阳湖岸等待“月余始渡”,又在兴国州一胡姓人家“寄食数日”,然后在武昌住下来。因长江南岸仍在打仗,而江北相对安宁,便渡江北上,正巧遇到原来江西老家的几户人家,一起来到麻城。足见这一迁徙过程持续了至少十二三年之久,迁徙原因是“兵燹之忧,日无宁刻”。值得注意的是,《余氏宗谱》在提到原籍时,舍掉了这一复杂经历,只简而言之“江西瓦屑坝”。

从相关记载看,“江西填湖广”与“湖广填四川”是同步进行的。

1、元朝末期及明初几年自发入川

因朱元璋的军队在洪武四年才平定四川,所以我们将洪武四年之前视为自发入川,并入元末时期来综合记述。

元代晚期自江西迁居麻城举水河东沈家庄的熊朝武,生有五个儿子,长子次子同迁四川。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自江西南昌迁居麻城县城的熊易甫,四个儿子中就有一人迁四川邻水县。

2、随明朝军队入川平乱

来自江西浮梁县的丁宏,元朝末年官黄冈县正堂,其长子定居麻城宋埠,次子提兵赴四川重庆府平乱,遂定居。

3、“孝感乡”填川

据专家们的考证,在明初“洪武大移民”中,孝感乡是“江西填湖广”和“湖广填四川”的集合地和出发地。江西移民在这里停留了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后,又经历山遥路远的长途跋涉,才得以进入巴蜀之地。“豫章人”、麻城人便共同把“湖广麻城孝感乡”作为自己移民四川之前的祖籍地。此种现象,与华北移民后裔统称自己祖籍“山西洪洞大槐树”,江西移民后裔皆言来自“瓦屑坝”极为相似。至于后来清朝初期“湖广填四川”的移民也称来自“麻城孝感乡”,另当别论。

综上所述,元末明初的“江西填湖广”与“湖广填四川”,如一条长长的历史河流,江西为上游,巴蜀为下游,麻城孝感乡则是中游的一个交汇合流处。她汇聚起千川万溪,又向西涌去。

历史的机缘,使麻城孝感乡成为明初“西部大开发”长江走廊上的移民集结地、出发地。

二、明末清初,农民起义军与“乡绅山寨兵”风生水起,割据麻城,张献忠在麻城重建“孝感厅”,“麻城孝感乡”名声再起。大西军入据四川兵败,残兵隐居民间,自称原籍“孝感乡”

明代麻城孝感乡至成化八年(1472年)即已撤并入他乡,而大量清代前期迁徙四川的移民仍自称来自麻城孝感乡,此种反常现象,惹出种种非议,众说纷纭,至今未能有令人信服的说法。笔者从麻城谱牒中窥得只鳞片甲,愿与诸君商榷。

《邹氏宗谱》卷之四邹知新《都碑记》云:“然崇祯间,适值献祸^②,邑名更长顺,八大王广置乡间,招合流旧,计丁授田。时于富人沈万三秀雕彩之古宅,依议复置。献力置孝感厅,耀恩风相传。析其故地,添置信义(后面有三个字原文空缺)和清平,一时避地逊名者多有附焉。梅宗长者亦默如忘言。”

从上述引文中,可知张献忠到麻城后,

曾在原孝感乡都重建“孝感厅”，并且特别提到，“梅宗长者亦默如忘言。”为阐述张献忠重建“孝感厅”与清代所谓“孝感乡填川现象”的历史渊源，不可不对明朝末年麻城的“地域社会”作一简析。

1、梅之焕的“乡绅统治”

据光绪八年《麻城县志》载：崇祯“八年乙亥，流贼往来如织，然未尝攻城，止肆野掠杀，掳无算，房屋尽毁。各乡依山结砦保众，官兵坐视不援。凡贼魁谓之‘掌盘子’，余以绰号行，曰‘紫微星’、‘老回回’、‘闯塌天’、‘射塌天’、‘老曹操’、‘过天星’、‘一只虎’、‘隔帘燕’、‘扫地王’、‘闯王’、‘闯将’、‘一斗粟’、‘混世王’、‘八大王’。邑绅梅之焕倡率捍卫。”

梅之焕(1575-1641)其先祖就是由郑荣改名梅姓的梅敬。他本人曾官任甘肃巡抚，立有军功。卸任后居乡十余年，仍以济民除害为己任。梅之焕挚友钱谦益在他去世后三年所写的《梅长公传》中述及，“(公)家居门无重闭，室无典谒；杀鸡饭黍，宾客杂坐，笑语喧阗，几案狼藉。小夫孺子、乞儿贩妇，冤愤赴愬，直入坐隅。公召其所与交哄者，往复譬解，平亭曲直，务使得当而止。县中桀黠奴与奸猾吏，盘互渔市；闾里冤结者，不之有司而之公。公必擒治，痛折辱之，列其罪状付守令，案伏其辜，不得以势力变诈自解。由是，竿门圭窦，倚为司命；势豪虽侧目视公，亦不能不为絀服也。”^③可见，当时梅之焕所居住的县城河东沈家庄，已成为事实上的“城外衙门”。

2、麻黄山寨与农民起义军之对抗

面对天下变乱迭起，官军缓不急用的危局，梅之焕自崇祯七年起，“即请于江西、南赣两抚军处，得大炮手数百，自馆谷之。又购红衣炮(明天启年间自国外进口的最先进的重型大炮)于粤东。扩沈庄旧居，筑垒濬渠，堡曰‘护生’，与邑城犄角。远近避贼者

聚居之，乡人壮勇者练为兵。又募深山杀虎药弩手数百，皆月饩之。大炮备城守，药弩伏关隘。自乙亥至今八年，每年贼凡数至，终不敢近城堡，每次活人以万计。”^④

钱谦益在《梅长公传》中也谈到：梅之焕“用军法部勒材官乡人子弟僮奴，……畜养赣儿数百人为正兵，备出战；收无籍恶少为游兵，资应援。”在天下大乱的危机下，梅之焕建立起一支“梅家军”，保家保乡保地方，“张献忠西兵所在焚掠，每过沈庄，必敛兵免胄，稽首而去”。

自梅之焕始，麻城乃至黄州、蕲州，各地官绅地主多行仿效，聚家丁、族人于山寨自保。一时间，大别山南北涌现数百座山寨，最著名者有蕲黄四十八寨，后发展为江淮七十二寨。这些山寨始则御草寇，继则拒清兵，风云数十年，此蹶彼兴，直至康熙十三年被于成龙最后剿灭。此种现象也吸引了欧美汉学家的眼球，四年前，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教授罗威廉先生专程来到麻城，请笔者带其考察麻城山寨，听说回国后写了一本关于麻城的书，名为《红雨》。

3、“里仁会奴变”与张献忠据麻城

崇祯十四年(1641年)八月十二日，梅之焕病逝，年67岁。未及两年，麻城即发生“里仁会奴变”。

清代史学家计六奇对这次事件作了相关记载：“癸未(崇祯十六年)四月，麻城宦仆李人(里仁)会聚众叛主，城中大乱，乡野亦起兵数万，围困半月不克，……(里仁会)遣人縋城下，由间道求救。时献忠……，麻城使者至，大喜，即刻期进兵。乡兵闻之，各解围走。献忠入麻城。城中降者五万七千人。献忠别立一军，号为新营。勇士将之，势复大盛。”^⑤

“里仁会”是由那些人组成的，因何聚众叛主？《梅氏族谱》中存有一篇《雪萝答客问》。雪萝自称老僧，在梅之焕去世五年后

作此答客问。文曰：“里仁者，故居士（指梅之焕）所募练游兵。流寇甫入楚，居士虑诸恶仆及城中无赖子莫羁縻，故集而为兵，署五哨，自将之，日与周旋。匪利以御寇，正防其投寇。岁费廩饩数千金。……居士歿，部曲零落。李沧汇将凌逼梅李诸孤，惮诸恶少，欲芟除之，有漏言，又平夺其队长商元之子妇，人人自危，起而图之。虽地下两大老与沧汇相忘，而洪明诸人顾以为国土报冤也。由是两会合并，事益倚张”。^⑥

可见，所谓“里仁会”，其核心骨干，正是梅之焕所招募的那些寨兵，其中自然也包括那些“江西炮手”和钱谦益所说“无籍恶少”。这些人在失去强权者的阴翳后，在面临新的统治势力强暴凌逼下，铤而走险，终于奋起造反了。参加奴变起义的，自然还有其他巨族的家丁仆隶。清代方志学家王葆心曾说，“楚士大夫仆隶之盛甲天下，麻城尤甚。梅、刘、田、李，强宗右姓家僮不下三、四千人。”麻城在明代考中进士者136人，大小官员数以千计，其他世族著姓也或多或少蓄有家奴。故在明末清初二三十年间，曾先后三次发生奴变。至顺治八年（1651年），终于迫使大清律例对主仆关系作出专项规定。

再者，雪萝僧以同情口吻提到的“洪明诸人”之事，光绪《麻城县志》记述为，“里民明承祖及仆辈洪楼先等结里仁直道二会，活埋杀所仇以倡乱，各乡寨鸠众围城讨乱”。^⑦梅家在这场奴变中究竟扮演了何种角色？不言自明。

总而言之，里仁会奴变的直接结果是，被乡绅山寨势力围困在县城中的造反者派汤志缵城，至安徽潜山县请来张献忠农民军解围，四月初六日张献忠入城，城中五万七千人归附张部。以故，在四川被称为“杀人魔王”的张献忠，在麻城的表现是“献忠终未戮城内一人”。“武进士洪正龙率千余人降，献忠优礼相待。并改麻城为常胜州，以曾参

与里仁会诸生周文江为知州，农民军始建地方政权。”^⑧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连梅之焕的外孙、四部尚书李长庚的侄孙李中素，当时年仅10岁，也偷偷跑出家门参加了起义军。

4、重建孝感厅

关于张献忠重建孝感厅，除上述邹知新《都碑记》所记外，钱谦益在《梅长公传》之结尾也述及，张献忠曾到沈家庄祭坟。“长公歿后二年，癸未三月，献贼陷麻城，戒勿犯梅氏，羊酒祭长公坟，罗拜而去。”从“里仁会”与梅家的渊源，我们可以认为，已经“零落”的原梅家军“部曲”，构成了“里仁会”及刚刚成立之“新营”的核心力量，原来的“队长”之类，自然成为义军军官，他们与旧主沟通，达成某种默契。其前因是，“李沧汇将凌逼梅李诸孤，惮诸恶少”，可见梅家主仆是相互依存的。因此，才有了张献忠的“祭坟”之行，才能在沈家庄“富人沈万三秀雕彩之古宅依议复置孝感厅”。以故，“梅宗长者亦默如忘言。”

“孝感厅”有何职能？邹文也说得明白，即“招合流旧，计丁授田”。流旧，自然是梅之焕那些“零落”的“部曲”；而计丁授田，对以土地为命根的贫苦农民、特别是流民，更具有极大吸引力。借用沈家庄的地名地利和“梅家军”的旧日声威，农民起义军摧枯拉朽，所向披靡，连克鄂东各州县，5月克武昌，献忠称“西王”。

8月初，孝感厅随着张献忠在军事上的失利而垮台。虽然短命，但在麻城人、特别是那些先跟随梅之焕，后投入张献忠义军的将士心目中，对“孝感乡”这一地名，无疑留下了深刻印象。

5、麻城“新营”大部入蜀，孝感乡地名带入四川

关于张献忠农民起义军中麻城“新营”的最后归宿，《黄冈市志》的记述为“黄、麻归

附张献忠农民军的人员大部随军西进入川。”王葆心在《蕲黄四十八寨纪事》中则具体记述为“七月，献忠拔营入蜀。其降贼诸孽随献忠入蜀者，有伪振武营总兵麻城洪正隆、伪英勇营总兵黄冈张其在、伪龙韬营总兵麻城商元。”^⑨主编《清代四川史》的王纲先生也认为“这些部队都在崇祯十七年（1644年）西进四川。虽然在作战中牺牲了不少，但有相当部分都仍留在四川，只不过因为大西军坚持抗清，被清政府一直视为‘贼寇’，他们在四川定居下来不敢言其身份而已。现在四川许多人都言祖籍系湖北麻城，可能有不少人的祖宗就是麻城参加大西军的那五万七千人中之一。”^⑩据道光《中江县志》卷六记载：“杨可举，字春吾。顺治三年（1646年）脱献贼之祸。六年（1649年）投效总督李国英标下。时中江未设县官，总督以可举能，又熟悉本邑事，檄委代理。时邑境人稀地广，朝夕与居者惟投诚数百余人。”

可见，在清朝初年，四川中江县最早的人口来源，就是张献忠农民起义军残部的数百人，而且极可能有相当数量的麻城人。他们在向后人说起自己的籍贯时，极有可能笼统言之：来自麻城孝感乡。

有了这批清朝初年最早在四川落脚的“孝感乡”农民军残余，渐成势力，后来者或真或假加以附会，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也就不足为奇了。笔者亦在麻城众多族谱中发现一个普遍现象，自清初康熙年间至嘉庆年间，各族谱牒大量记载着迁徙川、渝、陕、豫、黔、滇者和本省他县的族人名字，以川、渝为众。麻城中馆驿镇梓树畈刘氏谱牒记载，自麻城迁往川、滇、黔三省的第一代迁徙者有260余人（只载户主姓名，妇女儿童不计），散落在进川途中之鄂西、川北、陕南三角地带的寄籍者，亦有100余人（仅累计自麻城迁出的第一代迁徙者）。白果镇罗姓，清代也有300余人首迁四川。上述两例，尚未统计

其族谱中大量“被寇掳去”和“外出未归”的不知下落者。

清代麻城移民大批入川，除上述各种社会因素外，尚有两大要素有待考证。一是设在麻城西南水陆交通枢纽歧亭镇的黄州同知府（民间称“二府衙”）在移民中所起的作用；二是清乾隆后因商品经济之发展而形成的“黄州帮”（由麻城人发起并占主要成分），往返川渝贸易，偕当地同籍移民广建“帝王宫”，联络同乡，其作用亦不可低估。因篇幅所限，他文另述。

总之，笔者以为，探寻麻城孝感乡移民现象之历史渊源，研究这一场持续数百年的长江走廊上自东而西、自下游溯上游的“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必须重视对“麻城地域社会”的解剖透视。

【注释】

①葛剑雄《麻城孝感乡——中国历史上的移民发源地之一》原载《四川日报》1997年5月9日。

②清钱谦益《梅长公传》见麻城《梅氏族谱》卷首中册第七十六页。

③万延《明故嘉议大夫巡抚甘肃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梅公行状》见《梅氏族谱》卷之首中册六十七页。

④清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十九。

⑤麻城《梅氏族谱》卷之首中册八十一页。

⑥《麻城县志》光绪八年刻本卷三十七“大事记”一。

⑦麻城《梅氏族谱》卷首中《雪萝答客问》。

⑧《黄冈市志》卷二十八第1427页。

⑨清王葆心《蕲黄四十八寨纪事》卷一“鄂寨篇”，原书存黄冈市档案馆。

⑩王纲《清代四川史》，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85页。

熊殷、熊受一迁川资料汇编

刘明西



麻城市鼓楼办事处沈家庄村的熊姓大户，于公元二〇〇六年元月三修清源堂号《熊氏宗谱》时，在《卷之首》，附录了民国年间曾任崇阳县长沈汝乔的一篇《沈庄湾老二房分谱序》（以下简称沈序）。从序文上看，它除了记述熊氏先祖的事迹外，还写了熊氏先辈移民四川或遗落迁川途中的大事。这篇序言，小标题是《朝用分谱序》，因沈家庄熊姓信奉的始祖是熊朝用，而朝用公与弟朝武公两人“继胜父”，一起落脚于沈家庄。文

章就从这里写起，包括张献忠操戈扰乱的明末及整个清代，时间跨度超过了六百年。在这几百年的时间里，据《熊氏宗谱》的记载，熊氏族入本来有很多移民活动及迁川先辈的名和号，而沈县长的这篇序文，只写了六百年前朝用、朝武两兄弟各自名下的迁川祖，紧紧扣住了“老二房分谱”这一主题。读罢才发现，它是一篇移民味十足的文献。

我把这些年来搜集到的有关麻城、四川、重庆和广水等地资料，汇聚成编。

（一）沈汝乔《沈庄湾老二房分谱序》

尝考熊族渊源始自鬻祖，公之八十五代孙，有朝用者。世传公继胜父，与弟朝武公卜居沈垞，乃始祖也。朝用公生四子：长以信，次以诚，三以谅，四以聪。信公生奇公，奇公生三子：长有宇公，次有受公，季有爱公。而宇公号洪正，公生青云；受公字润初，号受一，迁应山，为应邑始祖；爱公字失考，后裔仍居于邑城之东南，有散居各处者，人丁蕃盛，其门者不下千百计，迄今族大丁繁而立于邑之东乡。而同乡中，有远迁蜀地者，应数朝武公下。公妣沈氏，生五子，长子以勤携子殷，与弟以能远徙四川，后只身而悠然又居麻邑。殷公后嗣，因年湮代远，散居四方，互失联络，居里不能辩，渊源难修，惜哉也！尝闻殷公生二子，祖讳，均有后，惟人丁蕃衍，各居一方，不能细

数,后裔孙曾至总祠祭祖。时适献乱,干戈扰攘,民不聊生,劫后尽将谱牒遗失,以致宗支紊乱,同宗星散,稽无可稽,考无可考,诚可惜也!幸我师霖雨公寻其残卷,以录之,究不完善,所以有考,以便参详,永垂不朽云尔。

(二)老二房世派图

据清源堂《熊氏宗谱》卷之一《大房支派世系图》,可得知这一支熊姓人认定的鼻祖是熊胜可(字胜父),始祖是熊朝用,一世叔祖熊朝武。熊胜可本是熊朝用兄弟俩的伯父,《总图系》说朝用偕弟“继胜父迁麻邑”为“沈庄始祖”,由此推断,熊胜父在侄儿未迁麻邑之前,已经定居于麻邑,相传他有八个儿子,谱牒亦载“八邦分徙”,至于何因又让侄儿“入继”,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先不说这些,就谱表列出鼻祖至五世先祖的名号及简介:

一世 胜可,字胜父,号一龙,定居麻邑孝感乡甘都洞口下熊山,后裔八邦八徙,各谱详载。

二世 朝用,字佚,本良可公之三子,胜可公之侄,谱载继胜父迁麻邑,为沈家庄始祖,配周、詹氏。

二世叔祖 朝武,字佚,元配沈氏,入居沈家庄。

三世 以信,字佚,朝用公之长子,配胡、丁、周氏,生子一奇公,公妣俱葬河东门首。

以勤,字佚,朝武公之长子,配氏无详,生子一殷公。

四世 奇,字佚,以信公之单子,元配李氏,生子三,有字,有受,有爱。

殷,字佚,以勤公之单子,年幼随父入川,配氏、里族均无考。

五世 有受,号受一,奇公之次子,迁四川,为应山始祖,配氏、居里均无考。

(三)应邑始祖——受一公辨疑

迁麻鼻祖胜父的后裔“八邦分徙”。不

说迁往河南、四川的,单说迁到应山的受一公,为什么独提这位祖先呢?旧谱有多处记载,但有些矛盾,如《始祖世源序》里说朝武公生子五:以勤,以能,以良,以贤,以善。以勤携子殷,并与弟以能一同迁四川,勤后反邑。以良原想也到四川,后至德安府应山县落户。而沈汝乔《沈庄湾老二房分谱序》里又说朝用公生子四,长子以信……信公生奇公,奇公生三子,次子有受公……受公字润初,号受一,迁应山,为应邑始祖。细看这二条记述,共同点是迁往应邑,但房系人物不同,一是朝武公三子以良,二是朝用公之曾孙。沈汝乔在序言里说受公字润初,号受一,迁应山,为应邑始祖。而一修《熊氏宗谱》上说朝武公之三子以良至德安府应山邑落户。要说“应邑始祖”应当推以良公,因他比受公先去应邑,早六十多年,何况受公还是以良之侄孙,如果真要定“应邑始祖”,非以良公莫属。再说以良公生活在明初,正赶上移民四川的大浪潮,而应邑正是陆路通往四川的必经之路。沈汝乔序中这一错误,是有原因的:沈家庄熊氏族人,老幼皆知,受一公迁到应山。古人有“名”、“字”、“号”之称,一人多名,不足为怪,受一是以良公的大号,大号往往被人记住,而名和字则被遗忘是情理中事。沈庄人只知受一公迁到应山,清初来祭过祖,祠堂对联还提过这事,应山那里人丁兴旺,来时还骑了很多匹马。马匹不服水土,生了很多虱子,老家人把小伢打扮成猴子样,整天捉马尾巴上的虱子……老人谈到这事,还津津乐道。而沈汝乔小时在沈庄读私学,耳闻目染,看沈家庄旧谱时,误把字公、受公、爱公三兄弟之受公,说是受一公,于是把人物弄错了位。还有第八世尚寿、第十世允贞先后迁四川等都未曾考证。这次三修宗谱时,为了保存史料,让后世了解和研究这段家史,复印了旧谱上的沈序,并附在原序的后面,同时也真切希望在四修家史和续

写麻城移民志时,把这些误记的东西更正过来,还历史人物的真实。

(四)殷公、受一公后裔乃沈万三之后吗?

殷公是朝武公的孙子,受一公(以良公)还是殷公的三叔父,朝武公娶的沈氏,是江南豪富沈万三的女儿吗?如果要证实这个问题,先要证实沈家庄到底是不是沈万三的庄屋。民间相传沈万三又号沈万四,河对岸的村庄都说沈小姐是沈万四的幺女,还有很多传说。陈兆弘在明代经济史学术讨论会上发表的《明初巨富沈万三的致富与衰落》一文,重点提出沈万三从“躬稼起家”,继而“好广辟田宅,富累金玉”,以至“资巨方万,田产遍天下”,沈万三依靠垦殖发富,号称江南第一。既然“田产遍天下”,说明他的产业从江南延伸到了江北。查顺治年间王汝霖著的《麻城志稿》,云:“治东南七里许,即磨子场及孝故都……赤亭古城,与沈秀者码头湾诸名胜,如联珠然。”沈秀者何人?《明史·马皇后传》记载:“洪武时,富民沈秀者助筑都城三分之一,请犒军,帝忍曰:匹夫犒天下之军,乱民也,宜诛之。”可见这个沈秀就是沈万三。而《志稿》只记录了沈万三的码

头湾。一座码头,在古代只起水上运输的作用,他起居生活的住宅,也在沈家庄吗?明末清初麻城人邹知新在其《都碑记》一文里记载:张献忠占领麻城后,“于富人沈万三秀雕彩之古宅,依议复置(孝感厅)。”直接点明张献忠重置的“常顺州孝感乡”政府办公地,就在沈万三雕梁画栋的古宅里。这些史料和依据,都证实了沈家庄是沈万三的产业,朝武公娶的沈氏,应该就是沈万三之女。

(五)有关熊氏的民间故事

相传很久很久以前,麻城孝感乡所在地沈家庄有户熊姓人家,家中有三个儿子。按当时的圣旨令,三丁抽一要四川去。父亲把三个儿子叫到跟前,要大儿子去,大儿子说:“长子不离中堂。”父亲又要细儿子去,细儿说:“幺儿不离娘房。”父亲只好做老二的工作,老二听后直摆手,说:“哥不去,弟不去,我也不去!”不管怎样劝说,三个儿子都不去。老父亲年迈体衰,便叹着气,拿条毛巾裹在头上说:“唉,还是哥老子去吧!”儿子们见父亲说真的,又争着要去四川。这句话在四川流传开来,时间久了,由“哥老子”演变成了“格老子”,四川人总爱讲这句话。有些地方的人,还仍有出门缠头巾的习惯。



《“孝感乡都”考辨》之考辨

——三答邓经武先生

凌礼潮



邹知新《都碑记》一文发现后,我们及时在网上公布了这一重要文献,并就该文发现的重要意义,谈了一点粗浅的看法。12月13日,四川省社科院、四川省社科联、湖北麻城市政府联合召开的“移民文化与当代社会”学术研讨会在成都正式开幕。会上,我提交了《邹知新孝感乡〈都碑记〉考释》的论文,并作了“《都碑记》的发现及其意义”的主题发言。四川省有关媒体对这一重要发现,均作了报道。

18日,邓经武先生即在他的博客上发表了《“孝感乡都”考辨》(见本期第74页附)。看到这篇大作后,我即让“麻城政协网”的工作人员将其转载在网站的专栏里,以期引起注意和讨论。

邓先生的文章从三个方面对《都碑记》进行了质疑。第一,“州”的设置,是个重大

问题,为何《大明会典》、《明史》、《读史方輿纪要》皆不见记载?第二,麻城县孝感乡有无能力填充偌大的四川、改变四川人口荒芜的情况?第三,元末明初,四川是否荒芜到需要大规模移民来填充?最后的结论是:“孝感乡都”是一个孤证,孝感乡作为“全国八大移民基地之一”和“移民圣地”之说,还是需要质疑。

下面,我试着就这三个问题,作一个“学术性”的分析,以求教于邓先生。

一

关于麻城县升为“散州”的问题。

为讨论的方便,我们还是先引一下邹知新的原文:

往牒曰:“当洪武初,太祖定迁民之策,迁诏至公署,县堂徙治磨子场。十年,遂升其都为散州,统属七县。未几罢之。永乐中复旧治。弘治时,都崩基坍,故今不知有其乡云。”非虚语也。

所谓“散州”,是相对于“直隶州”而言,

指隶属于府之下,而无下辖县的一级行政机构。其长官级别低于知府,但高于知县。笔者认为,洪武十年,由于移民填川事务繁重,遂将麻城升为散州,作为政府临时设置的移民机构,“统属七县”移民事务,可能并非一种完整意义上的政权设置。

邓先生就此罗列了四种典籍,以表达其“史籍找不到相关记载就令人难以相信”的意见(文长不录)。在为邓先生的单纯和憨厚感动之余,我想谈一点看法。

黑格尔在他著名的《历史哲学》^①“绪论”中,将研究、观察历史的方法,归纳为三种:(一)原始的历史;(二)反省的历史;(三)哲学的历史。关于第一种历史,黑格尔说:“他们的叙述大部分是他们亲眼所见的行动、事变和情况,而且他们跟这些行动、事变和情况的精神,有着休戚与共的关系……当然,这些原始的历史家也利用别人的报告和叙述,因为一个人决不能耳闻目见一切的事情。”但是,他们的叙述,只是“简单地把他们周围的种种演变,移到了精神观念的领域里去,这样外在的现象便演成了内在的观念”。黑格尔在这里揭示的,其实是一个如所周知的事实,即历史家在他们叙述历史的过程中,至少要受到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他的“内在观念”,也就是他对于历史的看法。所谓“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如果《春秋》就是当时的“全部真实历史”的话,那么,那些“乱臣贼子”何待孔子“作”而后才“惧”?二是受其对历史事实重要程度的看法和判断的影响,对史实的记载有所取舍,也就是有所书、有所不书。三是信息是否全面,即是否能“耳闻目见一切的事情”。因此,那种以为所有历史事实都可以在典籍中找到“相关记载”的想法,只能是一种幼稚和天真!

举两个典型的例子,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上世纪七十年代,考古专家们在陕西的宝鸡地区,发现了一个完全不见于典籍记载

的西周古国——鱼国。一个国家,不管它有多小,比起一个州来,总要重要得多吧?可查遍史料,就是没有这个古鱼国的任何记载。邓先生是否能以其为孤证而否定它的存在呢?

还有。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全国推广郡县制。《史记》和《汉书》记载的秦郡有三十六个^②,《晋书》记载的有四十个^③。我们姑且不说王国维、谭其骧等人通过考证,将实际郡数增加至四十八个^④。值得注意的是,陈伟先生根据里耶秦简 J1:16:5、张家山汉简《奏谏书》等资料,论证了不见于传世文献记载的秦苍梧、洞庭二郡之存在。^⑤那么,邓先生是否承认,比起州来,郡的设置更“绝对是一件大事”呢?

当然,邓先生很可能会说,你所举的两个例子,年代太远,典籍失载是难免的,你能举一个年代近一点的例子我听吗?正好,我这里还真有一个,而且还恰恰是邓先生最喜欢引用其文章标题的谭其骧先生提供的:

日本学者藤田丰八在《宋代之市舶司与市舶条例》一书中,根据《宋会要》、《宋史》未提及在上海设司,便认为明曹学佺《名胜志》中“宋即其地立市舶提举司”一语出于明人传说,不可置信。实际上《名胜志》之说当本于方志,而方志中所说却有确凿的史料依据。弘治《上海县志》载有宋人董楷在咸淳五年所作两篇文章。其一是《古修堂记》,篇中有云:“前司缪君相之。”其二是《受福亭记》,篇首即曰:“咸淳五年八月,楷忝市舶司,即逾二载。”据此,宋咸淳年间上海有市舶司无可置疑。^⑥

谭先生以此例说明“旧方志中不少材料不见于正史及其他史籍,因此成了解决历史问题的唯一依据”的观点,这篇文章的内容(不仅是标题)不知邓先生读过并同意否?当然,邓先生可能还会不甘心地说:“此市舶司的

设立,好歹有《上海县志》中董楷的文章为证,你《麻城县志》里有吗?”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邓先生手头至今还是没有《麻城县志》的缘故。如果有,就会知道,县志里邹知新的文章,就是从《邹氏家谱》中选出的,只不过只选了七篇,而《都碑记》一文恰好没选。至于“首次撰写《麻城县志》(康熙九年版)的那位(群?)文人,他(们?)、以及后来三个版本编修者的前辈、朋友中的前辈”(引邓先生语,有点“诘屈聱牙”,请读者见谅)为什么不将《都碑记》选入县志,我想这点常识就不需多讲,还是有劳邓先生自己去读读黑格尔《历史哲学》“绪言”中的“(二)反省的历史”吧!

事实上,洪武之初的形势,对于朱元璋来说,王朝草创,百废待举,政事繁复,制度未备。州、县的旋废旋置,政区的随分随合,其中尤以洪武九年至十三年(1376—1380)达到高潮。在这种情况下,史官的难于详记或因时间过短而不屑于记载,不仅是可想见,而且是于史可征的。这一点,不仅为学界所熟知,而且也应该是“一个基本常识问题”。现在,我们就来看看《明史·地理志》对黄州府的记载:

黄州府(元黄州路,属河南江北行省)太祖甲辰年为府,属湖广行省。九年属湖广布政司,寻改属河南。二十四年六月还属湖广。领州一,县八。西南距布政司百八十里。^⑦

《读史方輿纪要》的记载更为简略:

元为黄州路,隶河南行省。明为黄州府,改属湖广布政司。领州一,县八。^⑧

而《大明会典》就只有“领州一,县八”一句话^⑨。

那么,这是否就是黄州府有明一代建置沿革的全部内容呢?如果这样认为,那就未免太天真了!

《明史·地理志》的记载,明眼人一看,

最少就能提出三个问题:第一,“寻改属河南”的“寻”,是什么时间?是洪武九年、十年,还是十一年?第二,黄州府改属河南时,是全府所有州县改属,还是部分州县改属?第三,改属河南后,是独立设府还是隶属河南哪个府?

这三个现实存在的问题,不仅“不是一个小问题”,而且不管是当时的统治者,还是今天的研究者,都必须面临的问题。不知邓先生是不是还要说,这“绝对是一件大事”,因此“真相不难查明”?那么,就请邓先生去查查看!

然而,最让邓先生意想不到的,是麻城县升为散州的时间,按照《都碑记》的记载,偏偏就在这个“寻”期间的洪武十年!

二

邓先生有时候很客气。比如在他的文章开头,引用我的几段话时,不直接点我的名,而是故作闪烁地用“有人说”带过,然后在注释里再予表出。

邓先生引用我的几段话的目的,是要提出他的第二个问题:“麻城县孝感乡有无能力填充偌大的四川、改变四川人口荒芜的情况,这是一个基本常识问题。何况麻城县存在的问题是严峻的。”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在邓先生所引我的文章中其实就有。再一次提出,别人可以原谅你没好好读懂。而再一次的回答,却让人有耽误读者宝贵时间、唠叨累赘之嫌。看来,邓先生是想陷我于不仁不义之中了。但我不会那么傻,既然这个问题“是一个基本常识问题”,我就简单地谈几点常识性的看法罢。

第一,误籍的问题。这是邓先生最想说的,但对于这个问题,从一开始我们就没有回避过。如将“孝感县”籍误为“孝

感乡”籍。在阅读川、渝两地有关家族的家谱时,凡是将祖籍写为“湖北孝感”或“楚孝感”的,都有可能是孝感县的移民。这一点在我们研究和统计麻城孝感乡移民后裔时,我们都一直将其剔除,作为存疑处理。

第二,冒籍的问题。这更是邓先生一直在重点关注的问题。我们认为,所谓“冒籍”,主要是指明初麻城移民中,其他三乡(太平、仙居、亭川)移民冒籍为孝感乡;其次是成化八年孝感乡撤并后,甚至一直到清代的麻城移民,仍然自称祖籍为孝感乡。到这时,所谓的“孝感乡”,实际已成为对祖籍麻城的一种符号意义上的普遍认同。至于非麻城籍移民冒籍孝感乡的问题,亦不可一概而论。如大家说得最多的邓小平、汤道耕(艾芜)的祖籍,在族谱数代或十数代未续修的情况下,对其间上百年的口传历史,是认同还是否定,就成为问题的关键。具有典型意义的是邓小平的亲弟弟邓垦,至今在网上还可以找到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时,湖北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对他的采访。邓垦说:“四川有很多人是从湖北移民去的,我们的老祖宗也是移民,还是麻城人,麻城孝感乡。300多年了,后来才移民到四川的。江西吉安?那是邓毛毛写文章那么说的,我不相信(笑)。……那个祖坟都在那里,我们儿童时代都上坟的。那里现在没有孝感乡了,有个邓家塆还在,邓家塆还有很多姓邓的。”事实上,从江西迁到麻城,然后再从麻城迁到四川,恐怕是绝大多数麻城移民的经历。

第三,孝感乡作为“移民基地”,并不在于它本身有多大的人口输出能力,而在于它是否成为一个移民的中转站。明初的孝感乡,除了自身的人口输出以外,江西的民众恰好就将其作为移民四川的中转站。不管他们在麻城居住了一年还是十年、一代还是十代。更何况它还是周边七县移民的登记出发地。有意思的是,邓先生为支持其观点

而引用的以下几条史料,恰恰支持了我的观点。真要感谢邓先生的代劳之惠了!

清宣统《黄安乡土志·氏族》明确记载,其移民来源地的42个族姓中,有31个来自江西,占74%。

清《武昌县志》:元末战乱之后,湖北人烟稀少,明洪武初移民垦殖,江西人在县境定居者甚多,在县人口来源中占较大比例。

这正是有关“江西填湖广”的记载。尽管元末麻城不少民众随明玉珍入川,使人口有所减少。但正是这些随之而来的江西移民,使麻城人口得到补充,保证了麻城人口继续输出的能力。邓先生又引:

康熙《安陆县志》:“闻之老父言,洪武初大索土著弗得,惟城东老户湾数户而无其人,乌兔山之阴空土以处者几人而无其舍,徙黄麻人实之,合老妇孺子仅二千人(应作‘余’),编七里(应作‘里七’)。”

怎么样,这不正为我们证明了麻城在洪武初的人口输出能力?其实,麻城人的迁入目的地,主要是四川。沿途落住的,大都是不胜远徙的家族和人口。

邓先生所引的其他史料,或并非明初情形,甚至引到清时期;或并非麻城地区情况,甚至远至荆襄上游。有如隔靴搔痒,无关宏旨,可置不论。惟文中不无恶毒地说:“我们都知道这样的事实:凡是暴力充斥的地方,特点就是社会的极度平(应作‘贫’)穷化。”这口气似曾相识,且与邓先生的行文风格极不一致,与该文的论述也很不协调。仔细一想才恍然大悟,邓先生一定是看到了麻城政协网站上我写的《麻城人到底惹谁了?》一文,感到了我对罗威廉侮辱麻城人民的愤怒。于是,也学着这个美国人的口气,以博取揶揄后的快感。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恕我直言——邓先生就不够厚道了!

三

邓先生的第三个问题是：元末明初，四川是否荒芜到需要大规模移民来填充？

回答这个问题，现成的资料多得让我们引不胜引。哪里用得着象邓先生那样“皓首穷经”地苦苦寻觅四川并不荒芜的证据，最后还是没有找到支持其观点的一条直接史料！

元末明初四川之荒芜残破，可从两个方面以见一斑：

第一，降级和撤并州县。据《明史·地理志》的记载，洪武十年，四川有70%的州被降级，37%的县被撤并。共降级或撤销23个州、撤并29个县。这个惊人的数字，还不包括洪武十年以前撤并的州县。事实上，四川州县的撤并，从洪武六年就已经开始。如降云阳州、荣州、万州为县，黔江县并入彭水县，罗江县并入绵州等。^①如果我们加上洪武六年至洪武九年降级和撤并的州县数，总数竟达到29州、57县之巨，其比例更为惊人。大批州县降省的原因，除了人口的严重不足以外，不知邓经武先生还能作何解释？

第二，官方人口数据。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四年（1371）七月，明廷刚攻下成都，就设置了四川等处行中书省。到洪武五年（1372）二月，“户部奏四川民总八万四千余户，其伪夏故官占为庄户者凡二万三千余户”。^②8.4万民户，按每户平均5人计算，约有40余万人口。即使我们将“伪夏故官占为庄户者”不包括在8.4万民户中，另外计算。则明升投降时有将士50990人，傅有德攻下成都后又得士马3万，合计8万余人。这样，明军平蜀之后，四川残存的人口数也只有近50万人。偌大一个行省，只有区区50万人口，还不及别省一府之口数。不知邓

先生还能梗着脖子说并不“荒芜”否？

其实，证据还可以举出很多。如四川各府、州、县地方志，还有大量的家谱资料。无奈邓先生对这些方志家谱资料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鄙视，我们也就只好就此打住。不过，我想，有上述两条出自官方的数据资料，应该能使邓先生满意了。

最后，我还是想建议邓先生能静下心来读读有关中国人口史和移民史的著作。如果确实教务太忙、手头乏书、时间有限，也可浏览一下本土学者李世平先生的《四川人口史》和谭红主编的《巴蜀移民史》，以免我费如许口舌。

2009年1月17日脱稿

【注释】

①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

②《史记·秦始皇本纪》，《汉书·地理志》，中华书局点校本。

③《晋书·地理志》，中华书局点校本。

④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二《秦郡考》；谭其骧《长水粹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⑤《秦苍梧、洞庭二郡刍论》，《历史研究》2003，第五期。

⑥《地方史志不可偏废，旧志资料不可轻信》。见谭其骧《长水粹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第400页。

⑦《明史》卷44，《地理五》。

⑧卷76，湖广二。

⑨卷15，户部二。

⑩《明太祖实录》卷96。

⑪《明太祖实录》卷67、卷72。

附：“孝感乡都”考辨

邓经武



有人说：“元末明初的‘湖广填四川’移民大潮中，麻城的孝感乡是一个举世闻名的地方。从那里源源不断迁出的人众，几乎填充到了四川省的每一个角落”，并且以“不容置疑”的决绝态度宣称：“孝感乡作为全国八大移民基地之一的地位是无法动摇的”，但又不得不承认：“现存的康熙9年到民国24年的四部《麻城县志》的编纂者们，即使是对于明清两代举世闻名的麻城大规模移民，也显得出人意料的麻木和冷漠，让我们难以从中找到任何有意识的记载”^①既然找不到切实的典籍来证明，这种说法就只是一种想当然，难以服人。

为了弥补“移民基地说”支撑材料的空缺，最近出现了“孝感乡都”甚至“遂升其都为散州，统属七县”的“重大发现”，似乎这个疑点终于有了“切实的证明”。^②

国家行政机构“州”的设置，不是一个小问题，既然有“统属七县”（专门办理移民事务）的权属，真相不难查明。如《大明会典》卷30就有对专设官员的记载：“正德二年，仍设巡茶御史一员，请敕兼理马政茶法二事”、正德十年“令浙江都司、添设都指挥僉

事一员、专管银场”、成化九年“令看守廉州府杨梅等池奉御，兼管永安池”、成化十九年“添设云南布政司参议一员，同按察司僉事，管理银课”、天顺八年“添设湖广布政司参议一员，于荆襄汉阳等府、抚治流民”。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成化十一年“黄冈、麻城、江陵、监利、枣阳、衡山、安仁、慈利县，（增设）主簿各一员”，其专门职责为“劝农”（卷17）。官员变革也有记载，如“正德元年、裁革湖广衡州府安仁县劝农主簿”（卷17）。《明史》对一些州县的升降变动也有明确记载，“移民圣地”运作的移民填川事务远比上面所列的事件重要得多，“州”级行政机构“孝感乡都”的设置绝对是一件大事，史籍找不到相关记载就令人难以相信。

其实，麻城县的岐亭镇曾经“议设郡丞于此，防御寇盗”，就见于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湖广二·麻城县》记载。我们不妨看看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四川二·金堂

县》对一个已消失的州级地名的叙述：“怀安城（金堂）县东南五十里。本牛鞞县地。西魏置金渊县，并置金渊郡治焉。后周郡废。隋属益州。唐武德初，改曰金水。三年，以县属简州。宋乾德五年，置怀安军治焉。元初，升为怀州，寻并县入州。至元二十年，又并州入金堂县。旧《志》：怀安城有石城在其左，白塔在其右。台山西峙，峡水东流。今遗址尚存。又白牟废县，在县东，亦西魏时置。后周废入金渊县。”作者顾祖禹生于明崇祯四年（1631年），卒于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顺治十六年（1659年）始，以三十年之精力所撰《读史方輿纪要》，被誉为“千古绝作”、“海内奇书”。魏禧的《序》就盛赞之为“此数千百年所绝无而仅有之书也”。康熙二十六年，顾祖禹还协助徐干学编纂《大清一统志》。以其史识、史才、史德而言，对“统属七县”专门办理移民事务所设置的“孝感乡都”如此重大事件，他是不会回避的。还有，他正处于所谓“清代湖广填四川”的高峰期，如果确有其事而《读史方輿纪要》只字不提，也是难以解释的。

又如《明史·地理志》所载黄安县是“嘉靖四十二年以麻城县之元姜家畈，析黄冈、黄陂二县地益之”等，“统属七县”的州级行政机构设置，《明史·地理志》就更应该有明确地记录！

历时几十年乃至百年之久并且“源源不断”地中转移民，完全可以说得上是轰轰烈烈的重大事件，相信在那段历史中，每一个麻城县人都会感到移民潮带来的巨大冲击和难以忘怀的影响，首次撰写《麻城县志》（康熙9年版）的那位（群？）文人，他（们？）、以及后来三个版本编修者的前辈、朋友中的前辈，对背井离乡移民填川的不得已，应该有刻骨铭心的记忆留下来。如此巨大的移民群中，应该有许多文化人被裹挟其中，他们应该有言说内心痛苦的话语能力，安土重

迁的汉族心理，如何能够对离乡背井的如此大事“麻木和冷漠”？

二

麻城县孝感乡有无能力填充偌大的四川、改变四川人口荒芜的情况，这是一个基本常识问题。何况麻城县存在的问题是严峻的。

该处“地僻民顽，官难遥制，贼盗剽掠无时”，我们都知道这样的事实：凡是暴力充斥的地方，特点就是社会的极度平（当为“贫”。编者注）穷化。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麻城县监生李大夏等上书朝廷请求建新县：“本县金场、姜家畈，接壤黄冈、黄陂边隅地，近信阳、光山、罗山等州县，路通牛头山、牢山等寨；地僻民顽，官难遥制，盗贼出没，数被劫杀。乞于姜家畈设县治，保障地方。”据说“太平乡”被归并到红安县，其根本宗旨是解决“以地僻多盗也”的问题，即红安县“本黄冈、麻城、黄陂三县地。嘉靖四十二年，析置今县，以地僻多盗也。县治即麻城之新安姜家畈。”^③清《湖广通志》也说设置黄安县的原因是“明嘉靖末，以地多盗，割黄冈之上中和，麻城之太平、仙居，黄陂之仙源置”。正因为问题严重，所以湖广地区需要外来移民填充，枝江县《董氏族谱》序说：“荆襄上游自元末为流寇巢穴，明主定鼎，以兵空之。厥后，流民聚集，至成化十二年，命御史原杰招抚之，听其附籍受田，赋则最轻。适逢当时江西催科甚急，逃赋者或窜入荆襄一带，原杰招抚，枝必兴焉，此枝民所以多江西籍也。”^④

《大明会典》卷17载：“成化七年、令湖广河南二布政司流民遗下平川田地、分拨各州县土户丁多有力、及田少之家、承种起科。”如果不是生命受到威胁，人们是不会轻易“遗下平川田地”的。成化年间的丘浚在

《江右民迁荆湖议》中说：“以今言之，荆湖之地，田多而人少，江右之地，田少而人多。江右之人，大半侨寓于荆湖。盖江右之地力所出，不足以给其人，必资荆湖之粟以为养也。”1590年（万历十八年），湖北麻城县死于瘟疫和饥饿的有四万人。顺治年间有令：“湘、鄂、闽、鲁、晋、豫等省空荒任民播种，限年垦齐。”^⑤由此可见湖广的“田多而人少”空荒急需移民填充，并且也确实有过“免湖北被贼之孝感等四十七州县卫新旧额赋”的优抚政策。

《明季北略》说：“大清康熙元年七月，兵部疏曰：‘台臣顾条陈：夔门、郢、襄，界处腹心，与边隅不同。袁宗第、贺珍等诸有名巨寇，各拥众屯於大昌王山寨中；湖广荆州之界如兴山县水筒、梁材等处，无非盗贼盘踞。长江阻塞，商贾弗通。郢、襄之贼强盛者，如郝永忠约有数万。以臣愚见，会剿诚为不易之定算；仍敕川、陕、湖广三省招抚，如负固不降，发大兵剿灭可也’”。清宣统《黄安乡土志·氏族》明确记载，其移民来源地的42个族姓中，有31个来自江西，占74%。这里所说的“黄安”就是现在的“红安县”，也就是从麻城县划出的所谓“孝感乡”所在县。康熙版《安陆县志》说：“闻之老父言，洪武初大索土著弗得，惟得城东老户湾数户而无其人，乌兔山之阴空土以处者几人而无其舍，徙黄麻人实之，合老妇孺子仅二千人，编七里”。清《武昌县志》提到：元末战乱之后，湖北人烟稀少，明洪武初移民垦殖，江西人在县境定居者甚多，在县人口来源中占较大比例。有学者统计，江苏、浙江、江西三省以七分之一的土地面积，集中了全国二分之一人口，长江以南的人口分布是“最稀者湖广，最密者江浙”。^⑥

康熙九年版《麻城县志序》就明确说过这里的严重情况：“总因叠罹寇焰，四方焦土，万井寒烟，非复昔日之麻城矣”。

三

元末明初，四川是否荒芜到需要大规模移民来填充。

当元、明两个政权进行殊死搏击之际，偏安一隅的明玉珍、明升大夏政权“保境安民，开科取士，兴学校，制礼乐，境内不见兵革者凡十余年”。同时代的蜀人杨学可所撰《明氏实录》中，对之赞誉甚多，明代著名学者方孝孺在《明太祖实录·明玉珍传》中评价道：“夏主幸致躬行俭的，兴文教，辟异端，禁侵掠，薄赋敛，一方咸赖小康焉。……历年虽不永。民至今感叹焉，不能文词问尽其贤也。”朱明王朝在平定四川的过程中，也未耗费太多精力。《明史纪事本末》卷十一记载：朱元璋曾专门谕示攻打四川的主帅汤和：“师行之际，在肃行伍，严纪律，以怀降附，无肆杀掠”，因此大夏政权首都重庆并未遭受太大破坏，在大军压境之际，大夏政权几乎不加抵抗地放下武器投降，“是日，明升面缚衔璧，与母彭氏及其右丞刘仁等奉表诣军门。和受璧，永忠解缚，承制抚慰。”成都亦如是，“翼日庚申，（戴）寿率其属降，友德整众自东门入”。“命曹国公李文忠经理四川，文忠以成都旧城卑隘，增筑新城，高垒深池，规制略备。时傅友德驻兵保宁，汤和驻兵重庆，各遣人招辑番、汉人民及明氏溃亡士卒来归者，因籍其壮丁。”《皇明本纪》也有同样记载：洪武五年，皇帝诏书回顾说“蜀戴寿等凭恃险隘，中途阻绝，致使朕意不达尔土。去年遂兴问罪之师，分命大将率马步舟师，水陆并进，直抵重庆，明升面缚衔璧。继平成都，生缚戴寿，其各郡邑旋即设置官守。”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四川方輿纪要叙》说得很清楚：“明初平蜀，亦在扫清中原之后，盖知其以一女子奉一弱主，仅保险阻之不暇，不能为我上流患也，故迟之也。”史籍明

确记载明代万历元年(1573年)政府军围剿樊人大型军事行动,至少说明洪武时期四川南部土著大量存在着。由此可见,元末明初,四川地区并未遭受太大的战争破坏,“荒芜”之说,证据不足。

还有,如果四川真的是一片荒芜,朱元璋的第十一子、被封入蜀的蜀献王椿,最大的中心工作就是招徕、安置移民,解决外来移民的诸多问题,但《明史·蜀王传》、明代焦竑的《国朝献征录·蜀王传》、明代李东阳的《大明会典》等典籍,《明史·蜀王椿列传》却找不到相关记载。张时彻的《诸葛武侯祠堂碑记》(1547)说:“洪武初,以昭烈庙实为陵寝所在,令有司春秋致辞祭。蜀献王之国,首谒是庙,谓君臣宜一体,乃位武侯于东、关张于西、为文祭之。盖自是武侯废祠,而乃以其碑碑庙中。”可见,成都一些祭祀活动在明初仍然照常进行着。

所以,笔者认为,“孝感乡都”是一个孤

证,因为《明史》《大明会典》《明氏实录》《明史纪事本末》,乃至《湖广通志》《黄州府志》《麻城县志》皆不见记载。因此,“孝感乡作为全国八大移民基地之一”和“移民圣地”之说,还是需要质疑的。

【注释】

① 凌礼潮:《麻城孝感乡之谜》《麻城孝感乡移民问题考辨》。

② 凌礼潮:《“麻城孝感乡”移民研究的重大发现》,又见“移民文化与当代社会”学术讨论会(2008.12.12,成都)会议文集。

③、⑤《清史稿·食货一》卷120。

④ 转引自曹树基《明代初年长江流域人口迁徙》,《中华文史论丛》第47辑,1991年。

⑥ 张建民:《“湖广熟,天下足”述论——兼及明清时期长江沿岸的米粮流通》,《中国农史》1987年第4期。



纪念“湖广填四川”340周年

——“移民文化与当代社会”学术研讨会在蓉召开

四川省社科院 科研处

(转自四川省社科院网站 <http://www.sass.cn>)

在不平凡的2008年即将过去之时,在四川地震灾区人民为建设灾后美好新家园而努力奋斗之际,一场以“移民文化与当代社会”为主题的全国性学术研讨会12月23日在成都揭幕。这次研讨会由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发起、四川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麻城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以纪念“湖广填四川”340周年为契机而开展的一次紧密联系当前实际的大型学术活动。

340年前,即清康熙七年(1668年),四川巡抚张德地为了解决战乱后巴蜀大地荒无人烟的紧迫问题,奏请朝廷以湖广之民填实四川,一场历史上罕见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由此拉开了序幕。340年后,来自全国12个省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150多位代表云集成都,以学术研讨、学术交流的方式纪念这一次历史上著名的移民运动。研讨会以“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以及相关的移民文化、客家文化等为主题,同时针对川、渝地区民众普遍关心的“麻城孝感乡”现象展开讨论。此次会议虽然会期短,但准备充分,学术氛围浓厚,学术质量较高,特色相当

突出:

代表广泛。出席本次大会的代表来自北京、香港、重庆、广东、福建、江西、湖北、四川等13个省、市(特区)。步入这一学术殿堂的,既有湖广填四川移民、客家移民、客家文化等研究领域的资深专家,也有初露锋芒的青年才俊,还有来自最基层的文化工作者。

会议规格高。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亲自出席并致辞,省政府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也到会表示关注。这一领域的知名专家如谢重光、房学嘉、杨彦杰、刘正刚、陈世松等云集成都。湖北省也组织了强大阵容参与这次盛会。川内及湖北麻城、香港等媒体对此进行了跟踪和报道。

研究成果丰硕,学术水平高。此次有2个国家课题和1个教育部重点课题主持人在会上提交了他们的阶段研究成果,另有一批有关“麻城孝感乡现象”研究的新成果在会上发表。会议将80多位作者提交的文章进行汇编,形成了一部50余万字的论文汇编。(转下页)

国家社科基金课题 “区域文化整合与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研究” 开题论证会召开

四川省社科院 梁 音

(转自四川省社科院网站 <http://www.sass.cn>)

12月14日下午2:30,“区域文化整合与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研究——‘麻城孝感乡’现象的历史解读与认同建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开题论证会在社科院305会议室召开。出席此次开题论证会的有周友苏副院长、科研处黄维敏科长和课题组邀请的专家与课题组成员及麻城电视台记者共18人。

课题负责人陈世松研究员首先向大家

介绍了开题论证会邀请的咨询专家: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李绍明研究员、四川大学胡昭曦教授、暨南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刘正刚教授、西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副院长杨正文教授。之后他通过PPT和文本向与会者介绍课题的基本情况,包括:题意解析、研究综述、研究构想和其他说明。课题组成员之一,麻城方面的代表、麻城市政协主席凌礼潮也

(接上页)

学术关怀突出。应广大代表的要求,会议组织安排赴德阳汉旺参观凭吊地震遗址,并在当地举行一场别开生面的民间学人祭祀仪式——“七月祭”活动。此外,学者们在交流340年前的“湖广填四川”移民史研究的同时,根据历史上的移民和睦相处、共铸辉煌的经验也提出了对四川灾后安置重建的一些建议。

社会反响强烈。这次会议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开始,引起了省市以及香港媒体的高度关注,迄今已有不下十余家新闻单位进行了连续报道。甚至有成都市民专门到场

听会,激发了学界与民众的互动。近日还有不少作者以“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340年为主题发表个人博客,证明此次会议已在社会大众中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会后,代表们普遍反映这次会议开得十分完美,收获甚丰。相信通过这次研讨会,不仅能在普及历史知识、传承历史记忆方面发挥作用,不仅能为哲学和社会科学繁荣和发展注入活力;而且,还能在建设共有精神家园、构建和谐社会方面作出有益的探索。

2008年12月26日

在会上发言,感谢四川省社科院将麻城提升为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的研究对象,表示麻城方面一定大力支持并协助课题组完成此题。

该课题为历史类国家社科课题,主要围绕“麻城孝感乡”现象,通过对川、渝地区广泛存在的历时几百年的共同祖籍的传说进行历史解读,勾画出传统文化背景下,广大湖广移民在定居地,如何运用传承祖籍记忆、构建家园象征符号、整合区域文化、增强文化凝聚力、营造和谐共生家园的基本脉络,以探讨新时期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之路。

受邀的专家对课题的立意和设计给予了较高评价,一致认为此题立意新颖,现实性强,颇具研究价值和运用前景。继而几位专家从不同的角度对该课题的具体开展提出了许多中肯的建议。胡昭曦教授认为该题借鉴了很多非史学的研究方法,这一点非常好,作为历史学的课题还是要注重史料的收集和运用,甚至可以适当延长课题计划中

的史料收集时间。李绍明研究员建议对四川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给予一定关注,留意少数民族汉化和汉人少数民族化中的历史移民问题,期待课题能对“麻城孝感乡”在川渝的传说范围给出相对量化的统计结果。刘正刚教授认为此题可以在制度史研究上有所侧重,考察国家到地方的制度运作情况。杨正文教授建议还可以适当考察西南官话的形成及川鄂两地的民俗信仰比照来探讨文化的整合问题,考虑社区的多样性而建议田野调查应以家族和小区域为主等。专家们同时认为此课题难度较大,且相对于课题的内容和预期成果来看,存在经费严重不足的问题。

周友苏院长在会上讲话,对课题的开题论证给予充分肯定,并期望课题组成员努力工作,通过史实与文化的结合分析为扑朔迷离的“麻城孝感乡”现象提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2008年12月22日



麻城孝感乡移民寻根园鸟瞰图



麻城文史 编辑部

编辑部地址：湖北省麻城市金桥大道特1号

电 话：0713-2950903

传 真：0713-2950903

邮 箱：zxb0903@sohu.com

邮 编：438300